

515

聊城文史资料

第七辑



政协山东省聊城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聊城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东省聊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十月

EA97/23
政协聊城市第八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任委员：顾大武

副主任委员：秦新义 张道英 张维芳

委员：张庆年 孙元芳 周庆月
傅长林 胡兴华

主 编：朱淑惠

副 主 编：裴 蓉 薛守鼎

聊城文史资料

政协山东省聊城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省聊城市海源阁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0 千字 7.25 印张

印数 1—1000

聊新出准字(1995)1—086 号

工本费：7.50 元

目 录

* 人物春秋 *

永久的纪念 珍贵的回忆	刘满昌(1)
一次难忘的采访	樊铭远(21)
怀念洪涛同志	周乐亭(23)
我所知道的聂湘溪先生	公 符(27)
李士钊与武训	邢培华 张庆年(31)
台岛肠断客 痴心兴乡学	孙元芳(36)
何器之在聊城二中	王文昭(40)
扎根基层五十年 肝胆照人寓平凡	葛 渊(44)
记回族乡村基层干部刘清芹	刘向东(49)
大牛二牛列传	刘九龙(53)
武术名师邓清源传略	高文广(58)
从乞丐到画家	
——记著名民间画家郜怀林	李培端 薛守鼎(61)
李士钊与聊城市档案馆珍藏资料	张庆年(65)

* 文化苑林 *

聊城民间文学浅议	邓愧余(71)
聊城民间表演艺术琐谈	杨道田(76)
源远流长的聊城烹饪文化	博 闻(86)
聊城戏剧团体简介	杨道田(91)

聊城梨园史话	杨道田	(95)
聊城曲苑杂谈	杨筱玲	(102)
昔日聊城的装裱业	杨道田 朱淑惠	(108)

* * * * *

* 史林探幽 *

* * * * *

沧海桑田话聊城	葛 渊	(111)
任克溥弹劾科场舞弊案	马毓山 高月增	(115)
任克溥奏疏	马毓山 张道英	(119)
贡士与贡生不是一回事	许继善	(126)
窦建德大败宇文化及于聊城	阎增山	(129)
杨以增族人墓地与毁坏经过	田绍润	(132)
关于杨以增一篇佚文的发现	马明琴	(138)
民国聊城县历任行政长官考	莫玉山 张道英	(140)
旧时聊城司法机关设置情况概略	倪宗周	(146)
癸丑“东昌独立”始末记	刘晓焕	(148)
韩七爷抗捐告状与《反堂邑》	朱成德	(154)
土匪王金发盘据聊城考略	顾叶青	(156)
韩复榘来聊城片断	吴云涛	(159)
建国前的聊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		
——孟营完小	周庆月 孙元芳	(163)
忆在武训县抗日工作中的几次险遇	李寿澎	(168)
“武光”——武水之光		
——记一次中日篮球赛	崔梦辰	(173)
话说黄沙会	梁金中	(175)
聊城东部的红枪会	马毓山 周庆月	(183)

* * * * *

* 宗 教 *

* * * * *

聊城宗教史略..... 傅延海(190)

浅谈聊城穆斯林的三大节日..... 沙德昭 薛守鼎(194)

聊城回教中饮食婚姻丧葬考略..... 沙德昭 薛守鼎(196)

* * * * *

* 乡土民情 *

* * * * *

聊城县乡土民情录..... 莫玉山摘录(199)

聊城古城墙..... 吴云涛(203)

邓状元奇闻轶事..... 邓愧余(206)

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 沈宝章(210)

杨大安殡葬纪实..... 王九恒 崔梦辰(212)

高佛堂寺膏药琐谈..... 叶簪传 高文广(214)

东昌鸟类两绝..... 裴 蓉(216)

北坝豆腐..... 高文广(219)

五十年代以来聊城的民居变化..... 高金福(221)

后 记..... (226)

永久的纪念 珍贵的回忆

刘 满 昌

1948年10月，我被中央社会部从华北军政大学选调到政保队，进行训练学习。1949年1月31日，我们作为中央机关代号“劳大”的先遣队，随接防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在香山、颐和园等处肃清匪特，清查户口，进行社会治安，为党中央、毛主席进京扫清障碍。后中社部政保队改编为中央警卫师政保队，重点保卫毛、刘、周、朱、陈等主要领导人。其间我历任文书、副分队长、分队长等职，直到1954年7月转业。

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在保卫工作中的日日夜夜，依然清晰如昨，常常令我感怀不已。

一 柳亚子向毛泽东赋诗辞呈的前前后后

1 1949年春的一天，风和日丽，北京颐和园愈显其美丽多姿。当时我在中央警卫师政保队，第一次执行保卫毛主席的任务，心中异常激动。

毛主席身着黄呢制服，脚穿蓝色胶鞋，在大家的护卫下，健步走在昆明湖畔一条方砖铺地、石子编花的小路上。高大魁梧的身躯愈显伟岸，一双睿智的眼睛不住地望着远方。和他并肩走着的是瘦小身材，留长须，戴眼镜，穿长衫，拄拐杖的民主人士柳

亚子先生。他是毛主席的朋友，也是党的朋友，两人边走边谈，非常开心，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主席高兴地对柳亚子先生说：“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你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年事已高，应该享点福了。可当前百废待兴，条件还达不到。”主席抬手向四周指了指接着说：“这里湖光山色，风景如画，请你住在这里，一面休养身体，一面工作，如何？”柳先生听了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毛主席日理万机虽然很忙，还是亲自将柳先生送到住处，才匆匆离去。东宫门外并排停着五部一色轿车，毛主席因为心急出门就钻进了一部。但那是工作人员乘坐的普通车。当时为了安全，主席车上装上了防弹玻璃，因为几部车都是同样颜色的，有时毛主席自己也分辨不出来。工作人员赶忙近前将主席请了下来，上了自己的车。江青带着女儿李讷一直悄悄地跟在身后，这时急忙将主席忘下的帽子送了过来。

2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1906年加入同盟会，同年与陈去病、高旭等组织反清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2年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参加反袁斗争。1924年以同盟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通缉，亡命日本。1928年回国进行反蒋抗日民主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当时制造分裂，破坏抗日，被开除党籍。1947年与李济深等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1949年解放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3月18日柳应毛主席电召，从香港赶到北京，被安排在颐和园的益寿堂住下。

这是一座别致的小庭院，优雅静谧，风光宜人。驻足远眺，昆明湖上，游船点点；南湖十七孔桥，倒影如画；龙王庙亦尽收眼底。向东穿过繁花盛开的桃林，即可到达著名的园中之园——谐

趣园；再上一段缓坡就能登上气势雄伟的万寿山。柳先生仔细看过之后，满意地点点头，对一位负责同志说：“住在这里很好，再给一个小鬼扶侍我就行了。”那位负责人告诉他：“医生、炊事员、公务员都已经安排好，为了安全，您的身边除了派去的警卫员外，在住地还有警卫部队为您站岗值勤。”当时也曾有人对此表示异议，认为给予柳亚子的待遇过于优厚。毛主席却赞杨说：“亚子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在国民党内很有影响。可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多年来与我党生死与共，是我们久经考验的朋友；他写的文章象飞进敌人营垒里的一发发重型炮弹，所以蒋介石既恨他，又怕他！”

负责警卫的刘桂雄，是我的战友，20岁的年纪英俊、潇洒、干练，在延安时就跟着党中央、毛主席。但是柳亚子先生反觉得警卫员跟着有防他的自由，甚至认为是在监视他的行动，所以外出时常常不让警卫员跟随。3月28日这天，柳先生一人出外散步，回来时被值勤的战士挡驾。因为战士新来，不认识这位穿长衫的老者，而把他当成了普通老百姓。这下可惹恼了柳先生：“毛主席是让我来享福的，不是让我来碰钉子的！”边说边举起手中的拐杖顺势打了下去。战士躲闪不及，头上、身上重重地挨了几下，可还是坚决不让他进去。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刘桂雄及时赶到，才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原来刘因为不见了柳先生，正在到处寻找，远远看见柳和战士闹误会才匆匆赶来。柳悻悻地走了。战士一见到刘桂雄，就象见到亲人一样，委屈地痛哭失声。刘安慰战士说：“柳先生也向我发过火，他总认为我们这些人是多余的，妨碍他的自由。你挡他的驾是因为不认识他，是误会。”

3 柳亚子回到住处，联想到有关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间的矛盾以及尚未解决的一些棘手问题；再加上急欲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一奠而苦无专车，越想越气。他连夜赋诗一首，流露出要回乡隐居的牢骚情绪。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诗的大意是说：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真是开天辟地的大英雄，我过去一直歌颂党和毛主席，这次香港回来没想到处境却很困难，自己有超群之才，并非徒具虚名，倚势压人之辈。但是对我的待遇却象冯驩一样，我只有弹着剑唱“长剑回去吧，出外没有车！”来发泄自己的委曲情绪。我早就悔恨自己的头颅不值钱，可是尽管不受重视，我的心还是红的，不会改变对革命的一片忠心；我就是希望怎么能得到解放军跨过长江，解放南方广大土地的胜利消息；那时候我的家乡吴江，就是我隐居的地方了。

柳亚子打战士的事件，周恩来副主席很快就知道了。他立即赶来找柳谈话，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因为你对中国革命有贡献，所以革命刚取得胜利，毛主席就立即将你请来共商开国大计。”周接着又说：“我们给你派警卫员和警卫部队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他们如果做错事，可以批评教育，怎么能动手打人呢？你打的这位战士恰恰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同志，他不仅参加了解放北京、天津的战役，还参加过辽沈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江南，在战场上是立过功的。为加强中央驻地的保卫力量，最近刚从前线调来北平。他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不认识你这位长者，正如你不了解他不熟悉他一样；如果当时你知道他是这样好的同志，你还舍得打他吗？”

柳亚子听了周副主席热情诚挚的谈话，如梦方醒；无限悔恨自己的一时冲动，不禁自咎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

我错怪了那位战士，对不起同志们。”

4

对这次事件其他首长也很关心，李克农同志有次问我：“挨打的那位战士现在怎样？”我回答：“听说正在闹情绪，要求回前方。”李听后立即让我带他到了警卫连。连长向李克农报告说：“他还在睡大觉，说不批准他回前线就不干了，谁劝也不听。”这是一位志气刚强的同志，他叫张勇，今年19岁，黑龙江人，父母均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失去亲人的张勇，为报仇雪恨，15岁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作战非常英勇，立战功多次。调来之前是前线某部队的一位班长，脾气倔犟，只要是认准了的事他人很难说服他。

张勇听说有首长来看他，赶忙穿衣下床跑步来到连部向李克农同志敬礼，报告说：“请首长批准我回前方去！在这里我干不了。”李请他坐下来耐心地对他说：“你要求回前方，不能说不行，不过当前这里更需要你，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不是更光荣吗？！”他接着说：“你受了委屈大家都很同情，周副主席亲自找柳亚子先生谈了话。柳先生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受尽蒋介石迫害；但是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没有搞过武装革命斗争，所以不懂得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也不知道怎样去爱护革命战士。今后和我们共产党人在一起，会慢慢地改变过来的。”李克农同志推心置腹的一番谈话，使张勇感动得流出泪来：“周副主席竟然为我一个普通战士亲自来做工作，我还在这里闹情绪，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请首长放心！我今后一定努力做好工作，来报答中央首长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李高兴地立起身来，走向前去和这位战士热烈握手，表示赞赏和敬意。

5

毛主席在4月29日上午，送给柳亚子一首七律；诗中诚恳而严肃地规劝他，委婉而尖锐地批评他，要他放开眼界，处理问题不要计较个人得失，要从长远的革命利益出发。

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叶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主席在这首诗中，以朋友的身份对柳亚子进行规劝和批评。所以，前四句先从三次交往谈起，一次广州，一次重庆，一次是刚解放了的北京；后四句的意思是说：牢骚太多了会妨碍身体健康的，所以不要再发牢骚了；对待世上的一切事物要放开眼界去看，应该具有远大的眼光；劝他要看到革命的利益，如果从革命的利益出发，那留在北京还是大有可为的，远远胜过回到家乡去隐居。

柳亚子在毛主席、周副主席热情中肯的帮助下，尤其是在收到毛主席的和诗后，即步其韵，称“昆明湖水清如许”。一个“清”字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的感受。古人论人论文乃至论政，很看重一个“清”字。高洁之人，谓之清人、清士；德行高尚，谓之清介、清芬；政治修明，谓之清明、清泰。毛主席此诗，清醇和雅，语言温婉秀润，情意隽永绵长，看似清淡，味之弥甘，正是君子之交常有的特征。读其诗想见其人，使人确有“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之感。新中国建立之初，能有那样多的志士友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中国共产党周围，使得百业兴旺、国势蒸蒸日上，和毛泽东同志这种光风霁月、清润和雅的作风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的和诗很快消除了柳亚子心中的牢骚情绪；同时转变了对待警卫人员的态度，从冷眼相对变成了亲亲热热的一家人。柳先生对革命事业也热心起来，积极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为开国大计、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二 和任弼时同志在一起

1

1949年4月，古老的北京焕发了青春，迎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人民群众喜庆胜利，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由市民、学生、军人组成的秧歌队、文艺宣传队，一队接一队，遍及大街小巷，观众人山人海，整个北京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

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政保队30余人，在区队长王成义率领下到大会执行保卫任务。大会在青年宫隆重举行，会场活泼、庄重、简朴。出席大会的代表340人，代表着19万青年团员。中央和北京市的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派代表列席了会议。此外，苏联共青团也派代表团前来祝贺。由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等组成大会主席团并主持会议。

朱德总司令首先代表党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向大会致贺词。这位率领中国人民子弟兵，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老英雄，早已成为广大青年心目中的丰碑，人们崇敬他，热爱他！他的出现立刻使会场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朱总司令的讲话常常被雷鸣般的掌声所打断。

任弼时同志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身材胖大、魁梧、留胡子，是一位很有风度、很有魅力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同时又是我们党早期的青年运动领袖。1924年他从苏联留学4年回国后，曾长期在中央领导青年运动，因而他非常熟悉中国各阶层青年人的心理状况和脉象；再加上他工作深入细致，讲问题实事求是，所以他深受青年人的欢迎。特别是他又即席解答了青年人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诸如，什么工作最重要和最光荣；脑力劳动是否比体力劳动高尚；领导者是否比被领导者高尚等等。他说：“在我们革

命阵营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同样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没有贵贱之分。但是，有的人却不恰当地将其比喻成人体，说什么‘人的头脑是高贵的，下肢是卑贱的’。试想，一个人假如只有脑袋没有肢体，那就不是人形，还有什么高贵可言？”大家听了，先是哄堂大笑，接着又热烈鼓掌。

大会通过了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和章程，选出了第一届团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冯文彬为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并一致通过任弼时为团中央名誉主席。最后，大会宣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2

任弼时同志对苏联青年代表团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第一次来华访问很重视。大会期间曾多次代表党中央接见他们；大会结束后，又亲自带领团中央新选出的领导班子乘车前往苏联代表团驻地——北京饭店看望，我和王增福随车护卫。代表团的几位负责人已在门口迎候，任亲切地对他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们来看望大家，向同志们问好！中国革命是在苏联人民的帮助下，取得了最后胜利。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也要向苏联人民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任虽然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是，他的谈话是通过翻译进行的。苏联代表团听了，长时间热烈鼓掌。任继续说：“但是，中国人民和各级干部还不太熟悉苏联，特别是不太了解苏联人民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今后，我们要陆续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考查、访问，还要增派留苏学生；同时也希望贵国派团来中国访问。通过互访增进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苏代表团负责人高兴地说：“来华前，斯大林同志嘱咐我们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给中国同志带来苏联人民的友情和敬意；二是让我们很好地向伟大、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学习。”这时，他捧出一个带有苏联共青团旗的盒子，双手递给任弼时说：“这是我们特制的‘苏联共青团纪念章’，送给中国同志，表示对‘中国青年

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祝贺！”

任十分珍惜苏联朋友赠送的礼品，指示立即分发给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纪念章制作精致、美观，大家戴在胸前非常高兴，便情不自禁地和来访的苏联同志一起手挽手唱起“国际歌”来，边唱边跳，气氛十分热烈、融洽、友好。

3 一天，任弼时在前门外烤鸭店设宴招待苏联代表团。司机老王拉住我问：“听说是去全聚德吃烤鸭！可惜我们司机不能进去，请你弄出点来给我解解馋好吗？”“偷人家的？！这是违犯纪律，不行！”随后我又叮嘱他说：“请你尽心将车维护好，不要在首长用车时发生问题。”“这你尽管放心，再说我跟你开车也不是一天了，还不了解我吗？”我们正说着，远远看到任弼时等团中央领导陪着苏联代表团走来；老王开的正是任弼时同志要乘坐的。在车上，老王又继续纠缠说：“我求你办的事可别忘了！”老王知道我的脾气，凡是别人求我的事，只要能办到的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办。这次也不例外，嘴里虽说不行，却在暗暗地想办法。宴会设在楼上，虽没有北京饭店气派，也还整齐、干净。我也是头一次吃烤鸭，因为心里惦记着老王嘱托的事，顾不上多品烤鸭的滋味，吃完饭，顺手抓了几张小饼卷了些鸭肉，就悄悄地溜了出来。

等在门口的老王，伸手接了过去就往嘴里填，看着他那贪婪的样子，我笑着说：“慌什么？又没有人抢你的！”老王大口吃着，油顺着嘴角往下流，也顾不上搭话，冲我翘起大拇指来，意思是说：够朋友！好吃！好吃！老王吃得正香，任弼时等陪着客人已经走下楼，出现在门口。只见老王急忙将滴着油的卷饼往衣兜里一塞就启动车。

这幕滑稽剧已被眼明心细的任弼时同志看得一清二楚。下车后便叫住我问：“你不是没答应他吗？怎么还是给他办了？”我回答说：“我是警卫，他是司机，我们有个工作配合问题。再说，他的技术很好，工作也很卖力。这件事我干得不光采，违犯纪律，我

回去一定很好地检讨。”任听了笑笑说：“不！这件事你做得对。我们到里面吃饭，让司机在外面干等着，很不合理！这是进城后沿用的旧政那一套，必须立即纠正过来。”任弼时同志雷厉风行，立即向有关部门作了指示。从此，中央机关开会或其他场合用车，首长用餐时，也一定给司机再另外准备一份饭菜。

大会以后，任弼时同志因身体状况欠佳，就休养了。实际上他早就病了，他是带病坚持工作的。他爱好钓鱼，养病期间，常由夫人陪同在昆明湖畔坐在一个大软垫子上垂钓。这时我正巧在颐和园执行警卫任务，于是见了面我就问：“昆明湖里鱼多吗？”“很多，那鱼还常在水里跳高呢！”他高兴得哈哈大笑。于是，我又能在昆明湖畔，看到他那胖大、魁梧的身影了。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同志突然病逝，时年只有46岁。任弼时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倾注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并为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 邂逅毛岸英

1 中国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束后，苏联青年代表团在冯文彬等人的陪同下，到各地进行友好访问。

这天，河南省党、政、军负责人率领群众数千人，在车站举行隆重仪式，欢迎贵宾。苏联代表团负责人即席作了热情、友好的讲演。因为没有讲稿，一时难住了随行翻译，场面非常尴尬，冯文彬等领导同志也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为难之际，忽然一位高身材，英俊、潇洒的青年人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准确无误地将苏联客人的讲话翻译了出来。大家既为苏联朋友热情、友好的讲演鼓掌欢迎；也为这位青年人及时打破僵局恰到好处的翻译叫好。冯文彬和河南省领导人走向前去和这位青年人热烈握手表示

谢意；一旁的苏联客人也赞扬他翻译得好！但是这位青年人究竟是谁？

专列，离开郑州继续南下。我正在车上值班，突然，我的眼前又出现了这位青年人。他二十五、六岁的年纪，举止文雅，微笑着和我热情握手。我请他坐下，问：“你贵姓，也和我们一起去广州吗？”他说：“我姓毛，是父亲让我坐你们的车顺路去湖南韶山探亲的。”我大悟道：“啊！你是毛岸英同志，失敬！失敬！由于你出面翻译，欢迎会才开得成功。”他谦虚地说：“这没有什么，我留学过苏联，因而俄语讲得熟练点。他们是刚出校门的学生，通过工作实践，今后会好起来的。”

2 韶山，是毛泽东主席的诞生地，苏联代表团自然一定要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是个典型的农家院落，整洁、简朴，里面展示着毛主席青少年时代读书用过的文房四宝和务农用过的各种农具，还有毛主席和全家的合影照片。这揭示出毛泽东是从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人民领袖的。大家看了深受教育，特别是苏联朋友，他们说：“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人物还当过农民，了不起！了不起！”

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联欢会”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湖南省文艺工作者为欢迎苏联客人，在毛泽东故居，因陋就简演出了湖南“花鼓戏”等文艺节目。苏联朋友虽然听不懂里面的台词，但是，演员们的精采表演却博得了客人的热烈欢迎。苏联朋友也即兴表演了“芭蕾舞”和其他民族歌舞，而且还用汉语演唱了中国歌曲“东方红”。

3 代表团在冯文彬等同志的陪同下，要离开韶山乘车继续南进，毛岸英和乡亲们一起到车站送行。在火车将要启动之时，毛岸英同志又过来和我亲切握手，边说：“祝你一路顺利！”他已经把我当成了老朋友，我忙说：“谢谢，希望你等我们从广州回来，再坐这趟车，我们一起回北京。”岸英同志想了想说：

“这不可能，你们是公事，我是私事，老坐这样高级的车也不合适。”
“你也太原则了，毛主席不是已经批准你坐这趟车了吗？实际上你起的作用比我们工作人员大得多！”岸英同志微微一笑：“正因为我是主席的孩子，才更要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郑州车站那件事属于偶然的巧合，不能算是我的功劳。”

一年后，毛岸英同志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直至牺牲；没有想到我们那次话别竟成了永诀。毛岸英同志是中国青年的楷模，人民的英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他博学多才，能文能武，但不恃才傲物。他发扬了共产党员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他因为是毛主席的孩子所以就更严格要求自己，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

四 难忘的“中秋节”

1949年的八月“中秋”，天高气爽，气候宜人。当时我奉命和其它五位同志在北京颐和园东宫门外，等候保卫邓颖超同志。

邓大姐走下汽车，对着刚刚回到人民怀抱中美丽、壮观的皇家御园，无限感慨地说：“我上次来这里，是在20年前欢送赴欧勤工俭学的同志们。”我们大家听了都惊讶得伸长了舌头，因为那时我们几位都还没有出世呢。邓大姐中等稍胖的身材，虽然只有45岁年纪，但因长期为革命事业操劳已显得有些苍老；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一天是周末，又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八月十五”。跟邓大姐同来的只有两位女同志，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副主席虽然近在咫尺，却没有时间陪她一起来度过这良宵美景。不过邓大姐这天的情趣很好，她在昆明湖上了船以后说：“今天是八月十五，天气也很好，我们大家就在昆明湖上一起过节吧。”

我们另备了一只画舫紧随其后，她看到后一定要我们将两只船连在一起。开始我们有些不大同意，因为和中央首长坐在一起

受约束、不随便；同时对安全保卫工作也有些不便。她看出我们面有难色，便说：“咱们是一家人，为什么要分两下里呢？还是大家坐在一起说话方便，也热闹。”没有办法，我们只好遵命照办。两只画舫合在一起后，开始我们很不自然，脸上老出虚汗，不知如何是好。邓大姐猜透了大家的心情，便指着一筐荔枝再三让大家吃。这荔枝是刚上任的广州市长叶剑英同志托人给邓大姐捎来过节用的，让我们这些人吃了怎么行？于是我急忙站起身来说：“报告首长，我们是军人，不能在外边乱吃东西。”邓大姐听了有些不高兴地说：“不对！我刚才说过了，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怎么是外边呢？还一定让我给你们送到手里才吃吗？”说着，真的给大家分送开了。船在水里行进，摇摇晃晃，人走在上面趑趄趑趄非常困难，何况邓大姐又上了几岁年纪。这下可把我们给难住了。吃，不好；不吃，更不好。这时邓大姐很生气地说：“我给你们提出抗议；我是来玩的，不是侍候你们的，为什么还要我一个一个地给你们送呢？”我看邓大姐真的生气了，赶紧说：“大姐，您千万别生气，我们听您的话吃就是了。”同时对大家说：“同志们快吃，不要再让大姐生气了。”荔枝味道鲜美，是我国的名产，我们之中多数人尚未吃过；这时谁也不敢再客气，一会儿功夫多半筐下去了，邓大姐高兴得笑了。

邓大姐又和我们大家拉开了家常，她逐个问了我们的姓名、年龄、参军入伍的时间以及家庭情况等。大家都如实地做了回答，我还特地向邓大姐报告了农村土改中的过“左”现象、错斗中农及乱杀无辜等。邓大姐说：“这种现象是违犯党中央土改政策的，一定会很快得到纠正。”邓大姐说得真准，果然家中很快来信说：土改中的一些错误现象已经得以纠正，坏人受到了惩治，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秋季获得了好收成。

在邓大姐的热情感染下，气氛立刻变得活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我们，还有跟随邓大姐来的两位女同志，都情不自禁地在

邓大姐身边轻轻地唱起了“东方红”、“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此时，月挂碧霄，银辉满天。岸上的一亭一榭，一木一石依稀可辨；映在水中的月亮，恰如水银面上衔含的一颗玉珠；微风一吹，鳞光闪闪；船水激荡，浮光跃金。大家都被这美妙的夜景陶醉了。不知不觉已是晚上10时许，邓大姐明天还要操劳国家大事，我们只得告别了这良辰美景。

这一切好象发生在昨天，邓大姐那慈祥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眼前。而邓大姐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五 我给周恩来斟酒

1

1950年春，政保队领导给我谈话说：“上面与外交部已经谈好，决定派你带领几位同志去国际俱乐部学习，做一段时间的外宾招待员。”

国际俱乐部位于满清时期英法帝国主义镇压义和拳运动的大本营所在地——东交民巷。北京解放后，将其改造成建国初期国家总理和其他领导人外事工作活动的中心。

我和四位战友来到之后，大家学习都很积极努力，星期天也不休息。特别是英语，大家都很有趣，又念又背，学起来不知疲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基本的东西就学得差不多了。

一天，国际俱乐部李经理通知我们说：“外交部领导今天来检阅你们的实地操作表演，大家要立即做好准备！”我们大家身穿白衣黑裤，整洁、精神。操作开始后，师傅们都退到后面给我们当助手。宴会厅里就我们几个年轻人，大家来往穿梭，快步如风，从铺桌布、叠餐巾花、摆放刀叉勺到端酒上菜、送饮料等，干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观看的人群中忽然站起一人，他微笑着点点头说：“我看可以！”边说边快步走近了我们。

啊！周总理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大家都惊呆了，随后不约

而同地鼓起掌来！总理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先逐个问了我们的姓名、年龄，然后亲切地对我们说：“共和国建立以来，同我们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外宾服务是政府外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努力做好！我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有热情好客的传统，应在外宾服务工作中体现出来。你们是共和国的第一批外宾服务员，任务艰巨而光荣，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总理日理万机，说完便匆匆地离去了。

2

又一天，军代表老段同志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神秘地对我说：“周总理举行的宴会，需要一个专人去斟酒；总理不能多喝色酒，但在外宾面前又不能失礼，决定配制同样色泽的果汁来代替。要求斟酒的这位同志要特别机警灵活，绝对不能让外国人看出破绽，不然将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外交部领导指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你去完成。”

我想任务虽然很艰巨，但义不容辞，所以立即站起身来说：“请领导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从此，我便肩负起给周总理斟酒的任务。宴会用酒，当时多用外国色酒，有美国威士忌、英国白兰地、法国香槟等。经师傅们配制而成的同样色泽的果汁，能以假乱真，外国人根本无法辨认；我手里经常持有两瓶酒，一真一假。总理问过我一次名字就记住了，他要酒时就亲切地招呼我，他知道，只有我的手里才有他要喝的“酒”。

总理在宴会上，以果汁代酒，主要还是为了外交工作的需要。新中国建立后，即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的封锁；特别是美国政府不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力图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周总理为打破封锁，利用外交工作这一重要阵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首先在新闻工作方面，总理指示有关部门编写了介绍中国情况的材料，出版外文书刊。有了这些材料为依据，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回答。又对接待外国记者的工作，作了五

条原则指示。

再就是利用宴会。总理有时为外交使节举行冷餐招待会，边吃边谈，让人感到无拘无束，轻松活泼。总理手握酒杯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行其间，兴高采烈地与客人碰杯，常常带头干杯，这样大量的饮酒，不用果汁代替怎么能行？总理说：“这不是吃吃喝喝，是为了便于宣传自己，了解对方，结交朋友。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

3

周总理本来会讲几个国家的语言，但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总理和外国人会谈时，总是通过翻译进行。一次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慰问驻旅大苏军。在周恩来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苏军一位中尉翻译周恩来的讲话时，有一个地方翻译错了，被我代表团一位同志听了出来，当场作了纠正。这件事，不仅使总理感到意外，也使在场的苏驻军司令大为恼火，他马上走过去，要撕掉这位中尉的肩章和领章。宴会厅里一时显得非常紧张。

周总理忙上前劝阻说：“两国语言要作到恰到好处的翻译是很不容易的，也可能我讲的不够完善。”然后他又慢慢地重述了自己刚才讲的那段话，让翻译仔细听了，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总理讲完后，在同苏军将领、军官、英雄模范干杯时，特地又同翻译干杯。苏驻军司令和其他将领看到这一情况，在干杯时，眼里都含着热泪。深受感动的翻译，更是举着酒杯久久不放。

凡在总理身边工作过或者与周总理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深切地感受到他特有的那种诱人的魅力。周恩来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哪怕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魅力，并油燃升起对他的尊重和崇敬之情。

六 和陈云同志共进午餐

颐和园的夏天，湖风谧谧，绿荫翳地。树上的鸟儿载歌载舞，宛转悦耳。湖里的荷花竞相争艳，清香袭人。

1950年，我在北京颐和园执行保卫任务期间，有幸为陈云游园护卫，和我一起执行这次任务的还有当地警卫部队的一些同志。

陈云同志下车后，我们发现跟随陈云同志的只有他的一位卫士长。“陈云同志是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为什么只有一人跟随？”我想，他的卫士长看我有些疑惑不解，悄声向我解释说：“陈云同志不让跟很多人，说挂像和他本人不很一样，目标不大。”

陈云同志身穿普通工作人员服装，非常朴素，不注意是不容易发现他中央领导人身份的。我立即走上前去，向陈云同志报告说：“首长，颐和园对外开放以来，游人很多，情况复杂。为了首长的安全，请首长一定要按照我们划定的路线走！”陈云同志马上风趣地说：“好！好！我服从就是。”

陈云同志在颐和园走的这条路线，也是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来时走的路线。在这里我们投入了很大的警卫力量，卖糖果、冷饮、照像、开饭馆的等等，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保卫人员。一双双雪亮的眼睛，每时每刻都在监视敌人的破坏活动，所以，这条路线我们又叫它“安全线”。

陈云同志看得很详细，从仁寿殿、知青亭、长廊、谐趣园到后山、后湖都看过了。颐和园原是清代的皇家花园，帝国主义侵入北京时，两次遭抢劫焚毁。清统治者慈禧太后为满足自己荒淫无度的腐朽生活，不顾国家民族安危，挪用海军经费进行修建。

这天，陈云同志的情趣很高，边看边向我们讲解清王朝的兴衰历史。他说：“清王朝统治中国293年，有康熙、乾隆134年的国力强、财政富裕的鼎盛时期，又有慈禧太后的丧权辱国。她先后垂帘听政近半个世纪，是清王朝中最腐败、最黑暗的时期，将中国拉下了差不多100年。颐和园就是历史的见证！”他又说：

“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勤劳智慧的民族。美丽如画的颐和园建筑群，还有被八国联军烧毁的圆明园建筑群，集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杰作，祖国的瑰宝。我们一定要保护好！”

2 中午，我将陈云同志带到听鹂馆（内部餐馆）就餐。这里是专供中央领导和国际友人就餐的地方，很安全。但是解放初期，这里还被国民党特务所把持。美蒋特务机关感到末日将要来临，妄作垂死挣扎，曾向全国各风景区派遣了大批潜伏特务，企图对我党政军首长进行暗杀活动。颐和园的听鹂馆当然就成了他们重点之中的重点。但是敌人的阴谋诡计是永远不会得逞的。因为他们干的勾当是反共反人民的，早已为人民群众所唾弃。

解放后，我们政保队只派驻颐和园一个区队。一经发动群众，这伙害群之马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的阴谋也随之土崩瓦解，潜伏特务被一个个挖了出来。从而，这座高级豪华的餐馆经过整顿，又充实进去我们的一些同志之后。这里又很快成了设备先进，服务一流，安全舒适的所在。

陈云同志被安排在后院一个房间里进餐。这时，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也可以轻松一下了，大家凑在一起又说又笑。正准备吃饭，忽见陈云同志的卫士长匆匆走来，他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陈云同志请你去陪他吃饭。”

“什么！你在开玩笑吧？”我惊讶地看着卫士长问。

“不，是真的！”卫士长认真地说。

我想陈云同志是中央书记，我一个普通军人，不满20岁的毛孩子，跟他一起吃饭成何体统。他要问我什么问题我能回答上来吗？说错了怎么办？太可怕了，不能去！于是我向卫士长解释说：“首长的盛情我很感激，不说你也清楚。咱们干警卫的是不准离开岗位的。我陪他去吃饭，这里发生了问题谁负责？请你一定代我

向陈云同志解释清楚。”

一会儿，卫士长再次来喊我，我又将他说服了。但是，卫士长很快地第三次又回来了，他很不高兴地说：“你的话我都向首长报告了，这次你自己向他解释去好了。”

这时，我已无话可说，只好无可奈何地跟着去了。

3

房间里，只有陈云同志一人端坐桌旁。他笑容可掬，见我进来，立即伸出手来和我亲切握手，边安慰我说：“我们一起吃顿饭，一会儿功夫；再说，那里还有很多同志警卫着嘛，不会发生问题。”

陈云同志的一番话，立刻将我和伟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拉近了，我紧张、不安的心情逐渐地平静下来。接着陈云同志又和我拉开了家常，他问我家乡住址、何时参军入党、年龄、读过什么学校等，我一一作了回答。陈云同志听后高兴地点头说：“我们之间职务的不同，只是社会分工而已；在我们党内和革命阵营内，都是革命同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政治上一律平等。”

在陈云同志操起筷子让我吃饭的时候，我才有暇向餐桌上扫了一眼。但见餐桌上只有几盘水饺和几个盛酱油、醋、蒜泥的小碟，此外再无别物。

奇怪！中央分管财政的书记，在第一流的高级餐馆里就餐，竟然吃家常便饭！餐桌上不但没有酒，而且没有菜。本来中央领导人在此用饭是有规定标准的；但实际上陈云同志这里的饭，还没有我们警卫人员的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按标准执行？难道是陈云同志降低了标准？我觉得作为警卫人员，为对首长负责，有必要搞清楚。我随即向陈云同志问道：“首长，您这里为什么没有上菜，是谁降低了标准呢？”

陈云同志解释说：“水饺，是中国人民的上等好饭。但由于中国的老百姓长期受尽战乱之苦，逢年过节也不一定能吃得上。我们能吃上水饺已经很好了，再要菜岂不是有些浪费！再说，现在

我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虽有好转，但还不是根本好转。我们要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困难还很多，因此中央最近又提出‘厉行节约，增加生产’的伟大号召。我作为分管财经工作的国家领导人，更应带头节约。”

吃过饭，我请服务员撤走碗筷，端上茶来。陈云同志端起茶杯喝了几口，又告诫我们说：“中国人民灾难深重，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侵略战争，后是蒋介石发动的三年内战。中国人民为革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们的革命事业离开人民的支援，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我们共产党人每时每刻都不能脱离群众，一定要牢固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过去搞革命如此，今后搞建设也是如此。”

陈云同志严以律己和胜利不忘人民，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终身难忘。陈云同志对我说过的话，40余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是鼓励我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动力；也是我保持好革命晚节的一面镜子！

（薛守鼎 整理）

一次难忘的采访

樊 铭 远

日前的一天，我打开书箱，翻出了《柏生新闻作品选》上、下册，又使我想起干新闻工作10年中最难忘的一次采访。那是1988年9月5日在北京中南海。

1988年3月，我被派到《科技日报》军事部工作，与王翰林、别清河一起负责军事科研、军事训练等军事新闻的采访、编辑工作。9月1日，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因报社采编人员紧张，林自新总编和新闻部主任陈冬便派我到大会采访，任务是每天两篇消息，外加一幅照片。1号至4号，我先后发表了《女科技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势必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科技工作要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我国妇女自身素质不断提高》、《全社会要维护女工和女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曾碧露创办香蕉组织培养工厂》、《关广梅的喜与忧》、《一个女教师的遭遇》、《别让女人难》等10篇稿件。个别稿件在大会上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山东、山西、湖南、黑龙江等11个省的部分代表专门到京西宾馆203房间看望我、鼓励我。

9月5日，全国妇联六届一次执委会全体会议同时推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为名誉主席，选举陈慕华为第六届全国妇联主席。晚上七时三十分左右，记者们得到消息：浙江省部分代表在陈慕华同志的带领下马上前往中南海看望邓颖超同志。我和新华社、《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16家

新闻单位的记者一同随去。

八时二十分，我们来到中南海邓颖超住处，一阵寒暄过后，邓大姐问陈慕华会议上生活怎么样，文化生活安排得怎么样，代表们的情绪怎么样等等。陈慕华一一作了汇报。接着，邓颖超同志转向浙江省妇联吴主任，问吴主任浙江有多少个女企业家、女科学家、女发明家，有多少农村妇女参加实用技术培训，有多少城乡妇女参加函大、电大等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学习。吴主任对邓大姐的每一提问都作了详细的汇报。在场的浙江省代表对邓大姐如此关怀广大妇女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我拍下这个场面，以《令人敬佩的老大姐》为题，后来发在《人民画报》、《中国妇女报》、《科技日报》上。

随浙江省代表去看望邓大姐的记者共16人，但只有我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郑群海是男性公民，大有“鹤立鸡群”之感。也许就因为我们是男同志，邓大姐倒关心起我们来。她问我是哪个报社的，当我回答是《科技日报》社樊铭远时，邓大姐显得很高兴。她说：“你写的《别让女人难》我看过啦，写的不错。你们当记者的应当为妇女向全社会多呼吁，多呐喊，为广大妇女创造一个良好的言论环境。”说着，邓大姐站起身来，在吴主任等簇拥下到书房取来《柏生新闻作品选》上、下册，对我说：“柏生是《人民日报》社老记者，一生采访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文笔好，工作作风很好。这套书是新近出版的，她送给我的，我再送给你。”我激动得不知所措，还是郑群海提醒了我一下，才知道伸手接过书。

6年过去了，我曾几次搬家，遗失不少物品，损坏不少物品，但邓大姐送给我的这套书却完好如初。我深刻地认识到，邓大姐送我的这套《柏生新闻作品选》是前辈对晚辈的关怀、爱护。邓大姐对我的教诲一直鼓励、鞭策着我在新闻事业上辛勤耕耘，不停地拼搏、追求。

怀念洪涛同志

周 乐 亭

1988年11月15日，在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殉国50周年大会上，原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幸存下来的几位同志又见面了。当时朝气蓬勃的青年，如今都是七旬老人了。但谈及往事，仍历历在目。对支队长洪涛同志，记忆犹深。

那是1937年的深秋，在中共山东省鲁西特委直接领导下，由我们二十来个知识青年，在堂邑组成一支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首任队长就是洪涛同志。他中等身材，瓜子形面孔，两只大眼炯炯有神，举止庄重，说话是南方口音。

为了保密，最初，他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当我们问他是怎样来到山东的，他说：“原系国民党军队的营长，因不满意国民党与红军打内战、自相残杀的做法，弃官经商，从南方买绸缎到山东来卖。‘七·七’事变之后，在济南一个旅馆里，和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政训处长张维翰上校相识，两人交谈甚为投机，成为朋友。在日寇大举侵犯的情况下，应张处长之邀，又弃商从军，来到聊城政训处。”

早晨，他带我们出操，进行制式训练；上午教我们站岗、放哨、瞄准射击、利用地形地物等。无论在操场上、课堂上、还是在野外，他总是循循善诱、和蔼可亲。即便我们做错了动作，也

从不发脾气变脸色。此前，我曾在济南齐鲁大学参加过一个月的山东省高中学生暑期军训，以后又在济宁潘家花园受过三个月的军事训练；感觉到他的作风和训练我们的那些国民党军官大不相同，怀疑他不是国民党的军官。

过了一段时间，他向少数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原名洪遇良，是江西省横峰县人。由于家庭贫困，幼年给地主放牛和当长工。1928年，16岁的时候参加了红军第十军，当过战士、司号员、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七·七”事变后，奉命来山东；并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到这里任队长，开展抗日游击战。

知道他是红军团长以后，我们对他更加敬重，并请他讲惊天动地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情况。他把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讲得很生动；特别是过草地的时候，断了粮，就把皮带洗一洗和野菜一齐放进锅里煮着吃。他有时还讲游击战术，讲用袭击、埋伏等方法，以低劣武器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故事。

有一次他带我们到一个接近敌占区的村子去宣传。晚上，村民说日本鬼子向这个方向出动了。他把部队带到村外一块空地上，镇定刚毅地宣布：“现在发生了敌情，我们决定立即转移。一班为尖兵，三班为后卫。前面发现敌人，一班扫开，后面发现敌人，三班消灭。”他简短的几句话，使我们心情振奋，斗志昂扬，沉着地向指定的地方进发。

又一次，我们正在院内擦枪，听到外面有人呼喊，鬼子从东面来了。洪涛果断下令：“一班沿村中大路由西向东，从正面迎击；二班出西门，从村北面向东门迂回；三班出西门，从村南面向东门迂回；三路夹击敌人。其余的班撤到村外西北角一块坟地里，隐蔽集结，待命出击。”我随三班，持枪从村南面跑步前进，到达东门与一、三班会合，并未发现敌人。原来又是有人造谣，企图动摇军心。

这两次行动，虽然都未与敌人交战，但大家对他这种沉着冷

静的态度，刚毅果断的决心，机动灵活的战法，都十分钦佩。认为这是难得的两堂生动的军事课，使我们从中学到了指挥作战的方法。

由于我们的部队不断扩大，枪支却没有来源，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产生了急躁情绪。不顾统战政策，提出了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的口号，强行借取地主的枪支，引起当地士绅的不满。他们指示民团，于12月中旬的一天，把我们围困在堂邑大觉寺一座孤庙里。

这一天洪涛心情沉重，唯恐发生武装冲突，造成人员伤亡。白天，他在寺外反复察看地形，布置防御阵地，准备抗击。我们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事态严重，有点紧张；但总觉得有他在场，定会转危为安，逢凶化吉。夜晚，民团从寺南面向我们发起进攻。洪涛命令守南门的一个班鸣枪警告，阻止民团前进，然后和党支部书记李福尧，走出工事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喊了几次后，对方停止进攻，互派代表，进行谈判，商定和平解决。达成协议后，洪涛对我们说：“抗日是长期的，我们要从长远着想，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我们这支力量，现在可做暂时的局部的让步，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一）退还一些强借来的枪支；（二）明天我们一支队撤离堂邑，返回聊城。

天亮以后，我们整队出发，返回聊城，住到山东省立聊城师范校院内。此后，再没有见到洪涛。我们对他十分想念，感到若有所失。后来知道他调到泰安地区，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游击第四支队司令。1938年5月，在反顽作战中，大显身手，指挥三个团苦战三昼夜，击溃敌人十多个团的兵力，战功卓著。战后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年仅26岁。对这位杰出的红军青年将领过早的离开人间，我们感到很悲痛，很惋惜。

洪涛同志是我一生中接触到的第一个红军干部。从他身上，体现出红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引起我们对红军的热爱与向往。

1985 年春，我到泰山脚下的烈士陵园，在他墓前致敬默思。他的音容和英姿又显现在我面前，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所知道的聂湘溪先生

公 符

聂湘溪原名聂澄泽，聊城后军屯人。清光绪 16 年（公元 1890 年）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里。

先生自幼聪慧过人，5 岁就读，11 岁读完《十三经》，13 岁应东昌府试，虽未售，然有聊城才子之誉。戊戌变法后，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年 17 随其父宝琳公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18 岁，父歿，家道中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求亲告友，典卖家产，更笃志于学，因而在毕业时获得优异的成绩。而先生犹以为学识不足，决意深造，又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习。此间焚膏继晷，孜孜攻读，获得渊博的知识。

北京大学毕业后，正值王祝晨（建国后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当时是反封建的激进人士）任聊城二中校长，便聘请湘溪先生前来二中任教。当时把学校办得相当出色，培养出大批人才。湘溪先生对学生认真负责，循循善诱，而在为人处世和教课方面，深受学生的景仰和爱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间，民国初建，为一反帝制，提倡剪辫子，剃秃头，先生首先响应履行，因而遭到乡邻诽议，亲朋侧目，慈母不准进家门的责难。现在看来，这是无足轻重的琐屑小事，但在当时来说，则是离经叛道之举。聂湘溪这个才子，因剃秃头而又远近闻名了。时在 1915 年，由于袁世凯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国辱权的二十一条，引起全国

人民的极大愤慨；此时先生与王乐平（国民党员）等以山东学生代表身份，赴京请愿。当走进总统府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持刀，布置森严。接见者为外交次长曹汝霖，在他的恐吓下，四位热血青年，威武不屈，慷慨陈词，晓以民族大义。说得曹汝霖无言以对，只好教侍卫边说边劝，连拉带拽，把他们赶了出来。

1918年山东省议会改选，先生被选为省议员。此时，虽离开了教育界，但念念不忘教育事业的发展。原在聊城二中任教时，即与校长王祝晨研究过解决学生毕业后的出路问题，使王祝晨与济南一中校长赵星海，同赴北京，接洽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创开了自费留法的一条道路。先生又与基督教长老会德牧师（美籍）商定促劝学生孙清晨（曾任聊城师范校长）等创开自费留美的一条道路。1920年夏，先生与王祝晨、鞠思敏、王乐平等在山东省议会建议并通过留法、留美补助自费生名额预算，使得公费与自费留学生继续增加，为山东省出国留学生开辟了道路。

当时山东省议会，分为两派，一是以张公制（议长）为首的胶东派；一是以王鸿一（副议长）为首的鲁西派。此时，先生与王鸿一志趣相投，见解一致，在反对军阀政府腐朽的政治方面，尽到了一个省议员的职责。因而也招致了山东省督军张树元的压制，斗争相当激烈。其间张树元贪污军饷三百万元，事泄后，先生与王鸿一、王乐平等核实的张的克扣军饷、吃军队空额的罪状，由议会提出弹劾，电告北洋政府，张树元因此案而被去职。

在1929年左右先生曾任石友三的秘书长。1930年石友三任山东省主席时，曾委以山东省工商厅厅长的职务，不过为期很短；那正是中原大战期间，冯玉祥、阎锡山失败后，冯、阎下野，先生也随之赋闲了，一直到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其侵华的目的，以中日亲善为名，在日本举行祭孔大典，并邀中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指名要孔子的七十七代嫡孙孔德成前往出席。当时中国政府考虑，日本名为祭孔，实怀鬼蜮，不敢叫孔德成去，怕

软禁在那里回不来。于是便选派了孔氏旁支的一位爷爷代表孔德成去。此人忠厚有余，而昧于国内外的局势，典章祀礼，也茫然无知。因此山东省政府又指派了两位：一是精通儒家学说并谙古典礼制的、当时山东唯一一个在世的清朝老翰林；一是古今知识兼备而又善于交际的聂湘溪，并委以凡在大典场面安排，一切交往事宜，由聂先生相机处理。由于孔德成没有出席，日方恼羞成怒，在祭孔期间有意刁难这位不谙时事的衍圣公。聂先生则审时度势，与之周旋。考虑有些场面衍圣公能以应付的，则令其出席；不能应付的，则托故回避，再由他人代理。在祭孔大典前前后后十余天内，不论是官方集会或私人宴请，由于聂先生的妥善安排，不卑不亢，没辱国体，使日本帝国主义假祭孔以包藏祸心的伎俩没能得逞。礼成归来，当局满意，国人称是，于此可见先生之才学了。

1935年，张自忠任天津市市长，先生又被邀出山，任张的秘书兼传习所所长（培训行政人员）。“七·七”事变爆发，天津行将沦陷，各机关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当时他的会计主任翟东升向他请示：节余的两万元公款，如何处理？他说全部交上去。这与那些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见利忘义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了。无怪乎翟东升逢人就说：“‘清廉’二字，湘溪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芦沟桥的战火日益扩大，日本帝国主义调兵遣将，暗中集结，大举进逼。鉴于敌我形势，为使二十九军免受日寇的包围、袭击，在战略上能得以安全转移，宋哲元（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二十九军军长）命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兼北平市市长，暂时留在北平，虚与周旋，以为缓冲之计。际此危难之间，聂先生随其左右，忧患与共。此时张自忠忍辱负重，遭全国之唾骂，受世人之诋毁，而也殃及先生。迨二十九军撤离后，旋即被日方识破。先生与张决计秘密离北平南下，避开日、伪的监视，闯过关卡的盘查，微服乔装，于9月3日，由北平抵天津。在英租

界工部局副局长（英国人）家，张自忠、聂湘溪、李桐文（军需人员）三人会集。9日，乘英国商船“海口号”南下至济南。尔后，张自忠给聂湘溪的信中说：“昔日之事，今已昭雪，吾侪亦可自慰耳。”

抗战伊始，华北沦陷。范筑先将军在鲁西北竖起抗日大旗，广络爱国志士，抗日救国，共赴国难。湘溪先生以社会贤达身份，参与其事。此间，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驻阳谷县张秋镇，曾委以山东省政治部主任职务，而先生坚辞不就。根据他多年的社会经历，认为新生事物必然战胜腐朽的东西。历史上的清王朝、北洋政府，都是保守的、顽固的，由国民党取而代之；今天的国民党，将来一定由共产党取而代之。新生战胜腐朽，先进代替落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先生之见，可谓高明的了。

聊城失守，范筑先将军阵亡。八路军深入敌后，在鲁西各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为了贯彻上级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特别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聊城地区行署专员谢鑫鹤，聊城县县长张侠，县二区区长谭启明等同志，曾多次到聂先生家拜访，宣传我党政策，并听取他的意见，都谈得相当融洽。只要是抗日人员到他家，总是热情相待，从不冷落。他是聊城东南一带大户，在向抗日政府交纳抗日财粮方面，积极带头，因而使那一带的征集工作极为顺利。更可贵的是先生在极其严峻险恶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生命财产的安危，以其威望掩护了我抗日军政人员的安全，保全了革命力量。聂先生的确是一位正直爱国、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有识之士。

1947年，先生因病与世长辞，享年58岁。原聊城县抗日县长张侠同志回忆说：“他的病逝使我党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虽然他已离世，但先生的音容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以惋惜的心情怀念着离别近50年的这位老朋友。”

李士钊与武训

邢培华 张庆年

李士钊先生（1916年10月——1991年3月），山东聊城人，早年就读于私塾、省立中学和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他的一生，与武训结下了不解之缘，为武训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推动武训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

李士钊先生说过，他的生比武训的死晚了二十年。在他十岁以后，就片断地听到许多有关武训的故事。那时，他在原籍聊城居住。一九二八年秋天，他在陶行知先生“平民识字课本”中看见一篇关于武训的故事，加深了他对武训的印象。一九三三年，他进入省立第三师范高中师范科学习，又在各种有关的教育典籍上，读了不少武训资料，初步了解了武训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他认为“武训先生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远在欧洲教育史上的裴斯托拉基以上”。从此，他产生了对武训研究的兴趣。

一九三四年冬天，山东临清举行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大会。他请了三天假，跑去临清参加大会，拍照片，听报告，并实地参观了御史巷武训小学，见到了武训画像原稿和武训时常进出的院落。当时，他认为，作为一个“以教育事业为职志的师范生，对于武

训这样的人物，感到十分亲切可爱，奉为足以师法和衷心崇敬的先哲”。从此开始，他就对武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成为武训问题的热心人，久而久之，对于武训问题的研究，就成为他的一种特殊追求。一九三七年，他看到段承泽先生和孙之隽先生合作的第一部“武训画传”在天津大公报上连续刊载时，就每天以兴奋愉快的心情，把它逐日剪贴在一起，觉得武训热心办学的精神，已经获得后世的知音者。一九三八年，他又利用机会去柳林参观，目睹了武训的一件旧棉袍子和一个破旧的布搭子，游览了武训的墓园。每当有新的武训资料问世，他总是想方设法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精心保存和宣传。一九四八年，他就收集了133篇文章，达几十万字。到他晚年，他所占有的资料就更多了。每当有人因有武训问题向他请教时，他便会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地讲起武训来。这种义不容辞的宣传武训活动，他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因此每当有人提起武训来，便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起李士钊先生来，把李士钊的名字与武训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

解放前，李士钊先生曾多次参加武训纪念活动。但与他本人联系最密切的、影响比较大的有二次。

一九四六年，在陶行知先生的协助下，上海武训补习学校创办起来。可是，正当武训学校正式开课之际，陶行知先生却因病逝世了，因此武训学校校长一职便由创办人李士钊先生担任。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批准办社会大学的情况下，他们创办武训学校，是一种弘扬武训兴学精神、宣传民主的好形式。在这所学校里，他聘请了许多知名的进步人士任教，比如郭沫若先生、邵爽秋、臧克家、孙起孟、方与严、张文郁、孟秋江、石啸冲、焦敏之、姚雪垠、赵纪彬、田仲济、丰村、徐昌霖等。一九四六年十

二月五日武训诞辰纪念日，他发起组织举行了武训纪念大会。大会邀请百余名代表参加，并在会场悬挂“武训画传”百余幅。他不仅担任大会主席，主持大会，而且报告了武训纪念会的意义。会上，他还郑重请孔祥熙做了特别演讲；继之则由刘王立明、邵爽秋、臧克家三位先后分别演讲。这次会议盛赞武训活在人们的心上，使更多的人认识了武训，扩大了武训的宣传和影响。十二月六日，上海文汇报专门做了有关报导与专论文章。此外，他还邀请参加陶行知葬礼的董必武老人为上海武训学校题写了“行乞兴义学，终生尚育才”的楹联。

一九四九年，是武训诞辰 111 周年。这一年的纪念会在北京召开，有 800 多人参加，他以上海武训学校校长身份参加了大会。事前十二月四日，在北海悦心殿举行了预展会，把段承泽、孙之隽的《武训画传》104 幅全套以及武训诞辰 107 周年、108 周年、109 周年诞辰纪念的许多有关材料一一展出。十二月五日举行扩大纪念大会，光明日报特地报导了上海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先生参加了大会，大会报导李士钊先生的发言说：“过去，在反动派统治时期，陶行知先生在重庆纪念武训，曾遭迫害，今天能在人民的首都开会纪念武训，实在感到愉快万分。”

(三)

李士钊先生不仅热衷于武训宣传，而且还是武训研究的专家。对于武训，他有两本武训编著，在武训研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一是《武训先生的传记》。这本书是他一九四八年编辑的，由上海教育书店出版。这本书编辑了武训去世后五十年以来的各种传记史料，共收录了 15 篇文献，计有梁启超、刘子舟、王铁梅、陈代卿、冯玉祥、傅振伦、张默生等人撰写的武训传记文章和李瑞阶、周拔夫的两篇武训年谱以及段承泽的《〈武训画传〉注

文》，是一部有相当史料价值的武训研究史料。这部书在当时集武训传记史料之大成，后来被许多传记资料索引和年谱类书目文献所引用所收录，为武训研究提供了宝贵史料。

其二是《武训画传》。这部书是李士钊先生与孙之隽先生合作的作品，李先生注文，孙先生绘画。本来孙之隽先生从一九三六年起就一直从事武训画传的绘画工作（和段承泽先生合作），后来这部武训画传一连六次再版，陶行知先生曾把它译成英文，分别介绍给国外的朋友。一九四九年冬天，他们根据李老多年收集来的武训史料和孙先生对第一次画传的技巧与观点许多地方不满意的情况，乃下决心将原来那套画版废弃，重新改定史料，并尽量改正过去武训传记中纪年、纪事和人物姓氏的错误，合作新的《武训画传》。一九五一年一月，《武训画传》由上海万叶书店出版。这部画传是武训兴学形象化的史料记载和艺术品，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又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是武训研究史上的又一力作，也是他二人心血的结晶，受到很多人的赞扬。然而，所难以预料的是，这部书出版不久，就出现了《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并继之由学术讨论发展成为政治批判。在这场运动中，李士钊先生经受了很大政治思想压力，不仅当时公开做了检查，而且在后来的文革中，也一再受到非难，受到贬谪。正如翟向东《哀悼士钊兄·附记》所说：“伊因《武训画传》罹难，继之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复遭折磨。”一九八〇年李士钊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当时因武训批判而受迫害和牵连的人，全国大约有几十个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孙瑜和他本人，他是受害者的二分之一。

（四）

一九七六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沉默了三十多年的武训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一九八〇年，

张经济率先在《齐鲁学刊》上发表了《希望为武训平反》的理论随笔。紧接着李士钊先生在《齐鲁学刊》发表了《对〈武训传〉问题应进行学术性探讨》的文章，提出《武训传》问题是学术性问题，不是政治性问题，对武训这个历史人物也应当重新评价的观点。此后，他又通过给领导人写信，在有关会议上发言等多种渠道呼吁对武训问题进行再评价；同时他也多次赴聊城、冠县、柳林等地重新了解关于武训的情况，收集武训的资料；还见到了武庄武氏族入冒着多次危险保留下来的《兴学始末记》、《兴学创闻》等有关记述武训史料的书藉。

一九八五年，他在北京参加了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亲耳聆听了胡乔木关于《武训传》批判和武训评价的讲话。胡乔木同志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同时还指出，1951年的《武训传》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李老听了这个“负责任的”讲话，当时就“激动得眼睛湿润了，泪水止不住落了下来”。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了在柳林召开的武训逝世九十三周年暨武训墓揭幕大会。这次大会，是柳林的广大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在这次大会上，省、地、县有关领导同志给重新修复的武训墓揭幕，并成立武训纪念馆筹建小组，恢复了武训纪念展览。然而使人难忘的是，在会议前夕正当人们愁苦如何办武训纪念展览以及缺乏展品之时，李士钊先生却赶来了。他身上背了一个好大的包袱，从里面抖落出一大堆有关武训的史料和名人题词。如果记得不错的话，题词中有伍必端先生重绘的武训画像，吴作人先生题“武训先生故居”，臧克家题词，戈宝权题词，廖辅淑题词，胡洁青题词以及徐运北的题词；有关武训书籍有张道平《行乞兴学的武训先生》、《武训九七诞辰纪念册》、《兴

学创闻》、《兴学始末记》，张默生《义丐武训传》，柏水《千古奇丐》以及他个人编的《武训先生的传记》、《武训画传》等书籍的复印件，还有一些各种会议上的有关武训的资料等。这些材料足足办了一个武训展览。他说，我这一生，把这些东西交给纪念馆，也是我的一个交待，我也就放心了。话虽不多，深情居在。在这个大会上，他看到广大群众对武训的爱戴，联想起自己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在发言时他竟泣不成声，几乎是蘸着泪水把话讲完的。多遗憾啊，自从这次会议离开柳林以后，不久他就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这位几十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的老人，竟再也没有能够战胜疾病的折磨，……。

李士钊先生走了，从此在武训问题上少了一位热心人。李士钊先生虽然去了，但他对武训的深情，他为武训研究做的贡献，却铭刻在人们的心上。

台岛肠断客 痴心兴乡学

孙元芳

春来万里客，肠断江城雁。

乱定几年归？高高向北去。

——杜甫《归雁》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多少人被金钱充塞了头脑，有钱了，但更自私了，自私得什么也不愿付出，不愿奉献；在海外，也有许多人，眼瞅国内经济的发展，千方百计

地研究如何发“大陆财”。与这种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态势相反，在台岛，竟有这么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在6年中，4次从台湾返回大陆，3次向家乡无偿地捐赠人民币11.5万元，美金6.6万元及两万美元的永久性存款利息。资助故乡建起了幼儿园、农村技术学校和城市职业中专学校。他这种情系桑梓、痴心兴学的精神在海峡两岸传为美谈。国内《人民政协报》、《联合周报》、《聊城日报》；台湾《民生报》、《联合报》、《联合晚报》等都作了详尽的报导，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这位被鲁西人民誉为当代武训的老人，便是山东聊城籍的台胞刘珍鉴。

刘珍鉴，1910年生于聊城市河洼刘村。19岁那年毕业于聊城县立第三师范。他热心教育，立下兴学之志。几经周折，创办了河洼刘小学。正在他致力于教书时，抗日战争暴发，学校无法开办下去。国难当头之际，刘珍鉴投笔从戎，历经战乱，流落到台湾。

离乡居台近50年，刘珍鉴一直深深地怀念故乡。斗转星移，岁月流逝，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对在聊时所兴之学，常记挂心怀。1986年，他冒着台湾当局尚不支持回大陆探亲的危险，绕道日本回到山东来到聊城。长期远离家乡，又受不同政见的宣传影响，初返大陆，刘先生疑虑重重。但回乡后的所见所闻，使他惊喜交加。回聊后，受到当地党和政府的热情接待，有关领导同他游览了家乡的名胜古迹，参观了大型现代工程。家乡的骨肉同胞更以赤诚炽热的亲情欢迎他。这一切使刘先生无限感慨和激动。他说，这次回到家乡，有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能受到这么热情的接待，“我有何功德，劳家乡政府如此厚爱？”二是没想到家乡变化如此大，发展这么快。当他看了自己的故居和参观了如今的河洼刘乡村完小后，当即向这所小学捐赠人民币1.5万元。

返台后，刘先生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家乡政府的热情关怀，故乡人民的亲切款待，一幕幕萦绕在脑际。故乡的学校比过去是大

有发展，但受经济制约，一时还不能令人满意。为了报答家乡父老的厚爱，实现自己兴学的夙愿，他想为家乡的教育再做较大的资助，献上海外赤子的一份爱心。可是，待估算了自己的财力，他不禁为难了。退休前，他在台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薪金不高。退休后，领取不多的退休金，没有其他收入，积蓄并不丰厚。经过深思熟虑，想把自己的一块宅基地卖掉。这块宅基地是10年前退休时购置的，而今地价涨了几百倍，卖掉它，可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现款，便跟夫人张德菊商量。从大陆自幼结发的夫妻，他们感情深厚，德菊女士既理解丈夫的心意，更深明大义，经慎重斟酌，支持了刘先生的抉择。主意已定，便付诸实施。1988年6月，刘珍鉴再度回到聊城，捐资10万元人民币，帮助家乡建起了农业技术学校，并投资把他的故居加以整修，献给公家，让村里做了幼儿园。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谣言随之传到台湾。刘珍鉴不受谣传所惑，毅然接受聊城的函邀，偕夫人回大陆参加他所资助学校的开学典礼。路上，目睹了动乱情景，心中甚为愤慨。因年高体弱，加上旅途劳累，结果病倒在济南。他在住院治疗中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渴望统一，憎恨列强侵略的显明立场。诗中说：“列强有钱有势，涉我内政，无理取闹，气焰凌人，足使我们警惕！莫彷徨，莫回顾，莫走回头路，勇往直前，迎头赶上，柳暗花明，胜利在望。有信心，有毅力，有忍耐，莫心急，全国一定要统一。”

1991年7月，刘先生第4次回到故乡。把自己全部的卖地款，加上儿子给的一百万新台币带回大陆。向聊城市捐赠6.6万美金，用于扩建聊城第二职业技术中专。又捐赠两万美金的永久存款利息，用于他家所在地北杨集乡学生们的奖学金。

为了给家乡捐资兴学，刘先生不仅卖掉了自己在台的资产，而且还节衣缩食，俭朴度日。在返乡探亲途中，路过上海时曾在候

车室过夜。在南京住旅馆，只住 19.4 元的低等房间。用餐只吃 1 元多人民币 1 斤的蒸包。刘先生对家乡公益事业是那么大方洒脱，对自己的生活却如此吝啬，真令人钦敬。

刘珍鉴热爱家乡，乐于奉献的精神，在聊城市引起极大反响。为弘扬他这种无私、高尚的精神品德，河洼刘村为其在小学校内立碑纪念，在碑上刻写了刘先生和夫人共同编撰的兴学重教短文《栽一棵希望的树》，用以教育子孙、启迪后人。当地政府决定，以他名字中的“鉴”和他夫人名字中的“德”两字，定“鉴德技工职校”和“聊城鉴德职业技术中专”两个校名，分别挂牌于他捐资的两处学校，并聘请他为名誉校长。政协山东省聊城地区工作委员会于 1991 年 7 月给刘珍鉴先生发去贺辞，表达了鲁西人民科教兴聊的宏愿。贺辞最后说：“您捐款兴学，报效祖国的模范行动，将鼓舞政府和教育机关更致力于办好教育，发展科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为建设国家做出较大贡献，使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更加强大，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于世界东方！”

1993 年 9 月 28 日，84 岁的刘珍鉴先生病逝于台湾。噩耗传来，家乡人民无不悲恸万分。追念先生生前致力于科教兴国和对家乡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慨万端。原地区政协工委主任许继善同志，含泪书写悼电，称刘先生精神不死，丰碑永存。

何器之在聊城二中

王文昭

何器之校长离开人世十几年了。但他在聊城二中创建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和那为人所仰止的德行，常使人感怀，让人钦佩。现将他的事迹录志一、二，以奉读者。

一、摘掉“大高小”的帽子

聊城二中的前身是“聊城县中”，创立于1950年秋。该校是在山东省教育厅部署“各县都建一所中学”的形势下诞生的。建国初期，百废待举，一个县建所中学的困难可想而知，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教师。

因为校舍困难，先建于乡下老韩庄，后迁至东关街；1952年才定校址在今天四中这块地方。最初只建了3个教室，1个办公室；总务处、教导处设在民房杨家院内。桌凳是从小学里抽调的；教师也是从各完小选拔的。50、51两年只招三个班，150多个学生。这与当时运河畔的“聊城中学”（今天的“聊城一中”）相比，社会上不承认县中是中学，都戏称为“大高小”。绰号的由来：一是校舍差，班数少；二是无设备；三是教师青一色是从完小调来的，绝大多数是后期师范毕业生；四是学生来源是考“聊城中学”的落榜生。当时有不少在县中念了一年第二年再考“聊城中学”的学生。故而老师有自卑感，自认为是二牌儿中学教师，学

生自认为是在县中学上补习班。学校发给的校徽学生上街时摘掉不戴，嫌丢人。

何校长面对学生教师这样的精神面貌，他在校会上讲、在教工会上讲：“我们与聊城中学都是党办的中学，革命有先后，建校有早晚。我们是刚建的中学幼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短期内发愤图强，积极搞好教学质量，赶上聊城中学是有决心、有把握的。我们提出目标：决心在三、五年内摘掉‘大高小’的帽子。”1952年，县中又招了4个初中班1个师范班。学校规模扩大，教师队伍扩大，校舍作了相应的扩建，这一年县中奉省教育厅令改名为“聊城第二中学”。原来的聊城中学改名为“聊城一中”。

在学校党支部领导下，1953年学校建立教育工会、教师团支部、学生团总支；几十名教师建起了各科教研组；组织健全，领导得力。在“摘掉大高小帽子”思想的激励下，教研组相互听课，积极开展教学研究；班与班开展学习比赛，都争“学习冠军”的流动红旗。结果，1956年聊城二中五级毕业生考一、三中高中一年级的升学率超过了一、三中的初中部。从此“大高小”的帽子摘掉了。

二、以身作则不以权谋私，不搞特殊化

聊城二中招四级学生时，招了3个初中班。当定录取新生名单时，招生组发现何校长的大孙子何振邦差三分不够录取分数线。招生组的同志反映到何校长那里，有的老师说：“振邦只差3分，录取了吧。”何校长沉下脸来说：“我在前天午睡时，醒来发现有位领导同志给我送去两个西瓜、两个面甜瓜，瓜下压着个纸条，上写：‘我的儿子去考你的中学，请多关照。’咱近水楼台先得月，象这样的近水楼台怎么处理呢？”结果招生组没敢录取何振邦。

二中校址迁到陈庄西头后，他本人除有一个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外，与老伴就住在学校东南隅一块三角地北头上。两间平房面积不足20平方米，三角形的天井里，支着一盘小水磨，拐豆浆

与米面糊。北邻就是学校的老木匠高师傅，高年老多病，没有老伴照顾，常到他家吃饭。当时校院闲地多，一部分种菜供大小伙房吃，一部分卖给家属。何校长一家住在学校里，他的老伴没有私拔过学校的一棵菜。

三、关心教职工的婚丧病死

学校建立之初，有几个外地的大龄男教工没成家结婚。他提出以他为首成立一个“操心委员会”，专门为大龄教工物色介绍对象，并借钱给他们办喜事。如郑中一老师是北京密云人，30多岁还没结婚。何校长把他村来考学落榜的杜凤娥介绍给他；炊事员宋家祥的爱人，也是这样与宋成家的；江苏教师李一鳞年近40岁还是独身，他托人为他介绍了个寡妇，并把李的老娘从江苏老家接来，建起了一个美满的家庭。1962年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毕业生王××暑假分配来校，一天课也没上就染上了肺结核病。何校长把他送到专医院请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并叫他的未婚妻为其护理。虽然经过半年的治疗无效，终于死亡，但何校长对教工的关怀留在了大家的心中。

四、端正校风，严禁师生恋爱

何校长认为，人民将子女交给我们教导，做教师的只有教育爱护的义务，没有欺骗玩弄的权力；老师是成年人，学生是正在成长的未成熟的青少年。虽在当时有的师生年龄相差不大，但师生之间婚恋，老师难避欺骗之嫌，因此应坚决制止。五、六十年代二中因师生恋爱被辞退的教师达4人之多。师生恋爱一经发现对教师立即辞退或给以严肃批评。

五、狠抓教学，听课代课

何校长十分注意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除组织教研组开展公开教学或彼此互听外，他手提“麻扎”随时走讲教室听教师的讲课。课后他认为讲得好的，当即鼓励，并叫他总结经验予以推广；不好或有缺点的，即提出意见，循循善诱，帮其提高。如果教师

请假有无人上课的空堂，他即拿起课本登台代讲。何校长是三十年代的上海矿业专科学校毕业生，精于数、理，故能不备课就能登台讲授。1959年何校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官后，又在五中任过“几何”教师一年。

何校长是名符其实的二中奠基人，当之无愧的校长。在他任职期间，一直是1956年工资改革时定的级别——干部十七级。每次调整工资，他都谦让别的教师。

何器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薛守鼎 整理）

扎根基层五十年 肝胆照人寓平凡

葛 渊

顾延成同志，蒋官屯镇小顾庄人，是建国以来全市农业战线上的先进人物。生前曾任广福刘大队党支部书记、战区书记、乡长、社长、公社党委委员等职，为党的事业奋斗到80高龄，是我市农村工作时间最长的不脱产干部。从1954年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他连续12年被选为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省党代会代表、省人代会代表、省烈军属代表；并于1956年秋季参加全国农业劳模代表团，参观了北京苏联农业展览馆，见到了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

革命家庭 一门双烈

延成同志1909年(宣统元年)农历7月出生在一个开明家庭。父亲顾金贵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名流，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当时响应孙中山教育救国的倡导，顺应时代潮流，变卖家产供8个儿子读书，都分别达到大专、高中和师范程度，在不同岗位上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延成在兄弟中是大哥。1938年日寇侵占华北，对解放区实行封锁扫荡，企图消灭抗日力量。这时他为八路军马瑞锋部筹措物资，不顾生命危险，奔走于山东与河北之间，穿过敌伪几道防线，

为部队运送棉花布疋，解决战士的被服困难。父亲去世后，他作为一家之长，鼓励二弟延帮投考黄埔军校，在抗美援朝期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师司令员。四十年代，在解放战争中又送三弟延笃、四弟延铎参军，分别在杨勇和曾思玉部担任连长、排长等职。1946年在解放开封与郛城战役中先后牺牲，一门双烈。这时延成同志没有灰心，他化悲痛为力量，鼓励全家继续革命。遂送五弟、六弟、七弟和长子先后参军，继之又送次子参加抗美援朝。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和革命斗争的锻炼，顾家已成为一个兴旺的革命大家庭。全家有50多个成员分别在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工作，其中有军级、县级、区级干部多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并保持着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受到人们的称赞。

为社会主义奋斗终生

1951年，延成同志响应党提出的“农业走集体化道路”的号召，在城东率先办起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实行劳力、牲畜、农具合伙使用，集资打井。这年他们第一次在大田里利用水井浇地，打破了几千年来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同时他从临清引进“代字棉”良种，大面积种植，改变了聊城农业单一种粮的生产模式，为发展农村经济创出了新路。当年互助组粮棉丰收，带动城东几十个村庄很快地走上互助生产的道路。冬季他被县委推荐出席平原省农业积极分子大会，受到表扬。1952年秋后，他又联合7个互助组在全县第一批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经营。1954年领导大顾、小顾两个村联合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按照县委指示，扩大为一乡一社，包括19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1230户，5560人，耕地2.1万亩，实行政社合一，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他担任第一社长，在农村经济体制的剧烈变革中，掌握政策，做过细的思想工

作，稳定社员情绪；农业连年丰收，受到省、地、县三级的表扬。

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转向建设的关键时刻，1958年农村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一些人为了争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公社追求一大二公，对土地、劳力和财产统一调配，实行穷队富队拉平。加上59年和60年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饥饿，疾病普遍发生。当时延成同志敢于坚持正确路线，从群众利益出发，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共产风和浮夸风，保持了生产元气。小顾庄丰衣足食，人欢马叫。1960年除完成国家征购粮1.7万斤外，还无偿地支援兄弟队粮食3.3万斤，当地群众夸他是社会主义的好当家人。

六十年代，他致力于改造涝洼和科学种田。首先领导群众治理聊城有名的“旧州洼”，修筑台田，开沟排水，战胜了1961年和64年的特大水灾。中国水利科学院来聊考察，肯定了台田的增产经验。改造涝洼后，群众敢于在洼地种植棉花。1964年他发动附近8个村扩大棉田1400亩，普遍丰收。秋后各村在银行存款共17万元，成了全县的富裕村。延成同志在科学种田上善于探索，为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早在六十年代就进行了立体种植。在小顾庄的100多亩枣园里试种棉花，实行枣棉间作，枣园周围种上金针菜，每亩综合收入1600多元，比单一种植增产一倍多。同时又在小麦地里套种油菜、大蒜，玉米地里套种瓜菜、小杂粮等，变一年两收为三收四收，有效地改革了耕作制度，为当今农业优化生产结构，实现高产高效提供了经验。

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没完全过去，他在群众的要求下站出来，重新担任广福刘大队党支部书记。年过花甲的延成同志，又振奋精神，领导群众大搞水利建设。他带着200多名劳力，冒严寒顶风雪，手脚冻裂不下工地。连续三个冬春挖土36万方，修筑排灌沟渠10条，长达27华里。全队耕地划成12个大方，增打机井，植树造林，修建乡村道路，完成了园田化建设，改变

自然面貌，促进农业大幅度增产。七十年代全市农业生产发展迟缓，各地都处于徘徊状态，而广福刘大队每年棉花亩产超百斤，粮食亩产超千斤，比一般队增产30%以上，提前跨入全省先进行列。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1980年他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先后建立了砖瓦窑厂、麦粉加工厂、铁业木业厂、鞭炮厂、畜禽饲养厂，集体和群众共同走上了富裕道路。1990年人均收入近千元，家家用电，住上了新房，80岁的顾延成领导农民奔向了小康。

廉洁律己 乐于助人

几十年来，他担任农村基层的领导工作，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讲究吃穿，不贪图享受，衣食住行保持着一般群众的水平。庄乡们多数都盖起了砖瓦房，他还住着三间土平房，骑着旧车子，穿着旧衣裳。在队里办公不多占，不吃请，外出办事不要补助，凭着自己健康结实的身子为群众东奔西跑，日夜操劳。

他有多方面的经济来源，除了个人的劳动收入和干部补贴外，兄弟和儿女也不断给他寄钱。自己省吃俭用，对别人却慷慨解囊。凡是婚丧嫁娶、看病住院、修房盖屋，有困难向他张口的都热情相助。有的借钱不还，从不计较，外边欠他多少钱连自己也说不清。

延成同志热心教育事业，多年来致力于希望工程。过去学校的危旧校舍，经他手全部翻盖成新房，折去泥台子，换上新桌椅。他经常关心老师的工作和生活，多方面予以照顾。一位城里的教师把家属搬到小顾，教书18年不愿离开。延成同志隔几天就到学校看看，对家庭贫寒子女，他都自己掏钱为孩子买书藉文具，鼓励学生好好学习，长大了为党工作。

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到困难户家里问寒送暖，攀谈家常，替

他们解决困难。自己年事高了，儿女们劝他到城里居住，过几年清闲日子；但他住不下去，经常惦念着村里的工作和敬老院的生活。他的做事为人受到群众的赞扬。

1993年8月，延成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4岁。城乡党政机关和庄乡们前来吊唁者络绎不绝，沉痛哀悼。他临终时要求家人丧事从简，嘱咐子孙勤奋上进。这位老人就这样地离开人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肝胆照人的高贵品质，给人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限的思念。

记回族乡村基层干部刘清芹

刘 向 东

1 刘清芹，1921年生，回族，聊城市大张乡齐楼村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19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人民群众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民不聊生。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底，由于日、伪、顽横征暴敛，无恶不作，加之老天干旱不雨和虫灾，造成历史上罕见的大灾荒，出现了“无人区”和“半无人区”的惨景。当时齐楼村有85户400多人，其中有60多户200多人弃乡外逃，卖儿卖女者达10人之多，周应邦一家4口人，全被饿死。刘清芹一家也逃难到解放区张鲁一带。当时马本斋的回民支队正在这一带打击日寇，宣传抗日，进行土地革命。他亲眼看到解放区和敌占区的天壤之别。刘清芹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宣传，受到教育，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闹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1944年他秘密回村酝酿并组织穷人联合起来成立了农会，推选刘清波为会长，和地主富农展开了斗争。

1946年2月2日，他在莘县华佗庙会上找到了聊堂三区地方党委的孙锐、贾强同志，取得了联系。回村后在村前苇塘里召集秘密会议。李海区党委派庞金兴、刘九经、庞金岱三位同志于3月16日晚到达齐楼，在刘清芹家开会。参加人有张怀成、周教臣、刘

清波、崔长合、孙保印、刘清甫等 17 人，商定了发展农会会员和“二·五”减租反奸诉苦、赎地的斗争计划。会议正在进行，地主富农齐××等带领着 30 多名假农会会员，突然把刘清芹等 17 人包围起来。他们手持红枪、长矛、三叉，扬言要和刘清芹等人拼个你死我活。农会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场风波使刘清芹头脑更加清醒。他立即组织起民兵班扛起枪进行斗争，并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对来齐楼村的人逐个进行盘查，遏制了暗杀和偷袭，避免了流血事件。

刘清芹于 1946 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村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根据区委指示，他又发展了崔长河、李大雪、周敬贤、刘清石、张怀成、刘清连 6 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扩大党的组织，在邻村窦堂发展了张振清、赫存仁 2 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帮助建立了窦堂村党支部；在赫楼村发展了程金路同志入了党，使赫楼村自此有了党组织。

1946 年 6 月国民党新五军进驻朝城，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形势突变，还乡团、土匪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收回被穷小子分走的土地财产，并对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进行阶级报复。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有的农会被迫解散，有的农会干部被杀害。齐楼村的农会中，也有个别人动摇了。在这关键时刻，刘清芹当机立断，召开党支部会议。在会上他分析了形势，讲述了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贫苦农民闹革命翻身求解放和中国革命前途光明的道理，进一步教育党员要做最艰苦的打算，随区队统一行动，做好打游击的准备；并当即决定把部分地主富农带到区里做人质。这样稳定了人心，坚定了信心，使整个土改复查斗争得以顺利开展。由于他认真执行党的阶级斗争政策，对地主富农按照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处理，没有使工作造成失误。通过斗争，促进了全村回、汉两族的大团结。党支部更加坚强，并建立起一支坚强的农民革命队伍，从而震慑了敌人。

2

1947年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大反攻。6月间刘邓大军、陈毅粟裕野战军转移外线作战。刘清芹积极发动群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李知洲区大参军动员大会上，他领导本村群众认真学习讨论县委书记孟筱澎同志的报告和区委张宗谦书记的讲话。会议开了40天。他采取了“选兵点名参战，上台披红带花”的方法，鼓励群众积极报名参军参战。全村共有47名青壮年上台带花参军，被编入刘邓大军行列；抬长期担架的有10人也随军转战南北，出生入死运送伤病员。齐楼村支前的行动震动了全区，被县、区授予支前模范村。

贫下中农翻身当家作主后，过上了幸福生活。人们迫切要求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为此他组建了一支100人左右的文艺队伍。有高跷、花车、旱船、说唱、生旦丑人物，技艺超群，轰动聊、阳、莘三县交界处，在方圆30余华里的村庄，赫赫有名。每到一处演出群众都列队迎送，充分体现了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喜气洋洋的精神面貌。

3

为响应党的号召，1957年他领导农民成立农业高级社（7个村为一社），并担任党总支书记。他从实际出发，率先在本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挖台田沟，兴修水利，打砖井120眼，购买“解放”牌水车120部，采取多井并流，远距离送水3—5华里，80%以上的土地浇上了水，种上了小麦。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带领党支部一班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他说：“相信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能战胜困难。”经过宣传使群众树立了信心，组织生产自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大搞副业生产，度过了难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相信群众，相信党，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做群众工作，使群众避免了“内战”，保证了正常生产秩序，促进了全村民族团结。1970年以后，他领导群众展开了“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大讨论，成立了生产技术指导小组；狠抓了“水、肥、

土”，开展技术攻关。同时把土地划方连片，修生产路5条，开挖排灌沟渠6条，打深砖机井10眼，购买农业机械，更换优良品种，推行科学种田，改善了生产条件。另外还大力发展养殖业，建饲养场一处，占地10亩；采取集体养和户养相结合，六畜兴旺；扩大了肥源，促进了农业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73年建果园50亩，植果树1000棵，铺设了致富路。94年产果13万斤，收入10万余元。他始终把计划生育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当作大事来抓。第一次全村做绝育手术，其中少数民族占40%。在公社乡农场期间，他遵照党委的指示，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在农业生产、植树育苗、发展果园饲养业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4

刘清芹对教育十分重视。解放后他亲自办学，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师资、学校校舍等方面的困难。小学由一个年级扩展到五个年级，学校规模在当时农村是一流的。1957年又建立了农业中学，成立了中心校，被县、区委授予办学先进党支部和先进村、模范个人等称号。齐楼村30户回民中，到1986年，大、中专毕业生有20余人，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人才。他呕心沥血，积极进取，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坚持原则，按照政策处理问题，努力完成上级党委交办的任务，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

刘清芹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深受群众的爱戴和领导的信任。1955年被选为聊城县第一届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1958年被选为沙镇公社党委委员，1971年被选为大张公社党委委员；1984年被选为大张乡党委委员，兼任农场党支部书记等职。刘清芹同志因公积劳成疾，于1986年7月病故。刘清芹同志离去近十年了，可他那种对党对革命孜孜以求的精神，永远鞭策着我。

（薛守鼎 周庆月整理）

大牛二牛列传

刘 九 龙

牛其光和牛文华，是五、六十年代聊城地区著名的两位中学语文教师。因同在聊城三中任教，人们便以其长少，分别称之为“大牛”和“二牛”。其实，他们既非同乡，也非同宗，更非同胞兄弟。

1 “大牛”其光，字华亭，笔名野风，山东利津县人。辛亥革命之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之家。七岁随外祖父在村塾里读书时以其少年聪敏好学名闻乡里。受外祖父影响，十四岁高小毕业，就当了乡村小学教师。一九三一年考入省立惠民乡师，毕业时以其学业优异，留校任国文教员。“七·七”事变后，辗转南下，考入山东省立曲阜师范学校，旋因战火逼近而辍学。一九三八年，流亡于沂蒙、信阳、郧阳、汉中、四川等地，或到学校任教，或入伍充职，或做报馆编辑，或当实业职员。闲时，常为报社写些针砭时弊的文章。一九四五年回山东，在青岛盐务局任小职员。青岛解放后，入行政干校学习，结业后分来聊城，先任粮食公司会计，后为专署机关业校教员。一九五三年调聊城三中任教。

“大牛”其光在聊城三中任教达二十年之久。他以其渊博的文化知识，坚实的语文功底，精湛的讲课艺术，突出的教学成绩，赢

得了学生的尊敬、同行的敬佩和领导的赞扬，成为聊城地区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师。

其光在语文教学中，特别注重字、词、句的教学。他曾说：“‘咬文嚼字’后来虽是专门用来讽刺那些迂腐不化又爱调文弄字者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学工作者，却非咬文嚼字不可。不咬文嚼字就不能传道授业，更谈不上解惑。语文课是工具课。在教学过程中，咬文嚼字是体现其工具课特点的最好方法之一，何乐而不为呢？”在教学中，特别是文言文教学中，其光尤其重视“咬文嚼字”。每于备课，他细读教材，对字、词、句详加诠释和分析，把要讲的内容，全部工工整整地写在教案里，抄在课本上。有时为了查确一字一词，要翻阅几种、甚至几十种参考书。他上课严肃认真，板书不写草字，讲解不说费话，字字有据，句句有识，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学生反映：“大牛老师讲课，我们最爱听，对课文理解得深透，记得牢固。”

其光不仅善于讲授文言作品，对话体文讲授也不乏独到之处，其中之一就是朗读和绘形绘色的讲解。他说：“对话体文文字障碍，教师带着表情示范朗读，再让学生朗读几遍，就会使学生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此乃古人所言‘熟读百遍，其义自见’之法也。”对一些知识性词语，他强调用直观性教法。据他的学生回忆，一次讲有关“秧歌”的知识，他不仅对其种类和特点详加介绍，而且逐一表演给学生，使学生对“秧歌”有了清晰明确的理解和认识。自此，学生呼之为“台上欢老师”。

其光在作文教学方面，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重视写前指导。每于命题之后，他都找几个学生，从选材立意布局谋篇等方面说说自己的构思，然后对全班学生加以具体指导。大部分学生知道如何写作后，再让动笔。在批改作文时，他采用多批少改，甚至只批不改的办法。他说：“这样能最好地调动学生的写作能动性，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至于批改后的讲评，他说，在

讲台上只能讲述些共同性的优、缺点，不足以为常法；多做些指导学生自己修改文章的工作，则是最好的“讲评”。

其光长于文笔，解放前他以野风之笔名写过不少短文杂文。他的《新陋室铭》至今读来也不失为一篇文词流畅、言简意赅的好作品。但是，自建国后从教以来，他却未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有人问及此事，他回答说：“当教师，首重言传身教。言传不必说，身教也并非包括去报刊上发表文章。教师，教学之师，应以搞好教学工作为其本业。‘述而不作’，信而爱教，我之是为也。”做教师须“述而不作”的观点确当与否，笔者不敢断言，单是其光以此表示忠诚于教育事业，却是值得学习和效法的。他之所以一心扑在搞好教学上，并且成为聊城地区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师，怕是与他这一献身教育事业的思想不无关系吧！

文化大革命初期，其光被打成“牛鬼蛇神”，强行劳动改造。之后，调离三中，下放到公社中学任教。一九七三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以落实，其光又回到聊城三中任教。然而年逾花甲，体力不支，终于退休，离开了讲台。一九七七年因患胃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时年六十有六。

其光在聊城三中任教期间，曾兼任班主任和语文教研组长多年，并被聘为聊城地区教研室兼职语文教研员。一九六三年被选为聊城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2 “二牛”文华，曾用笔名纹花，山东堂邑县牛庄（今属聊城市）人，一九一八年生于农村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牛琳廷在聊城城里开办振东书局并任经理达二十余年，是鲁西一带文化、教育界颇有名气的人物。

文华九岁入村塾，因家教有素，幼年时期就因嗜读好学倍受乡里器重。自一九三〇年起，先后就读于三师附小、省立二中和省立聊城师范（即三师）。一九三八年，因日寇进逼聊城而辍学。嗣后，或务农，或教书，或经商，到处为家庭的生活而奔波。抗

战胜利后，在济南考入山东师范学院国文系。一九四九年，在杭州肄业于山东师院。是年六月入山东省教育行政干校暑期中学教师训练班学习，九月回原籍参加教育工作，先后在堂邑辛集（今属冠县）完小、堂邑县中学和堂邑县机关业校任教。一九五三年，调聊城三中任高中语文教师。

文华在聊城三中任教，前后达二十余载。他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潜心于教学工作，并因其教授有方，成绩突出，受到师生和领导的称颂，成为聊城地区著名的中学语文教师。在十年浩劫中，被批斗和强迫劳动，并下放到公社中学任教。

文华在语文教学上，见解独特，经验丰富，教法行之有效。他认为语文课不是一般的工具课，而是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紧密相联的一门工具课。他说：“必须‘咬文嚼字’，‘嚼其膏味，食其精华’，否则就不能使学生达到对课文的融会贯通。”“从大处着眼，掌握课文的基本精神（思想内容——笔者注），从小处着手，解剖课文的词句章法，以大统率小，以小体现大。这就是语文课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他主张，语文教学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思想教育，二语言知识，三读写训练。第三条，应是语文教学工作的基本内容，忽视了它也就达不到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文华强调教师要博览群书。他说：“工作之余，多读点书，是猎取知识自我修养的好方法，知识丰富了极有利于教好学生。”他常以朱熹的《读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提醒青年教师、教育学生多读课外书。在教学过程中，每学期他都要上一、两堂课外阅读指导课，或介绍某作品的内容，或讲解阅读的方法。仅笔者所知，他就给学生指导过《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等长篇小说的阅读。六十年代初，聊城三中有青年教师中掀起了一阵子读古典著作热，是与文华的倡导分不开的。这些青年教师，后

来在教学上大有提高，也多得益于当时的读书之多。

文华在校内一直兼任着班主任和语文教研组长，还曾兼任过工会主席。在社会上，他兼任过聊城县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和地区教研室兼职教研员。对这些兼职工作，他从不视为分外之事，总是尽力尽心把它们做好，贡献自己力量，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文华青少年时期，曾有作品闻于世，且受到时人的好评。参加教育工作后，除写点与教材有关的争鸣文章之外，却没有更多的作品问世。问其原因，他答曰“以教学为己任”而已。他一九七五年离休后，却一反常态，大动起笔墨来。积极为《聊城文史资料》、《聊城地区党史资料》、《聊城地方史志》等刊物撰写文稿。前后发表《武训中学》、《振东书局》、《李善亭传略》等文章多篇。为了把自己从事语文教学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他立志写一部《中学语文教学浅谈》的著作，并且动笔撰写了《绪言》、《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语文知识教学》、《基本训练》等五个章节的内容，约计10余万字。本文所引他的有关语文教育的观点，就是从《浅谈》书稿中摘取来的。但是，由于年老多病，《浅谈》一书尚未完稿，他便于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带着他的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与我们长辞了。文华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在《讣告》中说：“牛文华同志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教书育人，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春风化雨，桃李天下，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的逝世，使人们失去了一位教育战线上的老同志，失去了一位最受人尊敬的老教师。”

“满地留株伤化雨，一门桃李拗春风。”这就是对文华同志一生从事教育的最好赞词！

武术名师邓清源传略

高 文 广

邓清源先生系清朝康熙六十年状元邓钟岳的后裔，是二十世纪中叶在聊城民间享有盛誉的一代武术名师。

先生1897年出生于聊城东关迎春桥附近一户从事“扎彩铺”经营的贫民家庭里。因少年时体弱，拜于名武师赵相坤门下习武。初学拳术，继习刀、枪、剑、棍、镗等兵器的操练。经过多年的勤学苦练，他的“二郎拳”、“雁翅镗”、“罗门转环枪”等武艺都有了颇深造诣。他并不满足于此，四处奔走，广结武友，又学会了“天罡剑”、“大洪拳”、“小洪拳”等技艺。1928年奉军驻鲁时，聊城县政府组建武术组织——国技研究会（县长任总会长，邓副之，负责实际工作），先生积极倡导，并制订详细章规，印发各机关。成立大会在闸口东地藏庵内举行，先生在会上发表讲话，陈述开展民间武术活动的意义。此时，先生在聊城武术界已有了显赫声誉，拜师学艺者和结识请教者踏破门槛。三十年代，山东省举行国术比赛，先生率聊城武术代表队一行六人赴济参赛。他表演的“醉拳”和“雁翅镗”皆获重奖；其弟子刘继海（号静波）、杨萱庭、阎学明亦获奖，为聊城武林争得了荣誉。韩复榘视察聊城时，住在进德会院内（原火神庙旧址），次日召集武术界人士进行国术表演。先生及其弟子的表演尤受赞赏，韩遂重奖五百块银元，即用以铸武器多件分赠。

“七·七”事变后，先生为国土沦丧而义愤填膺，决心为抗战救国拼死一搏，遂召集弟子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炎黄子孙、武林壮士，岂能坐视山河沉沦、版图易色！谁愿报效国家，请随我同去范司令处报名参战……”响应者足有十余人。适逢老母病重，先生暂无法脱身，便经友人介绍与范筑先将军结识，将家中习武之兵器一并捐赠给抗日将士；又亲送弟子们参战（如刘继海在22支队、杨萱庭在4支队等），先生的爱国义举一时传为佳话。1942年先生移居城内东口，先卖布匹，后经营五金。当时日伪宪兵队所在地靠近先生宅院，他每当目睹抗日爱国人士被捕时，常出面担保或周旋相救。汉奸头目畏其声望和武技，便协助设法释放。

1946年聊城围城，先生举家避难到济南。次年聊城解放后迁回故居，仍以经营五金维持生计。至公私合营时，归入县供销社，后转入煤碳公司。1957年初城关镇文教股、县委文教部、专署体委会等单位的同志先后找到清源先生，让其协助动员各个门派的老武师们参加武术大赛。先生不负重托，奔走于城镇乡村，为武术大赛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先生虽年届花甲，勇力却不减当年，先后参加了聊城县、专区和山东省的武术比赛，并获奖。

先生为人正直，性情豪爽，侠肝义胆，高风亮节，为世人所称道。慕名拜师、求教、交友者络绎不绝。上至专员（赵新庭专员爱好武术，常邀先生前往指教），下至工农学生，从不分高低贵贱、年龄长幼，他都一视同仁。戏剧界的武生演员来学武艺的也有很多。如山东省京剧团的著名演员袁金凯曾投到先生门下学习“天罡剑”，济南京剧团马文宽、上海群众艺术馆周国干及平阴豫剧团、莘县豫剧团的许多演员都曾在先生门下受过指教点拨。先生对待弟子要求严格，既强调习武强身健体的宗旨，又阐明救国救民、扶正压邪是武林人士应有的品质。因此，先生门下的弟子

皆恪守武德、见义勇为。先生在传授武功方面，无论是对弟子，还是朋友，他都悉心指教，毫无保守。在先生的一生中，正式所收的弟子和经过先生指教过的学生不下数百人，遍及鲁西北各县及外埠，为社会各界（如武术界、戏剧界和其他行业的保卫部门）输送了大批人材，为弘扬祖国武术文化和促进聊城民间武术活动做出了卓越贡献。

五十年代末期，先生因对大跃进、浮夸风及个人崇拜等现象有不满言论，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久，在煤碳公司退休。文革初，先生严训弟子，不准任何人参与武斗；他本人从此闭门养性，拒收徒弟，不涉世事。1971年元月，先生病故于家中，享年七十有四。

（提供口碑资料者有邓清源先生的弟子和子女：刘静波、阎学明、韩庆云、郑秀明、邓树申、邓玉莲、邓树明等，又蒙吴云涛先生补充、指正。）

从乞丐到画家

——记著名民间画家郇怀林

李培端 薛守鼎

1 郇怀林，字停善，原堂邑县辛集区董庄（现属冠县）人。1906年出生于一个极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丧父，依其母姊，终年靠乞讨度日；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流浪生活中，饱尝颠沛流浪之苦。郇怀林自幼心灵手巧，看到富人家的孩子去学堂念书识字，心里渴慕极了，认为只有念书才有出路，才能脱离苦海。可自家地无一亩，房无一间，连饭都吃不上，哪来的钱念书呢？！现实是无情的。好强的郇怀林心里暗暗发誓：人穷志不能穷，生活再苦也要识字念书，为不再乞讨创造条件。

解放前，鲁西是庙宇最多的地区之一，村村都有大小庙宇。庙内绘有壁画，塑有神像。那时庙宇又正处在不断地修复时期。郇氏三口白天讨饭夜宿庙堂草房，经常遇到画庙的画师们，他们藉此得到点工钱，来养家糊口。正是这一点使日思脱离苦海的郇怀林灵犀一通：“对呀，我只要把画师傅的本领学到手，一生就不用再要饭了。”于是他决心走画庙之路。愿望是美好的，可拜师是要花钱的，好强的郇怀林哭了，饿着肚子一天没出去要饭。残酷的现实使他进一步意识到，只有和命运抗争才能活下去，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也要走这条生路。于是，逢雨雪天不能出门，他就在庙里细心看，耐心揣摩，用木棍在地面上默默地学字学画，向

壁画求师；在要饭间隙，他见师便求教。天长日久，郜怀林的绘画终于有了起步。这天他们母子三人讨饭到辛杨集时，村里正在复修“三关庙”，遇见一位画师傅在墙上作画，起草图。他用的是烧过的柳条棍，划过的痕迹很容易涂掉。柳条到处都有，又不用花钱买，真是个好办法。趁画师傅吃饭离去之机，他偷偷拿起炭条，在白粉墙上照着画师傅的样子画了涂，涂了再画，居然也能画出个样子来，郜怀林激动非常。这更鼓起了他自学的干劲，学画庙的信心更足了。可是在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社会，要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又何尝容易呢？

经过几年的四处飘流，郜氏三口又回到老家董庄。1918年，怀林十二岁，姐姐十四岁。母亲看他们已长大懂事了，与其一起困死，不如寻机自谋生路。这天，邻村有个名叫张小五的穷哥儿会唱小曲，卖唱要饭有方，她就让儿子前去搭伙，从而踏上了卖唱乞讨之路。不久，郜母又忍痛把小女嫁出，给人家当童养媳；自己给邻村一家地主扛活，混口饭吃，一年下来也能挣上几吊钱。这样，母子三人各奔前程，生活才稍有缓和。郜怀林和张小五结伙要饭卖唱，南到开封北到石家庄，东到聊城跑遍了三省之地，饱尝了旧社会穷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哭泣之苦，但也造就了他那自强不息的性格。

五年过去了，他决心甩掉“打狗棍”，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2 求师画庙。1933年，27岁的郜怀林三上冠县桑阿镇西吕村拜蒋泽勋为师。蒋看他多次登门求师学艺，决心大，又忠诚老实，就收了他这个穷徒弟。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高兴得几宿都没睡好觉，立志要跟师傅学好艺，当一个画师高手。在学画庙、画神期间，他跟从师傅走遍了鲁西大地，结识了莘县的万宝斋、孙朝扬、张富臣等名画师，取长补短，进步很快，不到三年自己就能独自画庙塑像了。他所画的庙都是形神兼备，超出了师傅水平，受到组织画庙人士的赞扬。1941年春天，怀林回到

久别的董庄看望母亲。郜母因给地主家日夜干活，积劳成疾，无钱医治，51岁就被夺去了生命。

是年冬天，家乡的地主坤士们要画一个土地庙；得知一个要饭的穷小子能画庙，就半信半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准备让他画村头小庙。怀林听说后就向主事人说：“庙画不好我不要分文工钱，再赔偿十吊钱。”承接到画庙工程后，他不分昼夜拼命地干，后三天饭水都不用，仅用十天时间就把庙画好了。在众乡亲中树立了威望，为穷人们大争了口气，并由此得名——“画师”郜怀林。这样，他的名气就在四里八乡传开了，邀请他画庙塑神的活接连不断。郜怀林勤奋刻苦，不守旧，他又自学了炭画像、写生像等画种，在众画师中其技法总是略胜一筹。从此，提起“名画师”郜怀林，方圆百里没有不知晓的。

1944年，郜怀林迁居原堂邑区奶奶庙村（现为聊城市道口铺乡东风村）。

3 1946年解放后，郜怀林彻底翻身，分房分地成了家，才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1947年，他受晋冀鲁豫边区民间艺术联合会主任张寿忱的特邀，到民间艺术联合会集训学习；结识了边区众多画师，特别是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名画家邓野、张捷等人，学到“西画”技法，受益很大。从此，他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作画上都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他积极创作了大量歌颂工农兵内容的木板年画，有“兄妹开荒”、“建立新中国”等作品，深受美术界的好评，并由晋冀鲁豫边区新华出版社出版。1947年2月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宣传部主编的《艺人翻身记》一书，刊载了郜怀林自述一文——《流浪艺人郜怀林史话》。1949年在平原省文联美术组工作时，他更是夙兴夜寐，孜孜不倦地工作。党委为表彰他那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便让他作为一名代表，光荣出席了全国文代会。同年4月，《流浪艺人郜怀林史话》一文又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平

原日报》上刊登，后又载入全国第一届文代会纪念册。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他更为积极地深入生活，忘我工作，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如“工农兵大团结万岁”、“刘邓大军过黄河”等，均由平原省出版社出版。

1953年平原省撤省，他转入华北民艺剧社，做画布景工作。

1954年—1958年在河北省豫剧院画布景。

1958年—1960年在河北省邯郸专区豫剧院画布景。

1960年—1964年在天津市豫剧团画布景。

1964年10月离休，回到聊城县奶奶庙村（现聊城市东风村）。

1965年9月，郜怀林同志在病重期间，强支病体，还坚持为“道口铺完小”画大幅毛主席像。毕后，便溘然离去，终年64岁。

（上述材料是作者根据郜怀林日记编写。）

李士钊与聊城市档案馆珍藏资料

张 庆 年

李士钊同志 1916 年 10 月出生在山东聊城，1991 年 3 月 21 日于天津病逝，终年 75 岁。他早年就读于私塾、省立中学和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曾为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政府参事，山东省政协委员，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特约代表。他热爱家乡，与聊城市档案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只一次地说：“我是您的义务馆长。”为丰富聊城市档案馆的馆藏资料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

早在 1965 年仲秋节前夕，李士钊同志（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山东省志资料》季刊主编）随山东省政协参观团来聊城、临清、阳谷等地参观农业生产时，就把聊城二十年代成立的中共鲁西中心县委第一书记张干民（临清李家圈人）、县委委员袁果（博平袁楼人）和候补委员、坡里暴动时负责谍报工作的郭庆江（博平袁楼人）三同志，于 1923 年至 1964 年间先后复给他的十二封亲笔信，作为聊城地区“红色家谱”亲自交给当时的中共聊城县委副书记孔雨亭，请他将这些历史文献转给我馆珍藏。这部分材料记述了聊城最早的党组织——鲁西县委的成立，以及鲁西县委领导的坡里暴动的组织斗争及其领导的我区农民斗争、学生斗

争等方面的情况。这些材料因是他们三人的亲身经历，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这些珍贵的史料在前几年的党史编纂中，已被分别收录到《山东省党史资料》、《聊城地区党史资料》等有关期刊中，成为广大党史工作者与地方志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是李士钊同志对我区档案史料的特殊贡献。

(二)

1937年我党与民族英雄范筑先共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11月15日日寇攻陷聊城，范筑先与共产党员张郁光、姚第鸿等七百军民壮烈殉国，震撼整个中华大地。重庆的《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争相发表文章，颂扬范筑先将军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这些重要的文献（包括照片），都是身为中共鲁西北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和《战地文化》记者的李士钊献给我馆的。他回忆起自己1938年11月14日晚，按照范筑先将军的部署撤离到聊城西南张炉集，面朝聊城方向，等待胜利消息时，传来了聊城失陷的噩耗。他和同志们为失去这位尊敬的长者哭了。范筑先、张郁光、姚第鸿虽然去了，但他从此后，总是深情地缅怀烈士，并以长达50年的时间，时刻注意收集、积累革命烈士的事迹、生平等革命史料的工作，用以表达他对革命烈士的敬仰之情。他送给我们的有1938年5月1日创刊的中共鲁西特委机关报《抗战日报》10月份合订本，其中记载了50年前范筑先将军的若干讲话及署名、签发的文电、布告等文献史料，以及我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和文化活动情况，有以他本人为团长的冀鲁青年记者服务团主办的1938年9月论刊的十六开大型综合理论刊物《战地文化》二、三期复印本及珍贵照片。其中最为珍贵的是1938年6月13日范筑先到河北威县会见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合影；7月25日美国友人卡尔逊将军从

延安来聊城时，范筑先将军带领军民在聊城北门外欢迎卡氏和在进德会招待所花园内的两位将军的合影；以及在东阿黄庄战斗中缴获日军辎重等战利品的场面。这些珍贵的照片，已成为1988年11月11日在聊城落成的由邓小平同志题写“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纪念馆大型展览的主要素材。更可贵的是，他怀着对民族英雄范筑先十分敬仰的心情，多年访问查明范筑先将军1938年头戴军帽，身着戎装，目光炯炯，威严而慈祥的照片，出自当年堂邑摄影师邹梦周之手。这张照片不仅为《聊城文史资料》第五辑（范筑先专辑）、聊城地区党史资料所刊载，还为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所引用，并且还被吸引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编印的《光辉的28年》大型画册中。也正是由于有了这张照片，才使后人得以认识这位为国捐躯，后人敬仰的范将军。

同时，他还为我馆收集到了自1938年11月到1988年11月50年中的中共中央领导朱德、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范筑先的题词、挽联以及全国文化、教育界专家学者梁漱溟、臧克家、李桦、尹瘦石、欧阳山尊、屈武、孙起孟、孙晓村、陈从周、陶钝、陆冶、徐运北、姜春云和在聊城战斗过的老一代革命家齐燕铭、张友渔、余修的回忆录、诗赋、题词等。还帮助我们征集到了穆青、王幼平、王国权、姚雪垠等同志回忆张郁光、姚第鸿、赵伊坪等烈士事迹的手札以及原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回复给中共聊城县委“关于毛泽东同志给范筑先将军亲笔信”的手札等。这些都是回忆聊城等革命历史的手札，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黎玉的上述手札，详尽介绍了毛泽东同志对范筑先将军亲自进行统战工作和进一步争取团结抗战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他在回忆中说，毛泽东同志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对范将军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的政治影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黎玉同志还回忆了毛泽东同志请他给范筑先将

军带来武汉出版的《论持久战》和他亲自交给范筑先的情形。更使人不能忘怀的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凡经他征集到的老一代革命家、教育家、著名学者的题词、诗赋等，都是他在济南送给高级装裱师装裱后再交给我们的。每当回忆起这些，每每看到这些珍藏，都使我们油然想起这位没有任何要求的义务馆长来。

(三)

由于李士钊同志做过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经他收集的材料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说是史料倒不如说是档案更为确切。他只要听到与聊城有关材料，就不辞劳苦地去查访。原济南军区装甲兵司令李太清《1946年围困聊城时的日记》和硝烟中拍下的照片，就是他几经周折查找到的。《日记》记述了我区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解放聊城的日日夜夜，反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乐观主义和战斗激情。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的火堆里抢救出来的照片，真实地再现了聊城解放前后的状况，反映了李太清同志及广大指战员对这座古老城池的眷恋之情。

(四)

聊城的海源阁，是清末我国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它与江苏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百宋楼”、浙江杭州丁丙的“八千卷楼”一起被称为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其中又以杨以增的海源阁和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所藏宋元刻本及先人手抄本为最多，故有南瞿北杨之美称，深为海内外藏书家所仰慕。然而，至二十年代后，由于兵匪燹乱，海源阁书籍及其他珍贵藏品陆续散失，成为海内外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面对这一现实，李士钊同志痛心疾首。他很早就开始了对海源阁史料、书

籍及其他藏品的收集工作。他凭借与杨家乡谊及亲邻关系，多次访问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承训先生。还是在他任山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期间，亲自参加了杨承训捐献海源阁藏书、刻书及其他文物珍藏的活动。在长达几十年的历史中，他还多次外出亲自访问海源阁的具体收藏情况，甚至不顾古稀高龄，先后撰写了《聊城海源阁杨氏藏书刻书简述》与《聊城海源阁藏书重要史料片断》——1966年2月10日在天津访问海源阁第四世主人杨承训（敬夫）先生等文章。在他先后交给我馆的材料中，对后人研究海源阁的来历、海源阁丛书及其善本书的下落以及党和人民政府认真保护海源阁遗址，第四世主人杨承训捐献海源阁文物情况提供了可靠依据。同时他籍多次来聊城的机会，将他了解的有关海源阁的某些藏书的下落线索提供给我馆，并帮助我馆收集到了海源阁散失的明版本《嘉祐集（苏洵诗集）》，以及海源阁第四世主人杨敬夫作为传家宝传世的诸葛亮墨宝《昔耕帖》及其有关李邕、颜真卿、苏轼、文天祥等22位历史名人所题跋的长卷等。家乡的文物失而复得，这是他生前十分欣慰的事情。

（五）

李士钊先生在他的有生之年，致力于家乡文化建设事业的精神，是有迹可寻，也是非常受人尊崇的。他曾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四人帮”肆虐时期，他被遣返回家，先是在街上做临时工，后又在地区出版局帮助工作。虽步履维艰，但对家乡聊城文化事业发掘研究的锐心不减。在他困居故乡聊城期间，先后整理出《聊城光岳楼史稿》、《聊城山陕会馆简史》、《聊城文物普查记录》等文化史料，并附上了大量的碑刻拓片、照片，开研究家乡文化史之先河，为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他还通过解放前结识的老领导、老朋友为聊城文化古迹题词

题字。1974年，为纪念光岳楼建成600周年，他敦请郭沫若为之题写了“光岳楼”匾额，沈雁冰题写了“光岳晓晴”，艺术大师刘海粟题写了“泰岱增辉”，绘画大师李苦禅、国画大师吴作人、丰子恺等为光岳楼撰写了楹联。有的已制成匾额悬于楼上，珠联璧合，相映成趣，成了聊城文化的象征，为广大游览者所喜受、所称颂。

李士钊先生故去了，但他为故乡聊城的文化事业、档案事业的发展所付出的艰辛令人敬仰，他的事迹将永远记录在我市档案馆史册。

聊城民间文学浅议

邓 愧 余

聊城这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人才荟萃，文化昌盛。丰富多采的民间文学代代相传，人人乐道。

一、民歌 民谣

“东昌府的三大宝：铁塔、古楼、玉皇皋。”这首民谣已经流传了五、六百年。古楼、铁塔、玉皇皋一直是聊城人民的骄傲。特别是古楼，一直被作为聊城的象征，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工商企业用它作为铭牌、商标。“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这首民谣真实地反映了聊城过去运河畅通、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虽然，现在铁塔的寺院和玉皇皋已历经沧桑荡然无存，太平街、双街、小东关过去的兴旺发达已不复存在，但是它们仍然保留在聊城人民的美好记忆里。聊城人民从儿时便把这些民谣说在口头，记在心头，从而成为热爱乡土、热爱祖国的启蒙教材。

过去，儿歌便是年轻的妈妈给孩子上的第一课。孩子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儿歌便是孩子们的催眠曲，当孩子要睡觉的时候，年轻的妈妈怀抱着孩子，一面反复地哼着：“小宝宝，睡觉觉，老猫来了叼耳朵；小宝宝，睡觉觉，老猫来了咬腩了！”一面有节奏地拍打着孩子。声音由高到低，节拍由快到慢，把母爱灌注在歌声

之中。孩子在朦胧浑沌之中接受着音乐的洗礼，不知不觉便随着妈妈的歌声进入梦乡。

孩子呀呀欲语时，儿歌又成了妈妈教给孩子说话的教材。如儿歌《小老鼠》：“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奶奶，抱下来。吱呦，一咕拽！”这首儿歌把一个初生的小老鼠刚刚会爬的动作，又偷又怕，从灯台上摔下来的神情，描写得维妙维肖，生动可爱；而且语言简单顺口，孩子们易说易记。这时孩子已经有了“奶奶”、“灯”、“油”、“小老鼠”这些概念，用他们还说不清楚的语言学着妈妈说。特别是“吱呦，一咕拽”这一句，写小老鼠摔下来的惊叫声和连滚带爬的形象，常常说不好，不但逗得孩子发笑，而且还给爸爸妈妈带来极大的乐趣。这样，不仅培养了孩子说话的能力，又锻炼了孩子的思维和记忆能力。

孩子逐渐长大了，对周围事物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有些事物，儿歌往往用童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山老鸱》：“山老鸱，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娘背到山后头，把媳妇背到坑头上。”再如《月老娘》：“月老娘，亮光光，开开门，洗衣裳。洗得白，浆得白，嫁了个女婿不成材，赶个集，到黑来。买个烧饼没有底，气得孩子净打滚，买个烧饼没芝麻，气得孩子打扑拉！”还有《小吧狗，带铃铛》、《小花狗，满天滚》等。这些儿歌已含有故事情节，语言精炼，形象鲜明，合辙押韵，饶有风趣。孩子们愿意学、愿意记，从而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知识，锻炼了孩子们的说话能力。

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思考能力，有些儿歌还用谜语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一个枣，三间屋子装不了。”（谜底：灯）“红公鸡，绿尾巴，谁猜准，我喜他。”（谜底：红萝卜）等等。

随着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大量的儿歌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敌人的憎恨和诅咒。如《杀洋羔（指外国人）》：“杀、杀洋羔！不杀张家，不杀李家，专杀你家！”再如《日本鬼》：“日本鬼儿，喝凉水儿，打了罐子赔了本儿。坐火车，轧了腿儿，坐轮船，沉了底！”

通过说唱这些儿歌，“洋羔”和“日本鬼”这些外国侵略者的概念，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培养了孩子们的爱国情感。

孩子们长大了，每到傍晚吃了饭，全街（村）的孩子便聚集在一起做游戏。他们连跳带唱，儿歌又成了孩子们集体游戏的内容，如《猫逮老鼠》。一些孩子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圈，圈里边有一个孩子扮“老鼠”，外边一个大孩扮作“猫”。“猫”唱：“猫逮老鼠一月一。”大家唱：“吱喵，还早哩！”这样一直唱到“猫逮老鼠九月九，逮住老鼠咬一口！”这时，圈外边的“猫”便千方百计地往圈里钻，去逮“老鼠”。大家手拉手转圈，保护着“老鼠”，直到“猫”冲进圈里逮着“老鼠”为止。再如《要锁》等，这些集体游戏，极大地丰富了孩子们的文化生活。

民歌含有大量的儿歌，孩子们从小便从中汲取营养，受到教育。民歌、民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健康的民歌、歌谣是真、善、美的讴歌，是开启儿童心扉的钥匙，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激发对美好事物的热爱，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二、民间故事

聊城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也是绚丽多采、美不胜收的。旧时的冬天，老头们在庙台上，在向阳的村头、街头，一面晒太阳，一面讲故事；夏天，青年们在村头河边，你讲一个，他讲一个，讲也讲不完。晚上，孩子们依偎在大人的身边，拉着父母“啦呱”（讲故事），贪婪地听着，缠着大人说个没完没了。老爷爷、老奶奶常常是讲故事的能手。

以童话为体裁的民间故事，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晚上躺在床上，爸爸、妈妈常讲的是《老虎的故事》：一个老虎吃了大妮、二妮的母亲，换上母亲的衣服，伪装母亲骗开了房门。两姊妹机智

勇敢地设计将老虎摔死。孩子们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由担心害怕到放心高兴，最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便甜甜地睡着了。晚上，小孩子哭闹，聊城人习惯用：“老虎来敲门了！”来吓唬孩子，可能与这个传说的民间故事有一定的关系。

以寓言为体裁的民间故事也是孩子们所欢迎的。如《燕子下蛋的故事》，讲的是弟兄二人，弟弟心好老实，哥哥心坏贪婪。有一天，弟弟看到一个小燕子腿被打伤，觉得很可怜的，马上给包扎上。第二天这燕子带着一群燕子来了。弟弟拿出一碗米，唱道：“南来的燕，北来的燕，吃一粒米，下一个蛋！”燕子吃了米，下了一筐蛋飞走了。哥哥看了很眼馋，逮着一个燕子，故意把它的腿打伤，也给包扎上。第二天，果然一群燕子飞来了。哥哥同样拿出一碗米，唱道：“南来的燕，北来的燕，吃一粒米，下十个蛋！”一会儿，米被吃光了，哥哥慌着去取蛋，结果给拉了一筐燕子屎。这个寓言故事，使孩子们在幼小的心灵里懂得如何做人和做什么人的道理。

不少民间故事则是以笑话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类的故事很多，经过人们的长期传播和加工，故事幽默诙谐，笑料丰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最为人们所喜爱。故事用生动辛辣的语言嘲笑财主、富豪劣绅，嘲笑死读书的书呆子；也有的嘲笑近视眼、憨子、瘸子等一些有生理缺陷的人，如《憨子走丈人》、《近视眼挂油瓶》等等。《万民裤》是聊城广为流传的嘲笑劣绅的故事：一些劣绅为了讨好县官，商议给县官送“万民伞”、“万民衣”（即用黄绸子做一个伞或褂子，上面写上老百姓的名子，表示对县官的爱戴）。一个读书人走过来说：“我看还是送个‘万民裤’好！”劣绅们从未听说过什么“万民裤”，便惊愕地发问。这个读书人不慌不忙地答道：“还是‘万民裤’好！要送，把你们的名字写到裤裆里——这样，给县官舔腚才方便！”说得劣绅们哭笑不得。

因为聊城是一历史文化古城，历代各朝做大官的多，文人雅

士多。因此，在民间故事中名人轶事、传说占有很大份量。如聊城五大家：“任、邓、朱、傅、耿”，即傅阁老、邓状元、任蝎子、耿书笏子等人，关于他们的轶事、传说很多，极大地丰富了聊城的民间文学宝库。

当然，旧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其中，在民间文学中也掺杂着不少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东西，如宣扬宿命论的《财神爷送元宝》是很典型的。故事是：一天，财神奶奶埋怨财神爷不公平，光把元宝送给世上的富人。财神爷听了哈哈大笑，说：“穷富是命中注定的，不信你看！”这时，从天上看到地上有一帮推小车的穷人正向小桥走来。财神爷说：“你看他们要过这座桥，我把一锭大元宝放在桥上，你看他们拾不拾！”话未说完，这帮推小车的已走到桥边。忽然其中一人说：“咱比一比，看看谁能闭着眼把车推过桥去！”结果都闭上眼推车过了桥，这锭大元宝谁也没看见。财神爷笑着向财神奶奶说：“这能说不公平吗？这是命！——你看，那边来了一个骑马的财主，我们把这锭元宝放在路边高粱地里，看看怎样？”正说着，骑马的财主来到这里，忽然要解大手，便把马拴在路旁的小树上，走进高粱地里去大便，看见了这锭大元宝，高高兴兴地装进袋子里骑着马走了。

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所创造，是历史文明和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它给人们以启迪，给人以欢娱。对于儿童来说更是起着怡情悦性的作用；宛如一把开启儿童心扉的钥匙，洞开了孩子们的知识宝库。民间文学大都是健康的，它歌颂光明，抨击黑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们应当扬其精华、弃其糟粕。

聊城民间文学和全国各地一样，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是非常珍贵的文化财富。我们希望聊城民间文学这株奇花异葩，在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汗水浇灌下，更加硕果累累，绚丽多采！

聊城民间表演艺术琐谈

杨 道 田

一、乐班

聊城民间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乐班”，亦称“唢呐队”。以唢呐为主要乐器，笙、笛、二胡等为辅助乐器；有的乐班还配有打击乐品，如：鼓、锣、钹、小锣等。每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农闲演出，农忙务农，多属于业余性质。个别民间艺人以演奏为业。乐班演奏的乐曲多为传统曲牌或戏曲折段（俗称卡戏）。聊城有三个具有百年以上发展历史的乐班，即：道口铺乡田庄宋家班；侯营镇旧村屯戴家的两个班。

田庄宋家班创始人为宋开鉴，迄今已相沿六代。第五代传人宋兴贵，曾于1953年参加全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指战员献艺。他吹奏的“光荣花”、“大保国”等曲目深受欢迎，荣获奖章数十枚载誉而归。

旧村屯戴家两班创始人为戴玉山，迄今已相沿五代。两班同出一脉，自立门户，单独活动。侯营镇一带有一句歇后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即：“旧村屯的唢呐——两起。”说的就是这两起乐班。

除以上三班外，另有孟庄、许营、四合村、圣庄、八里庙村、

位庄村、杜庄、张学村等十几个乐班。张学村的“张家班”也是个发展历史较长的乐班。我市著名唢呐艺人刘秉勤就是张家班的传人。其他乐班多为建国后组建。

乐班经常演奏的曲牌有：“一句半”、“两句半”、“小抬杠”、“小开门”、“大开门”、“三翻”、“十翻”、“爬山虎”、“宝装瓶”、“水落音”、“口红令”、“点头凤”、“大锯缸”、“送情郎”、“百子乐”、“梆子娃娃”等。吹奏的戏曲折段有：“算粮登殿”、“二进宫”、“穆桂英挂帅”、“武家坡”、“青风寨”等。剧种多为京剧、评剧、河北梆子、豫剧、四根弦等。

解放前，民乐艺人的社会地位低下，被世人称为“坐板凳头的”或“吃凉菜的”。解放后，民乐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民乐艺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了身。民乐艺人的乐理知识和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和学习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欣欣向荣的乐曲，如：“春耕忙”、“农家乐”、“军民大生产”、“光荣花”等。吹奏的现代戏折段有：“朝阳沟”、“小二黑结婚”、“刘巧儿”、“小女婿”等。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较快，民乐队伍也有新的发展，全市民乐艺人已在百人以上。他们长年活动在乡村集镇，为传播、发展民族音乐，开展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二、民间歌曲

聊城民间歌曲流行于道口铺、梁水镇、阎觉寺、蒋官屯一带，清末民初及建国前后为兴盛时期。梁水镇流行一种“太平歌”，曲调多达二十多种。据百岁老人崔全建介绍说：“俺这里的太平歌，老年间就有，少说也有二、三百年历史了。大清朝时，曾被请到运皇粮的官船上唱过。”演唱太平歌时，有二胡、月琴、笙、管等伴奏，并配有鼓、锣、钹、小锣等打击乐器。节奏欢快流畅，质

朴奔放，歌调好听易学，故至今仍在梁水镇一带流传。

清末民初道口铺南庙（奶奶庙）流行一种秧歌调。曲调虽繁多，但通俗易懂很受欢迎，优秀歌手颇多。他们演唱这种秧歌调时，常与戏曲折段、历史人物故事融为一体，既是歌曲又有故事内容，极为群众喜闻乐见，流传较为广泛。当时南庙一带大人孩子都能唱几句，故有“奶奶庙两头翘，出门就有秧歌调”之说。

抗日战争时期，蒋官屯一带为我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斗争环境恶劣，生活条件极差；既无报纸，又无广播设施，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活动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军民联合组建了文艺宣传队，利用民间流传的旧曲调填写抗战歌词，同时也创作了一批其他节目进行演出。党的方针政策、抗战形势等，通过文艺演唱传达给群众，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据73岁的离休干部毛文彩同志介绍说：“蒋官屯抗战歌曲，是我的老师王兆山（号岱云，蒋官屯后屯人，党员干部，解放战争时期随军南下，曾担任过贵州省铜仁地区统战部长等职）编写的。”当时经常演唱的歌曲有：“救亡进行曲”、“抗日歌”等。经毛文彩、王兆山等同志认真回忆，现将几首歌词摘录如下：

救亡进行曲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
走出田园工厂，离开店铺课堂。
拿起杀敌武器，高高举起刀枪。
到抗日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脚步跟着脚步走，肩膀靠着肩膀。
被压迫的人民强而壮，我们的队伍斗志昂扬。
高举镰刀斧头，扛起土炮鸟枪。
保卫父老兄弟姐妹，保卫中国保卫家乡。

八路军同志把据点攻

正月里来天气冷，八路军同志把据点攻。
枪炮子弹准备好，担架队排列象条龙。
民兵配合齐出动，军民拧成一股绳。
前后夹击多英勇，振奋了鲁西老百姓。

地里的麦苗青又青，八路军同志摸进敌兵营。
日本鬼子正在做好梦，明晃晃的刺刀对前胸。
机关枪打手榴弹轰，大刀劈盒子枪崩。
日本鬼全部丧了命，敌据点血染遍地红。

五卅惨案歌

好同胞呀好兄弟，听我说说大事情。
我国现遭大惨案，发生就在咱山东。
日本无理占中国，出兵攻打济南城。
三次困城如禽兽，机枪大炮一起轰。
国军伤亡五六千，百姓死了两万零。
妇女儿童被刺死，老人倒在血流中。
妻离子散多不幸，满城战火怎逃生。
日本强盗无人性，中国人民多苦情。

蒋官屯抗战歌曲，对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揭露日本侵略军的残暴，激发我军的抗战热情起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以来至建国前后，阎觉寺大王屯一带民间歌曲颇为流行，当地俗称“小调子曲”。善唱者不乏其人，歌手曲恩远乃其佼佼者。曲恩远自幼酷爱民歌艺术，又有一副好嗓子，音色甜润吐字清晰；

他在学习传统曲调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条件，将旧曲调和歌词进行了大胆的创新。经数十年的努力，演唱技巧日臻成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据 72 岁的民间艺人曲新远说：“我和恩远是老对把了。他聪明好学，俺这一带不管谁会唱小调子曲，他都找上门去学。日子一长他会的小调子曲比谁都多，不管什么调，经他嘴里唱出来跟别人就不是一个味，大人孩子都爱听。唱欢乐的歌能让人笑得合不上嘴，唱悲歌唱得人掉泪。俺这一带论唱歌没比上他的。”曲恩远演唱的民歌，有“大对花”、“小对花”、“叫五更”、“盼五更”、“晚娘打孩子”、“烧布稷”（白面疙瘩放在火里烤熟后给儿童吃的一种面食）等，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欣赏价值。建国后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民间歌曲获得了新生。曲恩远的演唱，引起省内外音乐界人士的关注。1953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的孙晋奎等人，专程赴大王屯一住月余，研究聊城民歌艺术的独特风格，并笔录曲恩远所演唱的民间歌曲。1954 年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文工团的李嘉温等人，也到大王屯向曲恩远采辑传统民歌素材和曲调。1955 年和 1956 年山东省文化局委派苗云兰、苗晶等人两次来聊城，将曲恩远演唱的民歌录制成音响资料。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曾多次播放他演唱的歌曲。1955 年至 1957 年期间，他曾四次参加省、专区举办的音乐舞蹈会演，演唱的歌曲“寡妇改嫁”、“踏青（放风筝）”、“探情郎”等，多次获得奖励。在此期间他还曾受聘到山东省文艺培训班教授民歌，为我省民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60 年曲恩远不幸病逝。

三 民间舞技

龙灯 舞龙灯流传历史悠久。在汉代《春秋繁露》一书中已有记载。在传统习惯中，人们把龙当作吉祥的化身，故每逢喜庆节日都要舞龙灯助兴。旧时也有舞龙祈雨的风俗。舞龙灯是聊城人民极为喜闻乐见的民间舞蹈形式之一，盛行于清朝末年至建国前后。聊城龙灯多为九节龙，以竹木扎制骨架，用纸糊或纱布缝制外衣，再用颜料涂上各种花饰或图案即可。表演时每节内放置蜡烛照明，舞者10人，武士装束，由1人手持彩珠戏龙作舞，基本动作有：“跑四门斗”、“龙盘柱”、“巨龙翻滚”、“跑剪子股”、“龙戏珠”等。聊城较有名的龙灯队共有三支，即：道口铺村、阎觉寺小吕庄、城内十县胡同。道口铺村、小吕庄龙灯队为白色龙灯，俗称“白胡子龙灯”。其表演别具一格，给人以苍劲素雅之感，加之惊天动地的锣鼓伴奏，气势磅礴，好似真龙天降一般十分壮观。城里十县胡同为小龙灯，由儿童表演，新颖别致，另有一番情趣。

狮子舞 狮子舞是我国民族舞蹈之一，早在汉代就已流行。《汉书·礼乐志》一书中，就有关于狮子舞的记述。狮子舞流传于全国各地，至今盛行不衰，聊城也是如此。表演狮子舞时，一般由两头狮子和一武士共同表演，每头狮子二人装扮。由于地域的不同及表演技巧的差异，各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聊城狮子舞素有文武之分，龙湾以文狮子出众，河洼以武狮子著称，省张庄以独头狮子而远近闻名。龙湾的文狮子主要表现狮子的温顺动态，基本动作有：“翻滚”、“奔跑”、“搔痒”、“抖毛”、“舔毛”、“嬉戏”等。表演细腻动作逼真，加之一群小狮子（多为儿童扮演）顽皮活泼中带有稚气，看后给人以清新愉悦之感。河洼的武狮子，主

要表现狮子的勇猛、威武，基本动作有：“跳跃”、“登高”、“跌扑”、“腾转”等。基本功扎实，表演泼辣奔放，特别是高空造型和伴之以武术的“大刀劈狮子”，功力深厚，引人入胜。省张庄的狮子，独树一帜与众不同。表演时，仅有二人装扮的一头狮子，主要表演高难度动作。民国初进城“过堂”（元宵节到县公署门前献艺），曾表演过“爬三张桌”、“倒爬楼”，在三张桌面上表演“狮子立站”、“吊绣球”等动作，他们高超的技艺轰动了聊城，受到县知事的奖赏。

聊城除以上三个狮子队外，另有：马屯、孙庄、华严、沙镇、刁海、沙店、梁庄、毛营、田庄、韩庄、杜庄、辛十里等十二支狮子队。

竹 马

玩竹马也是聊城人民所喜爱的舞蹈形式之一。始于何时已无法考证，盛行于清朝末年和民国之初。四甲李的竹马与众不同，和其他地方的竹马相比技高一筹。马头可以活动，玩起来马头一点一点的，就象骏马在飞奔一样，极为群众喜闻乐见，故四甲李的活头竹马遐迩闻名。

竹马扎制及表演过程大致如下：先用细方木做成长方形木框，后用细竹条在木框的前后编制成马的前后部形状，再用纸糊好，涂上颜色，马头部分单独扎制。木框四周配上饰布，饰布上面画上马腿或各种图案，如：花、草、云、水等；木框两边各系一条布带，表演者站在木框中间，将两条布带套在肩上，一手持马鞭，一手挑着马头做勒缰状。表演时一般为八匹马，表演者都装扮成各种戏曲人物，另有两人扮作马童。玩竹马的基本动作有：“长虫退皮”、“开四门”、“跑四门阵”、“跑剪子股”等。五颜六色的群马，生龙活虎般跳跃奔驰，很能吸引观众。尤其是在夜间，竹马内点燃蜡烛，一片火红，铃声阵阵，群马喧啸，气氛活跃，十分热闹。玩竹马除了群舞外，有时还演唱横笛梆子，如：“采春”、“白马山”等二十多个戏曲折段，舞中有戏，戏中有舞，别有一番情趣

很受欢迎。据 91 岁的民间艺人李玉泽说：“当年四甲李的竹马是没比的，从大清朝到民国，年年元宵节都到县里过堂，回回都得奖赏。”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四甲李的活头竹马已停止活动六十余年。但是，聊城有一句歇后语：“四甲李的竹马——活头的。”至今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

大秧歌 聊城大秧歌，历史悠久风格独特，是一种综合性质的舞蹈形式，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据 79 岁的民间艺人崔金华说：“大秧歌这玩艺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少说也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聊城大秧歌流行于梁水镇、八甲刘、道口铺、大张一带。梁水镇流行尤盛，大秧歌队遍及全乡。

表演大秧歌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式。在掌伞的统一指挥下，耍板、打棒、角色表演循序进行，角色的表演有行当的分工。行当的名称有：“花大姐”、“花公子”、“包头的”、“老养娘”、“三花面”、“没（音‘木’）皮虎”、“愁老婆”、“愁小”等，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均有乐器伴奏，打击乐器有：鼓、锣、小锣、大钹、小钹等；管弦乐有：月琴、笛子、大管、小管、笙、唢呐等，固定的曲牌、腔调有数十种之多。角色表演时，常把戏曲折段、民间传说等融合到舞蹈中，有舞、有唱、有情节，故事性强，通俗易懂，极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势衰微，聊城人民饱受战乱、天灾、匪患及苛捐杂税之苦，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民间艺术残遭蹂躏，至建国前大秧歌已濒临绝迹。解放后，国家安定，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促进了农村文化娱乐活动的开展，大秧歌队如雨后春笋相继恢复重建。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拥有大秧歌队 11 个。即：龙王庙、前郭、南庙、梁闸、梁浅、周庄、叶屯、房屯、张堂、拐李王等。仅梁水镇乡就有 8 支大秧歌队。这些大秧歌队的组建，活跃了农村文化娱乐生活，培养了一大批新生力量。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说新唱新，增添了反映现代生活的

新内容，使这一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焕发了青春。

在“文革”动乱中，聊城大秧歌队全部被迫解散，终止活动。

火 虎

省张庄的火虎在聊城市是独一无二的。表演时只要一人，与其他舞蹈或文化表现形式配合演出。火虎表演者头戴老虎面具，双手持棍表示虎的前腿，身上绑扎一块块用绳子结起来的木板，每块木板上钻有密密麻麻的圆孔，孔内插上火纸卷，表演时将火纸卷点燃。表演动作较为简单，只有走、跑、扑、跳等。玩火虎只能在夜间，点然的火纸卷顺风势燃烧，就像一只火虎在夜幕下爬行奔跑。有时表演者利用表演动作或身上的火势，逗得观众东藏西躲，情绪欢快，气氛热烈，但是，表演时间不宜过长。据85岁的民间艺人张宏海说：“俺这里的火虎别处没玩的，最早玩火虎的是梁金铎，他玩得真实、火爆、热闹。为此，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虎熊’，时间一长，许多人倒连他的真名给忘了。他之后就是霍长月玩过，也很受欢迎。”省张庄火虎在建国前早已停止活动，至今仍未恢复。

高 跷

高跷也是聊城人民所喜爱的民间舞蹈之一。流行于沙镇、西王、大张、朱老庄、许营、北杨集一带。表演高跷时，双足踩着木拐而舞，木拐高者三、四尺，低者尺余不等。表演者大都装扮成戏曲人物，分为两队。一对打棒的武士装束头前开路，打棒的花点与伴奏的锣鼓点相配；其他表演者手持各种道具，如扇子、刀枪、蝴蝶等。有集体对舞的大场面，也有数人及个人表演的小场面。基本动作有：“穿花”、“套环”、“单拐跳跃”、“单叉”、“双叉”、“扑蛾”等。省张庄、陈屯两地的高跷基本功扎实，表演阵容强大，高难度动作较多，如：“翻桌子”、“翻横板凳”、“过顺板凳”等，干净利落很有功力。清末民初元宵节多次进城过堂，均受到好评和奖赏。两地的高跷队，在建国前早已停止活动，至今没有恢复。沙镇、南郭、毛营、傅坟、尹堂五支高跷队多为建国后组建，1957年后全部停止活动。

聊城市除以上几种民间舞技外，另有：“旱船”、“花车”、“跑驴”、“花棍”、“杠杆”、“扳不倒”、“大头娃娃”等。各种舞蹈队分布在李太屯、陈庄、军王屯、墩台王、后罗、龙湾、河洼、前郭、杨天洪、田庄、王蔡、田庙等地，民间艺人达 500 人之多。

(朱淑惠 整理)

源远流长的聊城烹饪文化

博 闻

1 在中国烹饪文化的发展史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孕育了鲁、苏、川、粤“四大菜系”，其中以鲁菜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是整个北方菜的主干和代表。以聊城为核心的鲁西地方风味是鲁菜系的一个重要支派。

聊城是我们的祖先东夷人活动较早的地方。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我区各县古迹的考查证明，多处属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存。聊城市的权寺遗址、聊古庙遗址、白庄遗址、固均店遗址出土的陶制鼎、罐、盆、杯、鬲、尊等烹饪器具或饮食用品，足以表明我市的烹饪技术在数千年前就有一定的水平。聊城早期的烹饪技术，除了聊城劳动人民自己的创造之外，还受宗室、皇亲、官府所用家厨的影响。以聊城市境内来说，商朝有殷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受封于微子城，周朝文王之季弟受封于郭城，汉朝宣帝封宗亲刘成于此为东昌侯，北魏有安平王镇守于此，唐朝有太宗之孙琅玕王李冲任博州刺史。宗室皇亲的饮食自然是十分讲究的，所用家厨多是从京都带来的烹饪高手。聊城一带长期作为贵族封地，高超的烹饪技艺也会从宗室皇亲中走入达官富豪之门，进而落到一般富裕人家，乃至集市饭馆酒肆中。当时的烹饪技术已经具有了选料精细、做工考究的特色。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黄河中下游地带（聊城在这一范围之内）的烹饪

技术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概括，不但详细阐述了煎、烧、炒、烤、煮、蒸、腌、腊、炖、糟等烹饪技法，还记述了一些菜点的制作方法。

元明清时代是我国烹饪技术的完善成熟时期，而聊城由于漕运畅通，经济繁荣，这一时期也是烹饪技术的空前兴盛阶段。古典名著《水浒传》、《金瓶梅》都是成书于明朝反映宋代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其中有丰富的饮食描写，足以表明宋元明时期鲁西一带烹饪技术的技法全面、功力深厚。经济的繁荣是烹饪技术发展的基础。明清两朝，南北商贸依赖水运。江北五大商埠中，东昌府分其二（聊城、临清）。当时聊城会馆林立，运河中的商船首尾相连，被誉为“崇武连樯”，列入东昌八景，经济繁荣程度远远超过省内其它州府，有“江北一都会”之美称。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饮食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聊城厨师可以学南效北，烹饪原料也可采购南北之精品，因此而言，明清之际的聊城地方风味决不亚于省内其他地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兴旺，聊城先后出了状元3人（文状元傅以渐、邓钟岳，武状元李梦悦），文武进士71人，文武举人323人。达官贵族纷纷在聊城城里和四郊建筑豪门阔府。当时有“东昌五大家”、“东昌十大家”、“七大家、八小家”之说。这些达官贵族诗书传家，受儒家礼教影响，讲究礼仪，待客设宴，注重席面丰富、色味浓重。另一个原因，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地主阶级已到了腐败奢侈的时期，穷奢极欲，恣意享乐。厨师们不但要继承传统技艺，还要根据贵族的食欲，不断研究创新，采其精萃，补其未备，使菜饌、小吃、糕点更加细致精美。这样，聊城菜就开始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席面丰满、色泽略深、味道浓厚、精于刀工、火候适当等。

2

近代以来，聊城菜在深厚的传统基础上，继承发展，使已经成熟的烹饪技艺长盛不衰。出现了名店林立、名吃繁多、名厨辈出的局面。矗立于运河之畔的“蛤蟆楼”，在十九世

纪就名贯南北。后来又相继出现了凤翥楼、三德园、三庆园、宴宾楼、庆丰楼、鲁西饭庄以及解放初期的会英楼、同福春、十三姊妹、人民饭庄等名饭馆。著名的小吃有孟家包子、沙镇呱哒、孙家呱哒、薛家脂油饼、张家厚饼及后来的“张金香的馒头”等。魏氏熏鸡自清朝道光年间创制以来，就远销省内外。一九三五年老舍先生在青岛品尝时，连声叫好，看着它那铁色铁气铁骨铮铮的样子，联想到大明忠臣铁铉，遂赐名“铁公鸡”。清末名厨许延堂（1865—1937），聊城许营人，光绪年间就在聊城东关和城里各大名店里主灶，技术全面，民国初年曾为东临道尹做过“一百单八件”的寿宴。稍后又有任光远，在清末民初的聊城厨行享有盛誉。二、三十年代以于海林的技术最高，即精刀工，又精勺工，尤擅长甜菜。在三德园主灶时，其拿手菜“糖酥鲤鱼”备受欢迎。四、五十年代以高金福（1914—1963）最负盛名。他家住光岳楼西街，出身于烹饪世家，烹调技艺有绝到之处，尤精于火候的掌握，对传统菜“糖醋鲤鱼”、“琉璃丸子”、“锅烧肉”、“煎丸子”都做得非常出色。与其年龄相当的韩凤珠则以刀工见长，出手利落。他拿手的“布袋鸡”出骨干净，连头部碎骨和翅骨都能抽出，这是一般厨师难以做到的。新中国成立后，烹饪技术受到应有的重视，老名师们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热情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地方名厨。这代名厨学徒于建国初期，成名于六十年代，显赫于七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各大菜系、各种流派的交流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地方传统菜受到外来菜和创新菜的冲击；第一代名厨中以高士玉为代表，虚心学习其它菜系，勇于革新发展传统菜肴，使聊城地方风味更具特色。

3 虽然聊城烹饪文化历史悠久，但地方烹饪理论的研究却一直不被重视。旧时代的厨师出身贫寒，多数没有文化，而文人们又受孟子“君子远庖厨”说法的影响，对烹饪技术不屑一顾。师徒传艺，只注重实践，没有理论可讲。新中国成立

后，百废待兴。老名师许尚英（1903—1972）第一个走上讲台在聊城东门里“红专学校”讲授烹饪理论。他生前住在城内马宅街，民国初期曾上过几年学，因为爱好文史，苦于自学，使他成为同代厨师中唯一的一位即有理论又精技术的名厨。他读过不少史书，《吕氏春秋》的“本味篇”他背得滚瓜烂熟，他能用自己的语言把伊尹的那一套烹饪理论讲解得非常透彻，堪称聊城烹饪史上第一位理论研究者。可惜的是，他在文革中去世后，笔记资料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已散失殆尽。1972年，县商业系统组织“厨师学习班”，委托高士玉（1938—1987）编写了《烹饪讲义》。随后，经老名师虞魁元（1897—1981）、陈玉春等人口头研讨，由高士玉执笔整理，编出了聊城历史上第一本地方风味菜谱——《聊城菜谱》。时值文革，书稿未被重视，没有铅印发行，现仍有几本手抄本存世，为研究聊城传统风味的正宗做法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名厨师虞魁元技术上以刀工见长，是清末民初名师任光远的徒弟，受过聊城传统风味的正宗传授。1943年聊城大旱，他逃难到济南，曾在省政府里当过厨师，接触到济南风味。因此，虞魁元会做的菜肴种类多于其他厨师。1972年编菜谱时，他已经75周岁了，虽然已退休多年，无力操作了，但张口便能报出几百种菜肴的名称和制作方法。高士玉是聊城地区最早的特级烹调师之一，也是地方传统风味菜肴的承前启后者，五十年代拜师于高金福、韩凤珠，又曾求教于虞魁元、许尚英等名师，成为聊城传统风味菜肴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上又有发展创新。他拿手的“空心琉璃丸子”已被收入商业部饮服局、中国烹饪协会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联合统编的《中国名菜谱》（山东分册）中。书中介绍说：“空心琉璃丸子是聊城地区传统风味甜菜，其酥脆甜美的魅力，深得人们的喜爱，广泛流传于城乡。以聊城饭店特级烹调师高士玉制作为最佳。”高士玉生前系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聊城市六届政协委员、山东省烹饪学会会员、聊城地区烹饪学会理事。这充分显示了新

中国厨师地位的提高。1987年5月，高士玉带病主教了“聊城地区饮食技术培训中心”第一期培训班的课程，当时的学员如今大多数都成了特级厨师，成了鲁西名厨的佼佼者。刁书文汇编的《鲁西菜点谱》，填补了聊城乃至整个鲁西地方烹饪文化理论方面的空白，在地方烹饪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近几年来，聊城烹饪文化受到国家级书刊的肯定。聊城传统名吃“呱嗒”已被《中国烹饪百科全书》收录，“聊城铁公鸡”和鲁西面食（高桩馒头、八批果子）、“空心琉璃丸子”都被《中国烹饪》（1985年第3期）刊文介绍。《中国名菜谱》（山东分册）在“概论”中写道：“独具特色的鲁西北的禽蛋菜，泰安以豆制品为主要原料的素菜以及鲁中地区具有齐国遗风的肉、鱼菜等，与济南、胶东、济宁风味共同构成了久负盛名的鲁菜菜系，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的烹饪文化。”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最后寄语从厨诸君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使聊城烹饪文化闪耀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提供口碑资料者主要有聊城饮食服务公司退休老工人虞金生、老厨师高士元、四中教师许广达等。参考书籍主要有《聊城商业志》、《鲁西菜点谱》、《中国名菜谱》（山东分册）、《中国烹饪》（1985年第3期）等。参考材料还有1987年11月聊城广播站播发的《他为提高我市烹饪技术水平奋斗了一生——记已故市六届政协委员、特级厨师高士玉》广播稿等。）

聊城市戏剧团体简介

(1952年—1966年)

杨 道 田

聊城市评剧团

1952年冬，天津艺锋评剧社来聊城演出，县文化馆接管了该剧社，定名为聊城县艺锋评剧团，团址设在山陕会馆内。1954年剧团更名为聊城县评剧团。1958年县改市制，剧团改称聊城市评剧团；体制为自负盈亏的民间职业剧团。全团演职员共70余人。

机构设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委派到剧团工作的国家干部担任辅导员或指导员；剧团委员会由团长1人，副团长2人，委员4人组成。剧团艺术委员会由主任1人，委员4人组成；工会委员会设主席1人；共青团支部委员会设书记1人。先后在剧团担任主要负责人的有：杨孝野、庞有新、张连成、梁汉臣等。

主要演员：李艳荣、李宝珠、花翠仙、筱玉芳、郭凤仙、筱洪霞等。

演出的传统剧目：吕布与貂蝉、珍珠衫、桃花庵、唐伯虎三笑点秋香、杨八姐游春、刘巧儿、小二黑结婚、杨三姐告状、小女婿等。

活动范围：河北省部分地区及山东各县市。

1960年遵照上级领导机关精兵简政的有关规定，聊城市评剧团撤销。部分演员调到其他文艺团体工作，多数人员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农业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

聊城市京剧团

聊城市京剧团原为德州专区京剧团。该团始建于1942年前后，由八路军渤海军区创建，系部队文工团性质的京剧团，活动在河北省南部及鲁北一带，主要为部队服务。解放战争开始，大军南下时，部队将该团移交给衡水专署。德州专区设立时，剧团调归德州专区，全团演职员共百余人。1956年德州专区撤销，部分行政区划归聊城；同时，德州专区京剧团调归聊城领导。1958年该团下放聊城市，改称聊城市京剧团。

机构设置：剧团设党支部委员会、共青团支部、剧团委员会。剧团委员会下设：编剧导演组、宣传组、演出组、音乐组、服装道具组。剧团主要负责人先后为：李明甫、田武仲、范维和、杨宝童、赵啸澜等。

主要演员：赵啸澜（青衣花旦，全国四大坤旦之一）、杨宝童（须生）、崔少卿（青衣花旦）、王文娟（刀马花旦）、田富振（武生）、褚世勤（小生）、刘灵芝（老旦）、金义臣（花脸）、樊元吉（丑）等。

演出剧目：除经常上演京剧的传统戏外，还演出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如：海瑞罢官、杨门女将、白毛女、九件衣、五粮饭店、棉花姑娘等。

演出范围：曾在许多省份、各大城市及乡村集镇做过巡回演出。该团是省内外较有影响的剧团。

1961年德州专区恢复建制，剧团原班人马调回德州专区。

聊城市河北梆子剧团

聊城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前身系联友剧社，主演河北梆子兼演京剧剧目，组建于1948年，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冀鲁豫军区民友京剧团；后转变为民间职业剧团。1952年改称民益剧团。1956年聊城县文教科接收该团，定名“聊城县河北梆子剧团”。1958年县改市制，剧团改称“聊城市河北梆子剧团”。1963年市改县制，剧团复称聊城县河北梆子剧团。1966年10月，该团与县京剧团合并，改称聊城县文工团，演出京剧兼河北梆子剧目。

聊城市河北梆子剧团，原有演职员70余人，经过1960年、1964年两次精简下放，演职员缩简为49人。

剧团体制与工资待遇：剧团体制为自负盈亏性质的民间职业剧团。建国之初，演职员按艺技高低评分领薪，收入很不稳定，演职员的生活没有保障。1956年后，剧团实行低薪分红制。1958年剧团演职员按国家颁布的统一工资标准评定文艺级别，实行月薪工资制，收入亏损的部分由县财政给以适当的补贴，演职员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

机构设置：剧团设党支部、共青团支部、剧团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先后在剧团担任主要负责人的有：韩学勤、安秀梅、张金芳等。

常演剧目：反西凉、打金枝、采花赶府、三世仇、沙岗风云、夺印等。

活动范围：该团除在本县城乡演出外，还在山东、河北两省许多县城乡镇做过巡回演出。

该团在“文革”中撤销。

聊城县京剧团

聊城县京剧团的前身系馆陶县京剧团。1964年区划改革，馆陶划归河北省。是年聊城专署决定将馆陶县京剧团调归聊城县领导，改称“聊城县京剧团”。团址设在县立第八中学（现市第四中学）校院内。全团演职员共60余人，县文教局委派赵冠居到剧团负责，原剧团团长娄崇玉留任。1966年10月，该团与县河北梆子剧团合并，改称为聊城县文工团。以演出京剧为主，兼演河北梆子。后文工团撤销，京剧人员调归聊城地区京剧团。

聊城梨园史话

杨 道 田

梨园简介

昔日聊城有六大戏班：吉庆班、刘官营戏班、孙堂班、姚屯班、沙镇庆丰班、沙镇艺庆班。吉庆班亦称“吉庆舞台”，俗称“李家班”，是一横笛梆子（河北梆子）兼演京剧的戏班，由城内白衣堂街李长业（回族）于清朝末年创建。该戏班设备完善，演出阵容强大（有百多人），管理健全。名演员有：“外国匣子”李长法、“一斗金”吴明、“脆萝卜”康有信等。在农村多演唱横笛梆子，在城里戏院、会馆演出或在唱堂会上多演京剧，足迹遍及鲁西各县城、乡村集镇。吉庆班子为培养自己的演员，加强演出阵容，于民国十年（1921年）创办了科班（俗称“打小班”），并抽调演员任教，行当齐全，文武皆备，三年出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李长业年迈，遂将戏班交由其子经营。后因时局动荡，战火频仍，民不聊生，吉庆班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解体。刘官营戏班系演唱四根弦的乡间戏班。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前后，一精通四根弦戏的民间艺人，自泰安逃荒至刘官营，杜秉志等人师从学之，始聚而玩唱，后成一小戏班。农忙务农，农闲演出，逢年过节，遇有红白喜事，古会来帖相请便去唱戏，从不讲

什么报酬。该戏班以其唱腔、道白乡土气息浓郁，音乐伴奏别具一格，故事性强，通俗易懂，极为群众喜闻乐见，特受农村妇女迷恋，故有“拴老婆橛戏”之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戏班解体。孙堂班，系横笛梆子戏班，是于集孙堂的孙嗣恩用重金在外地招聘演员，并出资购置所需用品筹建的，该班设备齐全，阵容较强，曾在河北、河南及鲁西南各县巡回演出。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嗣恩病故，其后人不善经营，不久戏班解散。姚屯班系四根弦戏班，是董长路夫妇于民国九年（1920年）创建的以家庭为主体的职业性戏班。董长路乳名小路，其妻夏氏人称小路家，任戏班主角，故该班俗称“小路家班”。经过20余年含辛茹苦的经营，戏班逐渐发展成三、四十人的乡间戏班，演出水平和聊城第一大班“李家班”不相上下。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戏班解体。沙镇庆丰班系横笛梆子科班，由沙镇的李杰山、朱锦堂二人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创建。艺徒招收时订有生死合同，三年出科。由于演出水平不高，上座率较低，人不敷出，遂转让给沙镇街开面食铺的李兰亭经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戏班亦因亏本而解体。沙镇艺庆班系王艺庆、王艺亮兄弟二人创建的横笛梆子戏班，亦称“王翠玉班”，由王翠玉挑梁唱戏。全班五十余人，阵容较强，除在本县演出外，足迹遍及郓城、范县、莘县、堂邑、齐河、济南、长清、肥城、东平等地。艺庆班历尽坎坷，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解体。

梨园轶事

名不虚传的“外国匣子” 吉庆班管主李长业，因年迈将戏班交由其子李文祥、李贵祥经营，当时人称大先生、二先生。“外国匣子”系吉庆班红极一时的名角李长法的诨号。

他功须生，拿手剧目为三国戏，如江东计、借东风、柴桑口等。因

其扮相俊逸潇洒，刻画角色维妙维肖，嗓音洪亮高亢，唱腔流畅甜润，且集“四功”、“五法”于一身，声隆一时。民国初年，人们始见“留声机”视为奇物，称谓“外国匣子”。听了李长法唱的戏，反觉得他的嗓音比外国匣子放出的歌曲、戏文还好听，所以就用“外国匣子”称道李长法，天长日久他的真实姓名反被人淡忘了。“外国匣子”原来在河北省遐迩闻名，大先生、二先生对他十分倾慕，早想将这位著名须生请到吉庆班来。为延聘这位“外国匣子”还引出了下面一段趣事。一日，大先生、二先生闻听人言，“外国匣子”在河北某戏班演出合同期满，正在寻机搭班，遂选派得力心腹专程前往拜访。洽谈之后，“外国匣子”应邀来聊。他只是先来看一下，演出合同细节并未商定，是否签约，还要根据双方的态度另作商议。大先生、二先生对“外国匣子”虽然倾慕已久，却未晤面，想象中的这位名角，定是一位穿着考究，相貌堂堂，谈吐不凡的大家。待相见之后却大失所望，简直无法相信面前的这位骨瘦如柴，面带病态，邋邋不堪的人物，竟是大名鼎鼎的“外国匣子”。二人相对无言。客人远道而来又不好怠慢，忙吩咐准备酒饭接风洗尘，叮嘱掌班、帐房陪同，自己借故拱手告退。掌班、帐房尾随而出，大先生、二先生示意，可婉言相告本班暂不延聘，请他原谅。“外国匣子”是个走南闯北见过大世面的，对人情世故十分透彻，他看到大先生、二先生的敷衍态度，心里早就有了底，遂一笑置之，只管埋头喝酒吃饭。酒过三巡，掌班笑曰：“大先生、二先生刚掌管吉庆班不久，意在整饬班风，想拿几出看家的戏，以彰李家的声望，暂不聘外角，请先生见谅。”帐房忙接过话说：“大先生、二先生再三交待，要您在此多玩两天，逛逛东昌府，去华佗庙戏楼看看，千万别忙着走。”说着拿出拾块钱放到“外国匣子”面前说：“这是大先生、二先生给您老零花的。”“外国匣子”笑曰：“我带的钱够用，无功焉能受禄，情领了，钱我不能要，请替我谢过两位先生。”说罢，将钱推到帐房面前：

“此次来宝地，一来承蒙二位管主盛情相邀，特专程拜访交个朋友；二来久仰东昌府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借机见识一下，并无意久留，更无意搭班，本想目下就告辞，怎奈二位管主设宴款待心甚不安。既有现成的台口，我愿演上一出戏献献丑以示谢意。”掌班和帐房听后马上向大先生、二先生禀告，他们正想摸一下对方的实底，即刻吩咐临时改戏。于是大街小巷贴出了“今晚‘外国匣子’主演柴桑口”的海报，戏迷们听说来了名角，竞相购票以睹名尤风采。开演前华佗庙大院人声鼎沸，观众爆满。“外国匣子”果真名不虚传，一经化装，形象丰满，神采奕奕，台上台下判若两人。出台后，只见他一招一式颇见功力，做功细腻，情感逼真；唱腔优美动听，吐字清晰，甚有魅力。把诸葛亮一角演得活灵活现，去东吴吊丧哭祭周瑜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掌声阵阵，喝采声不绝于耳。大先生、二先生在台下设专座看戏，被“外国匣子”的高超演技所折服，深悔自己以貌取人。未等止戏，便吩咐“要好好款待，想方设法挽留，千万别让他走了”。果不其然，“外国匣子”下来戏卸完装便要收拾东西准备离去，经再三劝说，加大先生、二先生又当面致歉，恳切挽留，便允诺留在了吉庆班。大先生、二先生宽厚待人，处事以诚相见，“外国匣子”又性情豪爽，重友情、讲义气，三人相敬如宾，遂成莫逆。

2

贫苦乡民“半碗蜜”

刘官营四根弦戏班主演杜白三，自幼家境贫寒，体弱多病，而立之年未曾婚娶。自与杜秉志等人创办刘官营戏班后，便潜心于花旦角色的刻画与研究，历经数载，他的演技有了很大提高。杜白三以其俊俏的扮相，优美的唱腔，及对角色独特的刻画而使人着迷。刘官营一带和邻县的老百姓都爱听他的戏，并起了个诨号叫他“半碗蜜”，意思是听了杜白三的戏如同喝下半碗蜜糖样甘美。据说，有一次他随戏班到外庄去唱戏，当地一妇女听说杜白三来唱戏了，便抱起熟睡的

孩子跑去看戏。途经一块金瓜地，慌忙之中被绊了一跤，孩子脱手落地，她错把金瓜当做孩子抱着就走，及闻孩子的哭声，方知怀中抱的是金瓜。又一次，一个妇女在家中贴饼子，忽闻有人喊：“杜白三来咱村唱戏了。”遂扶门观望，高兴之极将饼子贴在门扇上就去占地地方了。别看杜白三在台上打扮得花枝招展，犹如二八佳人，在台下却是另番模样。由于家境贫寒，且无妻室照料，常常是衣着不整，缺鞋少袜，戏迷们十分同情。每到一地演出，总有些好心人送些衣物或鞋袜给他，老百姓还编成顺口溜来谈论此事：“戏子白三上了台，不缺袜子不少鞋，张家送来李家买，三年二年穿起来。”以上虽系传闻，但从中可以看出广大农村观众，对四根弦戏的迷恋和对杜白三这位土生土长的地方戏演员的喜爱。杜白三四十多岁因病早逝，时至今日人们提及他尚唏嘘惋惜。

3 苦尽甘来“一篓油” 董长路夫妇家境贫寒，靠打花鼓乞讨卖艺为生。小路家演唱四根弦没有师承，她听了别人唱的腔调板式，并与自己的花鼓调相融合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由于小路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艺术风格日臻成熟，高超的艺术才能和演唱技巧，备受社会各阶层人士赞赏。她的拿手好戏是“拾棉花”。当年每演此剧，观众就往台上扔铜钱，让她借拾钱之机多做几个拾棉时的优美而真实的动作；每逢此时，便高潮迭起，掌声不绝。她每到一地都能演红，故广大观众爱称她“一篓油”，意思是她本人及她唱的戏，犹如一篓香油醇香四溢。这在民间流传的顺口溜中即可看出群众对她喜闻乐见的程度：“听了小路家唱的四根弦儿，忘了家里的老婆孩儿。”是说有一次她到古运河东蒋官屯一带去唱戏，一妇女听说小路家来唱戏了，忙乱之中抱起孩子便去看戏，当别人问她时，方察觉自己错把枕头当作孩子抱走了。

小路家性情豪爽，为人良善。从艺时，有与艺人同舟共济的美德；务农后，又有茹苦含辛的劳动人民的本色。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聊城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民众纷纷逃往外乡谋生。小路家带戏班过了黄河，董长路不幸饥饿而死，两个女儿被迫出嫁；独木难支，戏班解散。小路家携子回到姚屯，终日劳作，勤俭持家，历尽千辛万苦迎了解放。她分了房子和土地，儿子也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生活。小路家虽然年事已高，但她常年参加生产队劳动，还多次被公社、各大队邀请去做忆苦思甜报告，向青年一代讲述她在旧社会的卖艺生涯和一生经历的磨难，教育青年一代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激发了他们爱党爱国之情。1980年小路家因病去逝，享年81岁。时至今日，人们仍在怀念这位饱经风霜、曾为戏曲事业做出过贡献的民间艺人。

4

苦如黄连的王翠玉 沙镇艺庆班主演王翠玉，本姓陈，民

国二年(1913年)生人，兄妹五人行四，四妮便是她的名字了。因其父母收入微薄，生活十分拮据，时常断炊，四妮从小便随兄靠乞讨度日。这天，王艺庆、王艺亮弟兄所在的东阿戏班来聊出演。开饭时，四妮兄妹前去讨要；王氏兄弟见四妮长相标致，十分讨人喜欢；又见她衣着褴褛，骨瘦如柴，小小年龄就四处乞讨，甚为怜悯，便多给了她们一些干粮。兄妹俩饥饿难耐吃得格外香甜。王艺庆之妻，人称老高家，因久婚不育被抛弃，经人撮合嫁给了王艺庆。她自己不能生育，对别人的孩子很眼热。今日见了四妮便有了收养之意，王艺庆亦有此心，遂一同拜见了四妮父母。待听明来意后，四妮父母不禁潸然泪下，可为了给孩子寻条生路便忍痛答应了此事。王艺庆夫妇给陈家留了点粮食便把孩子领走了。四妮更名王翠玉，从此便开始了艰苦的学艺生涯。昔日学戏称“打戏”，一句台词记不住要打，一个动作做不好要打，总之，每出戏都是在挨打中学会的。为此，小翠玉不知受过多少次皮肉之苦。她十来岁时便登台饰演丫环彩女，十七、八岁时便能挑梁唱戏了。王氏兄弟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便回到沙镇创办了戏班。王翠玉年轻貌美，文静贤淑，在台下梳一条大

辫子，格外引人注目；台上扮相俏丽，风姿绰约，唱念俱佳，不久便名噪一方。王氏兄弟待翠玉胜过亲生，视如掌上明珠。这时的老高家却另有了打算，她见养女出息得如花似玉，演戏又有了名气，便时刻把她当成摇钱树。逢官宦士绅、纨绔子弟来贴宴请或约唱堂会，老高家皆满口应承。王翠玉虽然出身寒微，却不被金钱名利所诱惑，洁身自持，有伤风化的事绝不为之。眼见金钱梦化为泡影，老高家气急败坏，大施淫威。王翠玉不知挨过多少次打骂，但她甘受皮肉之苦，也不愿身心受辱；且幸有王艺庆兄弟二人的照顾和看护，王翠玉得以幸免。可好景不长，王艺亮不知何故被人黑枪打死，不久王艺庆亦忧郁而亡。艺庆班完全由老高家一人把持，可怜王翠玉从此落入魔掌之中，每日演完戏便被打得皮开肉绽。王翠玉走投无路，毅然逃回娘家，家人久别重逢恸哭了一夜。翌日一大早，老高家派人找到了陈家，威逼王翠玉又回到了艺庆班。这老高家唯恐夜长梦多，很快便将王翠玉许配给豪富赵家做了偏房，从中捞取了大笔钱财。王翠玉被迫出嫁，从此含恨离开了艺苑。

（薛守鼎 孙元芳整理）

聊城曲苑杂谈

杨筱玲

曲坛旧俗

旧时曲坛颇多讲究和说道。如果曲艺艺人没有师承，在社会上便无立足之地，不但同行不与你合作，还会被戏谑为“海青腿”或“乳生子”，到头来寸步难行。如若在社会上有所发展，必须先拜师认个家门方站得住脚。昔日曲坛分四大门，即：孙道门、柴门、李门、美清门；另一说为郑、柴、杨、张四大门。不管进了哪一门，走遍天下都有门里人，只要能续上辈份，无论年龄大小，后辈要向前辈行跪拜大礼，亲如家人；纵然不是同门人也能相互关照进行合作，遇到困难，也可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然也不乏少数门人相煎、忌妒吝刻之辈。

聊城曲艺艺人多为孙道门和美清门弟子。孙道门中的辈份共二十个字：“名长振书祥延年益寿康拜顺成一礼德义百世香。”自头一个字开始，按序下传，循环往复代代相沿。如聊城已故著名评词艺人钱大喜，民国初年师从孙道门“长”字辈的李长奎，并隆重地举行了拜师仪式，师傅找到了保师给他依序从“振”字辈起了个江湖上的“跑号”（名字）叫钱振亭。

曲坛各门又有南北之分，并有许多派系和分支，门外人很难

了解详细。特别是在社会交往中，曲艺艺人的言谈话语里，往往夹带许多暗语，亦称行话。诸如，曲坛门里凡属以唱为主的艺术形式称谓“流口”；凡是以说为主的艺术形式称谓“平口”；表演魔术的叫“栗子活”；表演马戏的称谓“大兴棚”；表演武术的叫“褂子活”等。再者，曲艺艺人对外行的总称为“空子”；外行小伙子称“陈探子”；外行大姑娘称“小斗花”或“剪头花”；年纪稍大的妇女称“还斗花”或“小力士”。喝酒称“火臄子”；抽烟则称“草臄子”等等。曲艺艺人见面交谈时多用行话，门外人是听不懂的。所以，徒弟拜师后，除了向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外，学习本门规矩、禁忌、行话及待人接物的礼节等是必不可少的。

曲坛轶事

1 张兴隆窘境遇知己 著名木板大鼓艺人张兴隆，因为书说得泼辣，气大力足，嗓音宏亮，故外人送号“张三骡子”。他与临清的孙三骡子（孙春瑜）是师兄弟，清末民初

二人均为曲坛高手。有一次在临清赶庙会搭对棚，平时二人亲如手足，但在艺术上各不相让，他们就在说书场上叫上了劲，都拿出了看家本领，只怕负于对方，二人谁也不甘示弱。听书的群众把两个书棚围得水泄不通，拥挤不动。不但赶会的群众听了好书，也为古会增色不少，群众高兴地说：“两个骡子对踢真带劲。”意思是两个人均为曲坛高手，都有超出一般的绝活，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张兴隆年轻时书说得响，名气也大，群众敬称他“张三爷”。他曾在上海挂“山东木板张”的牌子摆场子说书，轰动一时。说书走红，生活也倒无忧无虑，到了老年却命运多蹇，十分坎坷。

有一年，他流落到青岛，去投奔一位朋友，不料他这位朋友早已远走他乡。由于途中劳累他又大病一场。待病势稍轻，已是囊空如洗，归无川资；要留下又无立足之地，只落得沿街乞讨度

日。聊城大杨庄的杨怀仁，到青岛贩卖蚰子葫芦。在大街上与张兴隆邂逅相遇，杨惊愕地望着张兴隆，只见他，头发蓬松，胡须脏乱，穿着破烂不堪且污垢满身，便问：“张三爷，因何落得这般光景？”张兴隆睁开那双失神的眼睛，看看面前的陌生人，有气无力地问：“你是……？”杨怀仁忙说：“我是聊城大杨庄的，咱是老乡，过去我常听你说书，几年不见三爷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张兴隆掩面长叹一声：“唉！一言难尽！”随之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杨怀仁赶忙劝慰，并说：“张三爷如何不说书呢？”张兴隆用衣袖抹去腮边泪水，说：“因我大病一场，所带钱财衣物殆尽，只得沿街乞讨度日，眼下这个样子，恐怕书场老板连门也不会让我进。”杨怀仁对张兴隆的不幸十分同情，便慷慨解囊相助，把卖蚰子葫芦的收入全部拿出来交给了张兴隆，并说：“这些钱你拿去用吧，置办鼓板，买几件衣服，先找个书场说书，好有个落脚的地方；要是钱不够用，我再想点别的办法。”张兴隆接钱在手，两只泪眼望着杨怀仁，浑身颤抖激动不已。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异乡窘境中，竟会得到老乡这样无私的帮助。二人当即走街串巷，又是理发洗澡，又是购置鼓板，还买了件大褂，张兴隆穿着打扮起来倒也不减当年。民国年间的青岛多衣帽取人，曲坛又早闻张兴隆的大名，所以联系演出场地极为顺利。张兴隆挂起了“山东木板张”的牌子，头一场演出就轰动了书场。以后场场暴满，经久不衰，他的拿手曲目《黑驴段》尤受听众和行家的好评。由于张兴隆的挂牌演出，书场老板赚了不少钱。张兴隆本人的收入也颇丰厚。书场老板每遇张兴隆，先是点头微笑，然后拱手抱拳敬呼“三爷”。张兴隆演技高超，誉满青岛曲坛。这时的张兴隆并没有忘记老乡的资助之恩，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他重谢了杨怀仁，后结成莫逆之交。张兴隆窘境遇知己，杨怀仁慷慨助乡亲之举，一时在阎寺、梁水镇一带被世人传为佳话。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兴隆流落到了济宁。社会动荡，兵荒马

乱，他无法摆场子说书，断绝了生活来源，贫病交加惨死在济宁街头。

2

逯本荣赴京献艺 逯本荣，浑号“逯大手指头”，祖籍聊城城南刘营村，生于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二月五日。他自幼酷爱八角鼓艺术，约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拜在著名八角鼓艺人吴化侠门下。因逯本荣左手食指、中指特别粗大不适合弹三弦；吴化侠收他为徒有些勉强。后经逯本荣刻苦磨炼，终于克服了生理缺陷，练就一手好三弦；加之他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在师父的悉心教授下，不久弹唱俱佳，成了吴化侠的高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攻占聊城，逯本荣被迫回到刘营村。在日寇铁蹄践踏下，聊城民众苦不堪言，生活每况愈下。前辈八角鼓艺人吴化侠、贾占玉等相继去世。从此，逯本荣独撑门户。在极其艰难的境遇中收徒授艺，历经数年之努力颇有建树；徒弟遍及聊城城镇乡村，多达五、六十人，使独具特色的聊城八角鼓这一古老的曲艺表现形式流传了下来。

逯本荣对徒弟的要求非常严格，传授技艺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每个曲牌，每句唱腔，百教不厌。在众多的徒弟面前，他既为严师，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深受同行和徒弟们的敬重。为了丰富和更新八角鼓戏的演出内容，他经常坚持业余创作，八角鼓的传统保留曲目：“熬小要丈人”、“要赔送”、“老来难”等，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另一特长，就是在演出过程中，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欣赏对象而即兴创作，风趣幽默，很受欢迎。此举高人一筹，深受观众的好评及同行们的佩服。因他经常参加民间的娱乐活动，故“逯大手指头”的浑号，妇孺皆知，远近闻名。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民间文艺的挖掘与发展，聊城八角鼓获得了新生。

1953年11月，逯本荣受中央民族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特邀赴京献艺，将流传下来的八角鼓曲牌三十六个全部录了音；同时，

他的拿手曲目“长坂坡”、“女起解”等也录制成音响资料。他那独特的演唱风格及高超的演奏技巧，受到了专家、学者的赞誉。1957年7月，逯本荣受到山东省曲艺协会的特邀，参加了省首届曲艺会演。年逾古稀的逯本荣为大家演唱了传统曲目“长坂坡”，大会为他颁发了荣誉奖。1958年逯本荣自编自演了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曲目“快走总路线”，大开了八角鼓演出现代曲目的先河。

逯本荣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在田间他是农活的多面手，1955年县农场聘他为农艺师，还曾被选为县劳动模范。逯本荣作为曲坛演唱、伴奏、创作高手，半个世纪以来，对聊城八角鼓戏的研究与继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发展这一古老的说唱艺术形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逯本荣性情敦厚，为人诚挚，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堪称艺人楷模。逯本荣因病于1960年去世，享年75岁。

3 钱大喜痴心为评词 钱大喜祖居聊城城里，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出身于官商世家，父亲曾任过湖南长沙知县。钱家曾在聊城城内开办过经营金银首饰之类物品的金店。昔日，聊城豪富有十大家之说，即：任邓朱傅耿，徐褚邵罗钱，钱家乃十大家之一。钱大喜其人，自幼苦读四书五经，博学多才，能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曾著有“宋世鸳鸯谱”一书，可惜此书早已亡佚。钱家自钱大喜这一代家势逐渐败落。此人不善营生，仗着家大业大花钱如流水，毫不吝刻；待人慷慨豪爽，举止洒脱，提起钱大爷的为人都会称道一番。钱大喜自幼喜爱戏曲和曲艺，酷爱评词艺术。他经常把戏班及曲艺艺人请到家中演唱，只要把他唱高兴了，管吃管住一唱就是几个月；什么时候听够了，才施重金送这些人离去。后来，家业凋零一贫如洗，为求生存便以说评词为业了。约在30多岁时，钱拜李长奎为师。拜师仪式十分隆重，李长奎往各处发了请帖，并给钱大喜找了保师，起了跑号（名字）曰“钱振亭”。钱大喜在旧居大摆宴席，宾客盈庭热闹

非常。钱大喜拜师只不过是认认家门求个名份，师父在业务上并没有教过他多少东西。他的演技是在自学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探索潜心研究、实践而逐步提高的。他演出的曲目，多是看书学来的，他把书本故事根据评词艺术的特点加以整理改编后演出。他演出的曲目，文学水平高，故事性强，人物形象鲜明、别具一格。他的拿手曲目为“三侠剑”、“彭公案”等，他说的“十六义”、“胜英小出世”也很有特色。钱大喜在演出中极有魅力，他口齿清楚、感情丰富、表演得当，吟诗答对、批文解字详细透彻；同样一段台词，经他口中说出的就是与众不同，绘声绘色分外感人。不管在什么地方说书，他都能把观众吸引到自己身边，就连从艺之人也愿听他说书。他每到一地，戏班里便派人来请，让他住在演员的宿舍里，抽空说上一段书，对他的表演才能无不啧啧称赞。昔日，起会时，戏台前都搭一个罩棚。待台上止戏后，他便在罩棚下说书。没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享有盛誉的曲艺艺人是不敢在这里摆场说书的。因为罩棚下面太乱，又刚刚止戏，很难吸引听众。唯有他能此时说书，可见他确有超出一般的本领。他在演出活动中，经常与临清的赵四花鞋（赵庆轩）合作演出，钱大喜留着燕尾胡须，赵四花鞋留着颏下涛胡须。二人头戴帽衬，身着马褂长袍，仪表不俗，一派文人风度不同凡响。钱大喜曾与评词表演艺术家傅太臣，山东琴书表演艺术家邓九如等名家搭过对棚。钱大喜一生教过不少徒弟，高足在天津曲坛是较有影响的名家。钱大喜于1962年在聊城不幸病逝，享年68岁。

（薛守鼎 整理）

昔日聊城的装裱业

杨道田 朱淑惠

装裱亦称“装背”或“裱背”、“装潢”，是我国传统的装饰书画、碑帖的特殊技艺，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唐六典》中已有记载；唐张彦远在《论装背裱轴》（见《历史名画记》卷三）中亦曾作过叙述。明代周嘉胄《装潢志》裱背十三科及清代周二学的《赏延素心录》则为装裱的专著。至于装裱工艺何时传入聊城的，已无法考证。

1 旧时聊城四大装裱店 清末民初，聊城装裱店共有四家，即：义和成揭裱店、兴盛久对联发庄、松鹤斋揭裱铺、顺和成装裱店。义和成揭裱店，店址在旧城东关大街馆驿口以西，座北朝南与“四海春洗澡塘”门面相对。该店由戴宝林（人称戴八）先人创办，究竟始于何年不详。装裱技艺系祖传手艺，由戴宝林自家经营，不收伙计和艺徒，以装裱新书画为主，一般不修复残旧书画。民国十九年（1930年），匪首王金发率部闯入聊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戴宝林携家带口逃出聊城定居东阿，义和成揭裱店从此停业。

兴盛久对联发庄，由邓本海、许光秉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原址在东关大街驴市口以东路南，后迁至“怀德堂药店”西邻、五间门面，后有一厅，另有三间配房为制作车间。邓、许二人系师兄弟，曾在河北省武安学徒，期满后返聊城，二人合资开了此号

店铺。据百岁老人吕宝太回忆，当时该店招收艺徒十多人，既装裱新书画，也善修复古今名人残旧书画；同时还经营书画和对联的批发与零售。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聊城虽处内地暂未受兵燹之苦，但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对联发庄生意每况愈下，终因无力支撑被迫停业。

松鹤斋揭裱铺，是由堂邑人王金如于清末民初创建，址在东关大街（现职工俱乐部西邻），三间门面。由王金如带二子王树桐（号峰山）、王树堂自家经营，对外不招收艺徒、伙计；既装裱新书画，也修复名人残旧书画。后王金如病逝，王树桐在古楼东（现市政府对过）开设一分店，亦称“松鹤斋揭裱铺”；原来的店铺由胞弟王树堂自家经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夏，聊城发大水，洪水破城而入，王树堂落水溺死，店铺停业。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军攻陷聊城，到处烧杀抢掠，民不聊生。王树桐双目染疾，经营的店铺亦从此停业。

顺合成装裱店，是由曾广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创建，原址在清孝街，后迁至东关大街。租赁铺面四间，其中两间为门面，其它房间为工房和居室。曾自十四岁起就跟姐夫王春和学习装裱手艺，后到天津拜师学艺。学成后回聊自立门户开了这月装裱店，并招收张宝庆、张昭奎等人为徒。该店既装裱新书画，也善修复残旧书画，为聊城工艺水平较高的店铺之一。后因战乱装裱店停业，曾氏全家回乡务农。1950年该店在聊重新开业。1955年该店并入聊城县印刷生产合作社。后曾广顺将装裱手艺传授给其长子曾昭江，曾昭江又授给其后人曾宪刚、杨武萍、曾宝琴等，迄今已相沿三代。曾家的入室弟子遍布聊城、茌平、东阿、禹城、莘县、新乡、菏泽、临清等地。

2

书画装裱过程及价格 装裱书画，要先将裱件反铺在桌案之上，背面刷上稀释浆糊，然后加纸于其上（最好是与书画纸相同的），将二者粘合到一块儿；轻轻提起，把四个

角或边沿刷上浆糊粘在墙上；待干透后揭下，用刀将撕损的边沿割除悬挂，此谓托裱。将裱件用纸覆托背面，挂轴加镶绫绢或纸的天地（上下方）和边框谓之装裱。残破的书画也能修补完整，书画、碑帖等经装裱后，愈显其艺术特色，便于观赏和收藏。清末民初装裱一幅中堂索价五块银元，装裱一幅对联或条幅索价三块银元。当然也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般要按书画的价值、装裱或修复的程度而定价，实际上要按双方都认可的价格收费。

沧海桑田话聊城

葛 渊

早在远古时期，聊城是山区。山脉环绕，丘陵起伏，林木茂密，古树参天，禽兽聚集。按现在位置来说，聊城东部有一条聊旺山脉，西部有一条聊冠山脉，都是南北走向，两山相距不到百里。今聊城城址在聊旺山脉的西坡上。

距今大约一亿三千万年的燕山运动，使太行山隆起为山脉，山脉东部相继断裂下沉，为海水淹没。喜马拉雅山运动时期，太行山继续上升，东部地区再次下沉到肥城附近。聊城和鲁西大地陷于海底，一片汪洋。当时，聊城境内海水的深度，从东南周店附近的100米左右，向北和西北逐渐加深，到斗虎屯以北海水深度为200米以上。

当时，黄河从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北麓蜿蜒流向东北，穿过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在太行山东侧堆积起来。随着洪水漫流，泥沙向前推移，形成冲积扇。扇把在河南省郑州和孟津县，东南伸到豫东的周口市，东北伸到山东茌平县和平阴附近，成为一个弧形扇。聊城在冲积扇的东北边沿，学术界常说，聊城系黄河冲积平原，由来于此。

二

大约在公元前 2033 年前后，大禹治理黄河。水自高山而来，流势湍急，在孟津县进入豫北平原，转向河北省，在天津以南入海。当时，黄河在豫北的转弯处洪水漫流，为控制流势，夏禹在河南浚县开挖一条东西河道，命名漯（音塔）川，这是徒骇河的前身。由于漯川为黄河分洪，引起后来黄河南迁。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黄河第一次改道，由河北省向南滚动，夺取漯川河道东流入海，至北宋庆历八年（公元前 1048 年），其间黄河七次改道都在聊城南北滚动，历时 1650 年，这样给聊城平原又覆盖上 5—20 米厚的淤层。黄河的改道和决口使聊城地貌出现以下特征：（1）高地，为黄河携沙沉积而成。其中又分河槽高地和河滩高地。主要分布在境内西部的沙镇、郑家、张炉集、堂邑、道口铺、梁水镇和阎寺上堤，以及城东许营、于集与东阿交界处。（2）坡地，系黄河泛滥沉积而成。这种地形在境内的西部、东部和南部，分布较广。（3）洼地，为黄河泛滥尾水缓流或静水沉积而成。主要有白家洼、殷家洼、牛家洼、谭家洼、旧洲洼、十二连洼等。从聊城全境来看，近千年来，由于风雨侵蚀，水土流失以及生产的人为影响，各地都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碱土岭、沙土岗、龟背地、古路沟等到处可见。

黄河在塑造聊城地貌的同时，也携来大量的泥沙和丰富的水肥资源。《汉书·沟洫志》载：“黄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水且肥，长我禾黍。”北宋神宗赵顼说：“大河水源流长，皆山川膏腴渗漉，肥活田地，养育黎民。”几千年来，人们利用大面积的沙壤土和粘土层种植粮、棉、蔬菜、果类等。另一方面，黄水淤积和各种沙层，含蓄着大量的地下淡水。全市浅层丰水区和半丰水区总面积达 1115 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82%，为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

了有利条件。

但在旧社会科学技术落后，不能充分开发地下水资源，十年九旱，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大旱年百姓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情景至惨。加上黄水泛滥无常，淹没村庄，给聊城人民带来沉重灾难。

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市人民，为战胜洪水和旱涝灾害，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地开发水土资源。根治河流，改造涝洼，修渠引黄，打井浇地，平整土地，划方种植，聊城大地的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逐年改观。特别是七十年代引黄灌溉以来，配合机井开发地下水源，全市农田实现了水利丰产，变成了鱼米之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对土地做到精耕细作，吨粮田成方连片。今天进入大田瞭望，可以看到排灌沟渠纵横交错，乡村道路四通八达，道路两旁林木成行，村庄周围花果飘香，过去那种七高八低荒凉破碎的自然地貌一去不复返。纵观聊城沧海桑田的变迁，感慨万端，赋诗数首，以抒情怀。

(一)

一亿三千万年前，
鲁西沉落海水间。
黄河倾泻孟津口，
东流冲积为平原。

(二)

黄河穿聊千余年，
七次摆动人遭难。
吞没庄田万家寨，
水漫古城曾三迁。

(三)

华夏春雷震心弦，
人民群众点江山。
四十春秋转眼过，
聊城古今换人间。

(四)

大地遍洒英雄汗，
鞠躬尽瘁苦也甜。
凤城湖畔奏凯歌，
东昌辉煌谱新篇。

参考资料：《水经》、《黄河水利史述要》、《821 勘探队钻探资料》。

任克溥弹劾科场舞弊案

马毓山 高月增

任克溥（1614—1703年），字海眉，一字东阳，别号逊彭，东郡平山卫（山东省聊城市）人。出身宦宦家庭，清顺治丁亥己丑科进士，历任河南南阳府推官、吏科刑科给事中、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御史、刑部侍郎、光禄寺大夫、大司寇、刑部尚书等职。他为官一生，多有劾奏。其中，他揭举顺治丁酉文场舞弊一案，即可见其直言敢谏的精神。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顺天府乡试，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邳是此次乡试的房考官。此人进士出身，浮薄轻狂，欲乘机攀附权贵，树立党援，索贿受贿，中饱私囊。他在闱外所通关节二十五人，与诸房官交互翻索闱卷，乱不成体，然后让他的随身奚童传泄机密，结果所传秘纸被李振邳的同伴冯元夺去，作为把柄，以此要挟。事后李振邳以此为能，经常向人夸说某某人本不通文墨，而因我的人情得中副车（科举时代乡试的副榜贡生），某某人我极力推荐，但因某某阻隔，未能奏效。如此指名道姓，肆无忌惮，殊不知恨之者亦与日俱增。先是李振邳与张汉过往甚密。张汉景况萧条，依居李振邳；又因李振邳分管此次乡试考核，欲借助其力侥幸得中。李振邳也因张汉交际颇广，欲借助其力招摇索贿。这样，各怀鬼胎，狼狈为奸，遂成忘形之交。但后来，张汉

瞒着李振邨追富攀豪，改换门庭，于是二人失欢。李振邨恼羞成怒，利用职权，故意将张汉的试卷涂抹摒弃，使之下第。张汉由此衔恨。又有浙江嘉善人蒋文卓与房官张我朴素有隔阂，而另一房官郭潜得人暗中贿赂去劝说张我朴向主考官推蒋廷彦的试卷。张我朴说蒋文卓认为此人不通文墨，荐之必遭物议，因此拒绝。蒋廷彦因此衔恨文卓。还有杭州贡生张绣虎，惯为诈索，这次借张汉、蒋文卓之事，诈得李振邨、张我朴二房考官白银一千二百两。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此张扬，岂有不透风的？

不久，吏科给事中陆貽吉闻讯对任克溥说：“张汉与蒋文卓将揭今岁科场，牵连涉及吾名，吾将自疏检举，但因事未果。”于是顺治丁酉文场舞弊案东窗事发，且牵连多官，这时担任刑科给事中的任克溥疏奏：“北闱放榜后，啧有烦言，其弊不止一端。试官李振邨、张我朴通同系科臣陆貽吉为居间事，已彰明较著。九月十一日，臣（任克溥）方来端门前，遇陆貽吉，见其张惶失措，谓有捏名讦款欲换举人。迄今半月余，仍不果其非，虚枉可知，臣因受贿有过付，有人出银，有人就讦款，究诘诸弊自知盘托矣。”皇帝览奏，命都察院严行查究。

该年十月十六日，任克溥具疏又奏：“北闱放榜后，途谣巷议，啧有烦言。闻中试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貽吉送考官李振邨、张我朴得中。北闱之弊不止一事，乞群臣会讯。”朝廷得奏，命将涉嫌犯人传至都察院会审。结果，所奏属实。

十月二十七日传旨：“贪赃坏法，屡有严谕禁饬。科场为举士大典，关系最重，况辇毂重地，系各省观瞻，岂可恣意贪墨行私。所审受贿过付，种种情实，目无三尺，若不重加处治，何以惩戒来兹。李振邨、张我朴、蔡元禧、陆貽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主考官曹本荣、宋之绳因失察交部处，降五级调用。”

李振邨等七人正法后，即榜各省逮系七家老幼，籍没资产，流

徙出关的共一百零八人。其余各犯，如张天植父子、孙伯龄父子、郁之章父子、学士诸震、张汉之兄中书张嘉、张徇、光禄李债，有关节之人如常熟赵某、湖州二沈、二闵，皆次第就逮。冯元出示所藏李振邨在闱中用蓝笔亲书二十五关节人名，口供供出的八公子及已考中的于公卿之子等等，都恐惧万分，惶惶不可终日。当此续审各犯，未有定罪时，十一月上谕礼部云：“今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邨、举人田昶等贿赂关节，已审正法。其余中试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弊？”上允再次复试。

顺治十五年正月十五日，任克溥出任会试同考官。此时诸举人已多归故里。故礼部苛责府县，将各参试举人拘执锁项，传京复试。府县即奉命将他们押送起解，日夜兼程，人人震恐，如同隶囚。而会朝复试未有期限，诸举人只得与诸保杂役僦寓于破寺废观、颓垣倒屋之间。那时颓垣倒屋内，爨烟如磷。举人们流离冻馁，面如死灰，然而执卷呻吟，恐以曳白，丧命斧钺。命不暇顾，安望闾捷？此情此景斯文扫地，可怜亦复可笑。国家体统无不残损，自谓无威严重，此二百举人不知何时登鬼录矣！

考期既临，诸举人集于太和门复试。因前考舞弊，故于此次皇上亲行典试。而且复试举人身旁都有一满兵持刀站立，如临大敌。这样，前有御驾，后有刀兵，语言不通，如坐针毡，天旋地转，雷霆顿击，战战慄慄，久久不能下笔。复试不久，发榜了，结果，在允许会试的一百八十二名举人中，苏洪濬、张元生、时汝身、霍京、尤守文、张国器、周根邵等八名因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同时立即查究礼部司官的责任。举人董笃行、鱼飞汉、柯耸及监试御史等亦下狱治罪。房官郭潜于十二月病死于刑部狱中，此案牵延半载。

第二年，即顺治十六年四月，忽传拿各犯，再由清世祖孝章皇帝顺治御殿亲审。个个诚惶诚恐，屏气止息。独有张天植一犯力辩不屈，说：“吾儿子已得荫生，不必中式；尚且能文，可以面

试。”审时，对张天植用刑。世祖竖一指，遂夹一足，至夹双足，仍坚不承认。审问完毕，遂将各犯拿送法司，于长安街每人重责四十板，候旨发落。翌日传旨：“科场取士，原为遴选真才以备任使。关系最重，岂容作弊坏法。王树德等串通李振邨等贿赂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不久，法司拟奏：“王树德、陆庆曾、潘引如、唐彦曦、沈始然、孙阳、张天植、张洵立斩，家产籍没，妻子兄弟流徙尚阳堡。孙柏龄、郁之章、李债、陈经在、邱衡、赵瑞南、唐元迪、潘时开、盛树鸿、徐文龙、李学诗俱立斩，家产籍没。孙芸茁、郁乔、李苏霖、张绣虎俱立绞，余赞同，应绞，秋决。”

又因人命至重，恐其或有冤情，皇帝御览法司拟奏，特命提将各犯亲行面问。其中，王犯树德口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法惩治。但念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余议发落。董笃行本当重处，但也供认不讳，着以渎职免罪，官复原职。曹本荣亦免议。遂传旨：“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皆当恪遵功命。通改积习，持廉秉公。不得此案宽典，遂为常例，妄存幸免之心。如再犯此等罪者，必不宽宥。”这样，多犯遂免一死，改为流徙，接着摧提各犯起解。至此，腾噪众口顺治丁酉顺天科场舞弊一案方告终结。

科场舞弊，是古已有之的，因为这是整个封建吏制黑暗腐败的必然结果。只是牵涉闹官如此之多，治罪如此之烈，却为史载所稀见。顺治皇帝亲行究问，整饬科场，对于巩固满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不失为英明之举。任克溥具书奏闻，固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但其弹劾邪恶，不顾安危的勇敢精神，足可羞煞朝中明哲保身的哀哀多官。他不仅使当时呼号无门的读书人抒一腔之愤，而且使千秋万代的谔谔之士交口称快。这就是直到今天，人们，特别是聊城人，还把任克溥的不少逸事传为美谈的原因。

任克溥奏疏

马毓山 张道英

任克溥是我们聊城人，在清顺治、康熙朝做过多年的京官。此人忠正良直，疾恶如仇，多所讽谏；又勤于政务，关心民谟，屡有陈规，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好官。我们根据任氏族谱及诸多清朝早期的历史文献，整理出其有代表性的奏疏十篇，以资研讨。

(一)

顺治十三年十月，壬辰，授任克溥为吏科给事中，十一月疏言：

皇上励精图治，深知新民之官莫过守命，特于天下知府之中择其繁据难治者三十府，许三品以上各举一人，破格任用。使保举得当，一人贤则一隅安；人人贤，则各省安，太平何难立致？乃为未久，贪庸刻罢者已有数人，是前此保举不能仰体圣意秉公慎选也。乞敕部察明惩处，以励官方。从之。（《国史馆本传》）

(二)

同月，又疏言：

仓场侍郎总司总运。不论正兑改兑，京仓通仓，务使随到随

起，前邦无停泊之苦，后致无守候之虞，一切需索陋规尽杜绝，回空遄发，不致冻阻中途有误清兑。入岁七月中，漕艘抵壅滞河干，遇水陡发，有浸湿漂没者。皇上另遣专官驰赴通州，始设法收支竣事。试闾仓场侍郎李呈祥所居何职？坐视稽迟同官范达礼见奉旨另议。李呈祥问穴无能何以自解？乞敕部严行处分。疏下，李呈祥回奏，议处如例。（《国史馆本传》）

（三）

顺治十五年二月，任克溥充会同考官，四月疏言：

臣自分校出闾，伏读上谕各衙门条奏兴利除弊事。仰见皇上求言若渴，当必有谏论讦谟连章而进。乃时近两月，见宗人府一疏。其各衙门，如铨选人才，抚恤师旅，钱谷之盈缩，刑名之平反，皆利弊兴革不容顷刻缓视者。有迟疑望窍，谓病一二，则因循既久；发论方新，无以赎往日旷宦之罪，则瞻望多端。指陈无隐，恐无以留后来迁就之门。夫臣子报国，止有一腔朴忠，遇事直吐。才著转念，便持端势，必摭拾琐屑，剿说雷同。不能慷慨论列于目前，又安望设至行于异日。乞天语严饬诸臣，以实心求实政，不得浮泛塞责，监别其当否，示以劝惩。上允。（《国史馆本传》）

（四）

五日疏言：

近以各衙门胥役犯科者多，诏臣工悉心计议指摘弊端，怀然破狐鼠之瞻矣。臣以为惩之于作弊之后，不若杜绝之于作弊之先。如吏部选司推升原有定序，然有因事亭升者，遂有越次而升者。人不知其故，往往开打点调停之说，随其术申。请敕部，嗣衙应升

各官悬榜部门，序列姓名，详注资俸，荐纪参罚，使其见其闻，功司仪处条例，亦画一颁行，使不得凭随臆轻重借端增减。至各官开缺以科钞为凭。自无所容其操纵矣。上以所奏多切时弊下部议。

(五)

大清世祖顺治十五年六月，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奏言：浙江财赋半天下，屡年积欠甚多。今特遣专官督理，法诚善矣。臣思繁剧大县，偶遇年老之人，一见数万钱粮册籍，目炫心摇，岂能催征得法。请敕督抚按，将欠粮有司严加考核，有老迈罢软者，报部开缺。将甲科历俸二年以上声望素著者，调补。三年内，能将本任钱粮全完，而从前补欠，一一查明款项造册达部，死亡逃跑者，请旨定夺。如此，方为经济有用之才，立予超擢。即有小过，量加宽宥。如三年内未能全完，亦不妨宽期观成。庶人人鼓励，而国课自清矣。然有司通课，实有三难。一曰弥缝之难。有司十分精神，三分办政事，七分奉上司。迎送，细节也，有因失而辱者矣。参谒，屡禁也，有渐远而慢者矣。馈送，严饬也。有以造清册，申报蕃司抚按，择欠数最多者，委廉干官员，亲诣地方，逐里逐图，按册而对。如此，则民欠不敢妄报，而实征之数乃真，侵渔之弊无自出矣。且衙蠹之恶，莫甚于侵渔钱粮。以后凡遇此等，审明申请，立行正法，查产入官。彼之侵课，无非为身家计；今身家不保，未有不废然思反者矣。总之，悬异赏以待良吏，立严法以惩蠹胥，而课不清者臣未之敢信也。下所司议。

(六)

顺治十五年九月，任克溥转礼科都给事中，九月疏言：
士子为四民之首，习向之邪正攸关督学。系多士之型，风化

之纲维大。我皇上慎重督学之选，预选者自不敢因仍积习，罔上行私。然亦有督抚爪牙驻防爵弁，恃要路之函封，假公文以密递。在此辈盈其囊橐，致孤寒鲜列黉官。请敕学臣：凡有请托私书讐，揭送部科，异日差满即当此定为上考。并令博访胶庠学行著闻之士，举优以示风励，惩劣最重抗粮士为齐民表率，今不急公输赋，他日之贪赃坏法。可知亟当严黜，以登士习而正士心。

(七)

皇清顺治十五年，任克溥任训科左给事中，鞠南闈（江南）考场之弊。

戊戌冬十月，甲子，辛酉，刑部鞠实江南乡试作弊一案：正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铖等，俱革去举人职。疏入，得旨：方犹、钱开宗，差出典试，经朕面谕，务令简拔真才，严绝弊实。辄敢违朕面谕，纳贿作弊，大为可恶。如此背旨之人，若不重加惩治，何以儆戒将来。方犹、钱开宗，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霜、张晋、刘延贵、田俊民、郝怀训、商显仁、李祥光、银文灿、雷振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菴、王国祯、龚勋，俱著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著籍没入官。方章铖、张明荐、伍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兆騫、钱威，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延佐、元得时等，连行严缉获解；如不缉获，即伊等受贿作弊是实。尔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且将此重情问拟甚轻。是意见，著作速回奏，余如议。

(八)

顺治十七年四月迁太常寺少卿，十八年五月丁父忧，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年六月补原官。

康熙六年六月应诏言：

朝廷欲薄赋，有司反加赋；欲省刑，有司反滥刑，皆由督抚不得其人。见今奉旨令部院纠察督抚，如部院肯纠极贪大恶之督抚一人，天下之为督抚者知警；肯纠极贪大恶之司道一人，天下之为司道者知警。司道廉洁则有司不苦于求，自觉宽然有余地，坐见轻徭薄赋、政简刑清矣。疏下所司通饬行。

(九)

康熙八年六月，应诏陈民生疾苦言：

小民莫疾于加派苦于火耗，已奉敕谕严禁矣。此外疾苦尚有数端。有司派殷实之家催粮，其粮单中多列逃亡。绝户无惩催具有，粮册无名按时追，比致倾家包赔者。邮传供应，原有钱粮，每侵入私囊，贪报百姓养马应夫。或充里长，凡上司经临，过客往来，舟车饮食，责令设备。甚至上司差人蜂拥宣闹，初到送公馆，起身索路费，中人之产破折一空。复有教唆词讼之辈，罗织无辜，经年牵累。黄河漕河，籍附近百姓以应役，衣敝履决，力尽筋疲，而工食或至中饱；浅夫闸夫卖富差贫，一名而更换至数十名，衙役吓骗，百姓受累无穷。请谕各督抚，饬属清厘赋役，禁革浸渔，登报诸弊，严惩讼棍蠹胥，庶几民得安生。疏下部议，如所请，申明禁令，得旨严饬遵行。

又谕曰：

河工原有额设钱粮，近闻沿河居民因河工苦累之极。此皆地

方大小官员不念人民难苦，纵役侵刻虐害所致。若督抚实心料理事务，则贪官蠹役安得吓骗虐害？以后有此等情弊发觉，从重治罪，决不宽贷。

(十)

康熙九年九月，迁任克溥右通政，十年五月转左
十一年四月疏言：

臣前见嘉鱼知县李世锡首告湖广巡抚林天擎索银情状，不厌不已，且不留一毫形迹。以此知馈遗不绝，苞苴尚行。良士难庆弹冠，墨吏何尝解受。较之世祖章皇帝时，有司绝不与督抚送礼，绝不轻至省会者。风气迥殊，皆由督抚受命之初，群以送裘马弓矢等物为仪文，已亦饰美观瞻，竞趋奢侈，一时之费，辄至累万。赴任后，用意搜为报答，取偿之地遂至苛索属员，貽累百姓。欲为拨本塞原计，请敕督抚赴任之先屏绝馈送，勿铺张行色，务从节俭，以养其兼。又督抚之参罚科条甚密，在内部院亦当体恤艰难烦重之势，依例处分毋过为吹索。俾得展手足，专心吏治民生，而无旁顾之忧。部院不苟求督抚，督抚不苟求有司，有司亦自不借口供应上司苦累百姓矣。疏亦下部议，申严禁令。

罢官以后

康熙十八年三月，京察以才力不及。有刘姓狂言曰：白莲教将以东郡（东昌府）作乱，来部自告，或欲上疏请剿。克溥徐言曰：彼疯人也，吾识之久矣。事遂寝。己未，京察落职降调。得旨：所议尚未允，当今再议。改注不谨革职。遂罢归。闭门课子，筑绮园于北坝。又筑敦睦堂，兄弟皆耄耋，侄亦有高年者，宴聚一堂。康熙三十八年，圣驾阅河南，蹕东昌。任克溥迎驾临清，复

原銜。康熙四十二年，圣驾巡南重阅河工，还蹕东昌。临幸其“绮园”，赐“松桂堂”匾额及对联。

上联曰：“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

下联曰：“绿水本无忧因风皱面。”

谕阁臣：原任侍郎任克溥，于途次迎驾，见期年九十岁健在，诸臣未有如其久者。

为眷念，加刑部尚书銜。是年八月卒于家。

赐葬如例。（《国史馆本传》）

贡士与贡生不是一回事

许 继 善

孙元芳先生在《聊城教育史略》中，介绍了晚清的教育，对于今人认识封建的教育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讲科举制度时，说“经会试取中者称贡士，也称贡生。贡士的名目有岁贡、选贡、恩贡、拔贡等十多种，当了贡士可参加殿试了。”这里把贡士与贡生混淆了。实际上，贡士与贡生不是一回事，而且功名等次相差很远。

贡士，是由国家最高一级考试产生，而暂时使用的一个名衔或称谓。封建社会考取功名，最高也是最后的考试是考取进士。考中进士，朝廷就录用封官，最低的也封七品官。考取进士要分会试、复试、殿试三场考试。会试由朝廷决定的考官们监督考试、阅卷改卷、决定录取等，录取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紧接着是复试，由原主考官和礼部主办。一是通过复试淘汰在会试中弄假作弊不及格者，但一般不会有落第的；一是分出一甲、二甲、三甲的名次，为殿试决定名次作好准备。复试以后是殿试，即皇帝亲策于廷。殿试以后，进士名单和名次由皇帝决定下来。一甲三名，头名称状元，二名称榜眼，三名称探花，但统称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一般十名上下，也有几十名，甚至近百名的时候），总的是看这一年录取进士的总数。录取二甲的称赐进士出身，头名称传胪；其余录取进士的统为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复试和

殿试落榜者极为稀少（但会试取不上贡士资格，不能进入复试和殿试，当然就与做官无份了）。但通过复试、殿试录取后，统称进士，谁也不再称贡士了。所以，用现代语言说，会试考取贡士，只是中央一级考取进士和新用官员的一个程序或步骤。当然殿试中，皇帝亲自提问考试的是很少数的，一般策问下一甲的三名，最后翻检一下考官送呈的名单，用朱红笔在第一名的名字上点个点，就是一般所说的“钦点头名状元”了。

贡生，则是封建国家最初级的考试场中产生的。隋唐以来，逐渐废除门第举荐取士制度；形成考试进士制度，历朝历代，特别到明清形成惯例，府试取秀才，乡试取举人，会试取进士。只有取得了秀才资格，才能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只有取得了举人的资格，才能参加会试考取进士。贡生，分为岁贡、优贡、副贡、恩贡、拔贡等名堂，是考举人不中，在秀才中选拔优秀的。因为贡生名称不一样，产生的方式和场合也不尽相同。岁贡是由各县廪生（享受国家补贴的秀才）中，依年资选送，生员多的每县一名，次多的三年两名。优贡三年录一次，由各县保送优等秀才前去应考，小省取二名，大省取六名（这个数字，都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数，各朝各代是不一样的）。副贡生即在乡试时，举人名额已满，挑选一些参考秀才另榜录取，称副榜贡生。恩贡则是皇帝或朝廷特别恩赐的。贡生中，拔贡最难，12年选拔一次，每县一名，所以贡生中拔贡最荣耀，社会上受人尊重。但哪一种贡生都没有资格参加进士的考试，要参加进士的考试，还要先考举人。说书唱戏每有“进京的举子”这句常语，“举子”即“举人”。没有举人资格不能进京赴会试。

这就非常明白，不论哪一种贡生，仅仅是比秀才荣耀一些的“秀才”，连参加考贡士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贡生就是贡士了。贡士是即将成为进士的一种称号，贡生对贡士是望尘莫及的。

当然，这里不是全面介绍封建取士的考试制度和章典，而是

谨就贡士与贡生区别有关的简略说了一点。有的是孙元芳先生提到的，这里重复了一下，觉得不复述说不清楚某个问题，也许有应当多说的未说出来。

窦建德大败宇文化及于聊城

阎 增 山

隋朝末年，炀帝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再加上征敛苛虐，剥削残酷，兵役繁重，终于激起了人民的武装反抗，并很快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起义高潮。义军遍布全国各地，镇压地主阶级，歼灭隋军主力，使隋朝统治土崩瓦解。其中公元619年窦建德在聊城擒杀宇文化及，便是隋末农民起义军扫除隋朝统治残渣余孽的一次光辉战斗。

宇文化及，隋代武川（今属内蒙古）人，官右屯卫将军，为炀帝禁卫军统帅之一。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炀帝逃到江都（今江苏扬州）。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乘江都粮食吃光，卫兵纷纷叛逃之机，发动兵变，勒死炀帝，自称大丞相，总管百事，占有六宫。遂率十余万人马，夺取江都人的船只，浩浩荡荡地向北进发。四月，到达彭城（今江苏徐州），水路不通，又抢夺民间牛车两千辆，装载官人和珍宝。六月，到达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为李密和徐世勣所败，损失惨重，于是掉头向北奔向魏县（今河北魏县）。

这时，大贵族李渊已乘机占领长安，建立唐朝，改元武德。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正月，唐淮安王李神通率兵到魏县攻打宇文化及。宇文化及抵挡不住，弃城而逃，向东跑到聊城。神通攻占魏县后，又马不停蹄地追赶宇文化及到聊城，并把他团团包围。

窦建德闻讯，也率兵奔向聊城。

窦建德，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农民出身，曾为里长和二百人长。因助孙安祖起义，家属遭杀害，遂率部起义，投高鸡泊（今河北故城西南）起义军首领高士达。高士达牺牲后，他继任领袖，称将军拥众十余万。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于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河间（今属河北）之战，歼灭隋将薛世雄部三万余人，声势大振，随即攻下河北大部郡县。次年（公元618年）称夏王，建都乐寿，国号夏。

窦建德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生活俭朴，甚受人民的爱戴，因此其势力发展很快。李渊在长安登上皇帝的宝座后，便开始镇压各地的起义军以统一天下。窦建德便一面与隋军残余作战，一面自称隋民，大量启用隋朝官吏，与唐军对垒。当他听说宇文化及逃到聊城时，便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是隋朝百姓，隋王是我们的君主；如今宇文化及杀君叛逆，是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不讨伐他！”窦建德以此为号召，激励士卒，率兵直奔聊城。

宇文化及孤军困守聊城，难以抵敌李神通的强大攻势，于是用奇珍异宝引诱各路起义军。义军首领王薄率众人顺从他，引兵来援，与他共守聊城。

淮安王神通把聊城围得水泄不通，日夜攻打。宇文化及粮食吃光，走投无路，不得已，请求投降。神通认为宇文化及已成瓮中之鳖，没有答应。安抚副使崔世干劝神通接受宇文化及的投降，神通说：“军士暴露野外已非一日，反贼粮食吃光没了办法，旦暮之间即可攻克，我们应当攻取以显国威，并且分发他的金银玉帛来慰劳将士。如果接受他们的投降，将用什么来做军赏呢？”世干说：“如今窦建德即将到来，如果宇文化及未能平定，内外受敌，我军必败。不攻而自破，建功极易。为什么贪图财物而不接受他的投降呢？”神通听后大怒，把崔世干囚禁在军中。

不久，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从济北送来粮食，使宇文化

及看到一线生机，军威稍振。于是又跟神通对峙作战，固守城池。神通督兵日夜攻打，贝州（今河北清河）刺史赵君德攀援城上女墙，首先登上城头。神通心怀嫉妒，怕他取得头功，遂鸣金收兵，不再交战。君德独据城头，孤掌难鸣，不敢冲入城中，于是大骂神通而下，没能攻克。

窦建德军步步逼近聊城。神通自知不是建德对手，又恐里外夹攻，难以对付，只好率兵退走。

窦建德在聊城附近扎下营寨，天天派兵出击，在城周围与宇文化及连续交战。宇文化及抵敌不住，被打得落花流水，无奈，退到城内，四门紧闭。窦建德率兵把聊城团团围住，从四面纵横撞车抛石，机巧绝妙，日夜攻打。宇文化及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眼看城池不保。王薄打开城门，迎接窦建德军进城。

窦建德进入聊城，活捉宇文化及，收取传国玉玺和皇帝皇后仪仗，逮捕宇文化及家人。接着出榜安民，安抚随行百官，把宇文化及之弟等人推出，面对隋朝百官而斩之，悬首军门外示众。又把数千宫人，应时放散，各遣回家。得隋文武官员及卫兵、军士一万余人，也都放散，听凭他们自去。然后用槛车载了宇文化及和他的两个儿子，凯旋班师而回，走到襄国（今河北邢台），就把他们杀了。

窦建德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同其他义军一起，摧毁了隋王朝的统治，而他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在后来唐王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兵败被俘，被杀于长安，成了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牺牲品。但这次农民大起义，却有力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特别是窦建德在占领河北期间，对农民颇多惠政，所以魏州（今河南安阳）人民曾建有夏王庙纪念他。

（朱淑惠 整理）

杨以增族人墓地与毁坏经过

田 绍 润

海源阁藏书楼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创始人杨以增作为聊城历史上的一位名人也家喻户晓。很多参观海源阁的游人刨根问底，杨以增的墓地在哪里？本文仅就此赘笔，以飨读者。

（一）

杨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清乾隆五十九年生于聊城。道光二年进士，初任贵州荔波县知县，又任兴义府、贵州府知府、湖北安襄郢荆道、河南开归陈许道、陕西布政使。道光二十六年，由林则徐举荐，接林任陕甘总督，道光二十八年，授江南河道总督。咸丰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杨以增与族人的墓地，位于聊城西南十五公里的田庄西一里许。这里地势高亢，土地肥沃，不碱不沙，自古有“聊城八百单二庄，数了袁楼数胡（金）堂”之谣。意思是说，这里是聊城的地心，最好的土地当数这里。杨氏的墓地，就座落在袁、胡两自然村与田庄村之间。

杨氏为何选这里作墓地呢？除了以上所述地势高，土质好以外，还有其风水典故。

在几百年前，有一江南蛮子（俗称看风水的），被附近村上的

人请来选林地。江南蛮子选中了田庄村西这块宝地，说这里是生龙长凤之地，墓葬后其后人会出受皇朝恩宠、官至极品。但也有缺点，就是“有官没人”，意思是后代人烟不兴旺，再就是二百年后“种金瓜，墓被扒”。当然，这是江南蛮子的隐语。

请江南蛮子选林地的人，忌讳“人烟不旺”，就舍此另选了林地。事过几十年后，在聊城城内居住的杨家，也就是杨以增的祖父、父亲，也派人在城外四邻八乡选墓地，结果选在了这里。

后来杨家的历史，还让江南蛮子说中了。其一，杨以增果然做了布政使、江南河道总督、追赠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子杨绍谷、杨绍和、其孙杨保彝，也都官至二品、三品。其二，从杨以增开始，其后代确实是人丁不旺。其三，一百多年后，杨氏的墓地里果然种上了金瓜，这是建国初，刚翻身的农民在这里种的。事隔十四、五年，“文革”兴起，杨氏林地墓群被砸，其坟冢被扒。江南蛮子选林地的故事和他讲的隐语，至今还在附近村上流传。

(二)

杨以增及族人的墓地，当地人称“杨家林”。

杨家林，座西朝东，包括墓葬地、林道牌坊、护林住所。杨家林占地大约有二百余亩，林地周围是柏树、杨树。建国前，林地周围的柏、杨树，达合抱粗，有的甚至三、四个人才围抱过来。林西、南、北，是杨家购买的大片土地，达十八公顷，外人送号“杨十八顷”，这些地租给附近村上的佃户耕种。

杨家林方圆几百亩内，杨、柏树参天，远远望去，恰似一片林区。林地派有专职护林人看守，不许周围村人进入，以至于后来林地上积累的树枝树叶达数尺之厚。

杨家林的林道宽约二十五米，从林门到墓地约有二百米，林

道两侧是对称而立的石牌坊。

林门两侧，相对矗立着两丈多高的“华表”。两人合抱粗的石柱上各盘缠着两条戏珠的龙，龙鳞、龙爪、龙头、龙尾，雕功精湛，其上各蹲坐着两只望天的猴子。

进入林门向里（西），两旁依次是石羊、石猪南北相对而立，其形状与真羊、猪酷似。

再向里（西），则是两匹尺寸如真马相仿的高大的石战马。石战马上的鞍镫、辔头雕刻精细，连鞍子上的毯状花纹都很分明。春、冬季时，偷偷跑入林内的孩子，有的蹬着鞍镫上去骑马，有的则蹬着马尾（尾巴与后臀部相连处有空）上去玩耍。

沿着林道继续向里（西），两侧相对蹲立着一米见方的大石桃，这个石雕有夸张的意思。再向里走，则是相对挺立的两对翁仲，高约三米，孩童们称其为黑大汉和白大汉。

再往里是并行而立的四座龟驮石碑。一侧有两幢，碑帽上雕刻着盘缠的龙，碑上刻着碑文，其内容是“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河道总督杨公神道碑”。

沿林道再行五、六十米，就到了杨氏的墓葬地。

墓前，正冲林道处，有一高宽各一米半、长两米半的大石桌，这自然是族人供奉、祭祀时的用物。

在每个墓前，各立着碑，碑上刻着各自的墓志铭。其中，至少有三、四幢碑上有盘龙透雕的碑帽，显示着墓主人生前的功名以及与皇家关系。这大概是杨以增、杨绍乐、杨绍和、杨保彝祖孙三代的墓，也符合他们的身份。

正冲林道的坟冢较大，有十米见方，高四、五米。另外的三、四个略小一些，其余的则更小。

笔者曾到过安阳袁林，袁世凯虽然当过短暂的洪宪皇帝，但其袁林的牌坊碑刻，与杨家林相比，却逊色很多。如前面所述的两匹石战马，分别踏在一块大青石板上，石马与石板是一块石料，

那马形象逼真，鬃、蹄、尾活灵活现；林门的华表、石柱上的两条盘绕的龙，既刻得细也刻得深，拉倒毁坏前，有些大人就可用手扒住龙体龙爪爬上望天猴；再就是杨家林的石牌坊石料，均是一色的藏青石。整个杨家林石牌坊、碑刻、碑帽盘龙透雕，堪称一代艺术之宝。

(三)

杨氏坟墓和林道牌坊，在“文革”初期被毁掉。

一九六六年初秋的一天下午，从聊城专署去了几辆满载破四旧先锋战士的汽车。当时的杨家林，已不是柏、杨树环抱，而是被建国初栽植的苹果树代替，隶属地区农林局管理。当时正值苹果压弯枝头的时节。

从聊城去的破四旧的人，将车开到果园东面的西新河（建国后挖的）河堤上，下车后一拥而进杨家林果园，将所有牌坊、墓碑一拉而倒，完成了破四旧的壮举。从此，开始了一代石雕石刻艺术的浩劫。

此后，附近村上有用石头的，就用牛拉着石砘子去运，或垫路，或修坑嘴。当时正值社会秩序混乱，竟也无人问津。

“文革”开始不久，杨家林所在的果园苗圃被军分区接管。大约在六八年冬天，聊莘公路至果园苗圃的柏油路开始修筑，杨家林内这些横倒竖歪的碑碣大有用场了。驻军用炸药将大石碑、大碑碣炸得能以搬动了，就集中码在了一起，足有几百见方。后来，这些碣文，就成为柏油路的石子了。

聊城专署破四旧的车队完成拉碑任务后驱车回返，途中，还不时地在道路两旁张贴标语。在田庄村最西头一墙壁上，就贴上了“彻底砸烂杨家坟”的标语。在田庄村内，还留下了改田庄村为“反封村”的告示。

这“砸烂杨家坟”的标语，被一个带着一群小学生到地里割草、搞勤工俭学的女教师发现。在回学校的路上，学生和老师议论着：聊城来的车队今天拉倒了杨家林的牌坊，还要扒杨家林的坟呢，你看那标语不是写得很清楚嘛。

回到学校，这位女教师就将“聊城还会来人扒坟”的信息告诉了校长，校长立即去报告了村干部。

村干部想：拉倒杨家林的牌坊，扒杨家坟，这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积极行动，我们岂能落后。村干部顾不得吃晚饭，便立即去公社向领导请示汇报。

村干部从公社回到村上，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这天晚上正是月亮高照，村干部立即集合全村民兵和五年级的学生，带着铁锹，连夜开始了“砸烂杨家坟”的破四旧行动。

第二天早晨，扒坟的队伍又扩大，连二、三年级的学生也去了。这天上午，参加扒坟的、四外八乡看扒坟的人急骤增多。杨家林本身就是一座果园，坟墓就座落在果园内。这时，红苹果枝头累累，为了防止苹果被人偷摘，学校又临时安排，低年级的学生每人蹲在一棵果树下看苹果，扒坟的任务由民兵来干。

又经过一个上午的工作，坟墓终于被扒开了。靠北（右）面的这个墓已被盗过，在棺槨前面，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孔，这个墓埋得距地面较浅。

靠林道正中的大墓，埋得较深，离地面足有十几米。外是槨，内是棺，棺槨之间有很多的水，据说是药水，是保护棺槨内的尸体不腐烂的。就这棺槨的打开，也是费了很大劲的，身强体壮的民兵，用大油锤砸槨外的好似水泥的保护层。

这个大墓的棺被打开，绫罗绸缎内盖着一年青的女尸，皮肤如生前一样白晰，引得四周的人纷纷观看。那棺槨内的男主人，没有印象了。

当时的人，因没有考古常识，竟异想天开地准备搞一下女尸

展览。结果时间只有十几分钟，那女尸就枯萎、变黑、收缩腐烂了，后被民兵埋到一棵果树下。

砸烂杨家坟这一破四旧的战果，也确实够辉煌的。出土的有金银镯子、金银手饰、玉佩、玉带以及各式的闹钟、座钟、灯等陪葬品。那形状不一的钟表还被人长时间地放在学生的教室里。

扒出的绫罗绸缎，被弄到运河里，让女民兵去洗。那棺槨都是上好的松木，后来制作了很多学生的桌凳。

(四)

海源阁藏书楼主要创始人杨以增及其族人墓地的被挖经过，现在想来，令人可笑。其杨氏林道牌坊的毁坏，尤令人遗憾可惜。如果杨家林还在的话，与目前新修复的海源阁藏书楼，成为遥相呼应，相得益彰的旅游景点，是完全可能的。

(裴蓉 整理)

关于杨以增一篇佚文的发现

马 明 琴

海源阁主人杨以增（1787—1856），不仅是个藏书家，也是一个著名的刻书家。除了刻有著名的《海源阁丛书》外，还刻有其它书多种。他“毕生邃于经学，服膺北海”。然则，杨以增的学术著作却很少流传。除了在《聊城县志》和《海源阁藏书》中见到他的部分文字外，其它则难以寻觅。

1989年秋天，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于洪找我查一个清代张姓的进士名字。因为这个张进士的名字很古怪，查遍了所有的字书，都没有解决问题。根据于洪同学的介绍，我查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结果确有张进士的那个名字，只是不知其读何音。我问，这个进士是哪里人，于洪同学告知我是原山东省清平县属马厂张姓家族的人，并说该族家谱上有杨以增写的序。我听了如获至宝，因为我是研究海源阁藏书的。所以，我请于洪同学把杨以增写的序抄来我看。不几天，我终于看到了杨以增的佚文——《续修张氏族谱序》。

杨以增《续修张氏族谱序》，虽然不是标举正名的学术著作，但它言简义明、文思清晰，概述了我国族谱学的基本理论和张氏族谱的原始及现状，体现了杨以增渊博的学识和精熟的文采，是一篇少有的史论合璧之佳作。读之，令人赞叹不已。篇尾署“道光二十有一年（1841）岁在辛丑三月上浣 赐进士出身 诰授中宪大夫湖北安襄郢荆道署按察史聊摄杨以增撰”。这是杨以增丁父

忧家居时所写，其间他建起了藏书楼海源阁。在家守孝道的时间较长，少不了邻里乡亲、同学、朋友慕名而来，求他文笔。而他也乐于奉呈，甚至他弟弟的同学、“清平严峰张君讳峻岭……因续修谱属序于余”也不推辞，所以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他这篇不能多得的遗文。为使读者共赏其文，特将原文抄件附录文后，以广流传。

附：续修张氏族谱序

昔归太仆云：古者诸侯世国，大夫世家，故世族之传不乱，子孙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诸侯相侵，暴国亡族，散已不可稽者。汉司马子长，搜集遗文古书，仅见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其后如官谱世族篇稍稍间之，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世族始重，迄五季之乱谱牒后散。然自魏以来，故家大族，盖数百年传系不绝，可谓盛矣。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犹为不远于古也。今世谱学废，虽当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孙不知书，迷其所出，往往有之，以谱之亡也。孰知故家大族实有与国相维持者，系同俗世道之隆污所不可重也，况孝子仁人木本水源之思乎！清平严峰张君讳峻岭，考与余弟同学萝峰邓先生之门，因续修谱属序于余。余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为弓正，始制弓矢，赐姓张氏。周宣王时，有卿士张仲，其裔也。自时厥后，代有远人。前明洪、永间，有以屯官自莱阳迁清平者，遂为马厂著姓，家世耕读，科第相承。谱之作，初成于皇朝顺治十二年末，越雍正癸卯、乾隆乙酉、嘉庆乙丑，历次兴修，绵延勿替。计乙丑至今又三十五年，约同族人复加增补，于以追远合散，敦本睦族于归太仆所谓诸族世国，大夫世家者。今不异于古所云，而仁人孝子木本水源之思，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爰书之以为序。

道光二十有一年岁在辛丑三月上浣

赐进士出身

诰授中宪大夫湖北安襄郢荆道署按察史聊摄杨以增撰。

民国聊城县历任行政长官考

莫玉山 张道英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布告中外，称民国元年。民国二年（1913年）2月，袁世凯窃国，在北京成立国会。北京政府废除清朝在地方上的府、州，改行道制，为省、道、县三级。山东省在北洋政府控制之下，聊城县属山东省西南道。民国三年（1914年）6月3日，内务部奉袁世凯申令，公布各省、道名称。同年，县衙署改称县公署，知县改称县知事，县公署设县知事一人，为县最高行政长官。

北伐以后，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废道制，存省、县两级，聊城县直属省辖。民国十七年（1928年），县知事改称县长，由省政府任命。民国十九年（1930年），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县政府组织法》，聊城县公署改称聊城县政府。民国县政府至1946年12月底被人民县政府取代终止。

县行政长官的任离接续，是地方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在民国时期三十五年（1912年—1946年）间，聊城县的历任行政长官并没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且因年代久远知情者甚少。为了给民国时期聊城县历任行政长官排出一个准确、可靠的一览表，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并进行内访外调，颇费了周折，总算有了个眉目。现将有关情况列述如下：

据《山东公报》载：“现任聊城知县王汝汉，前在费县任内交欠银饷……”时间署为“民国二年”。又载：“聊城县知事王汝汉，于民国三年咨请免其考询，业经贵部核准分发在案。”依上面两条材料，可定民国二年聊城知县、民国三年聊城县知事为王汝汉。

据《山东公报》载：“省府布告聊城县知事李传煦呈报……”时间署为“民国九年”。又据《聊城史志资料》载：孙堂高小建校石碑一方，至今尚存。碑文曰：“民国八年秋，本区忽发现一笔巨款，同人遂欣谓设立高小之机会至矣。于是纠合同志竭力筹集，又蒙前县知事和卿李公（按：李传煦字和卿）多方赞助款××，鸠工筹料，预备兴工，九年二月开始建筑，历三月初告竣……”时间为：“岁次，甲子，旧历二月二十二日立”。由以上材料判断，孙堂高小建于民国九年春，而当时的县知事李传煦曾于建校前多方赞助钱款，则李传煦为聊城县知事当在民国七——九年。《山东公报》所载李传煦于民国九年呈报云云，该是李氏离任县知事前不久的事情。

据高萍仲老师回忆说，他在城内北水口住时，是民国八年至民国十年秋，当时的县知事是韩履祥。我们在前面的材料中已判定民国七——九年的县知事为李传煦，那韩履祥为县知事则是高萍仲老师所说的民国十年秋前后的一段时间。

又据高萍仲老师回忆，他在城内步云阁住，是从民国十年至十八年，共八年，在那里住的头两年，县知事是王卓亭。同是根据这位高老师的回忆，民国十年秋前后的县知事为韩履祥，那王卓亭继为县知事则是在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

仍据高萍仲回忆，他在步云阁住时，西邻杨俊生说，县知事劳庆弼和北京铁道部次长劳资常是一家子。说这话时间在民国十三、十四年。结合并参照下面的材料，我们将劳庆弼任聊城县知事的时间定在民国十三年。

据《聊城史志资料》载：1925年（民国十四年）春，孙堂完

小校长孙泮林，因积劳成疾病故，学董和教员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县政府（公署）方县长（县知事）特派教育局长邓叔瞻前往参加追悼会，并献花圈、挽联致哀。材料中所说的方县长，当是县知事方舞。方舞任聊城县知事的时间是民国十四年。

据《张宗昌》一书记载，1926年（民国十五年）2月，道尹王元礼兼聊城县知事。

据刘少卿回忆，北伐军快到聊城时，军阀张宗昌所委派的聊城县知事孔庆浚，被国民党县党部发动群众赶下了台，先监视后放走。北伐军进驻聊城是1928年（民国十七年）。孔庆浚为聊城县知事是在此前，故推定为民国十六年。

据《聊城文化志》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进驻聊城，北洋军阀所置道尹陆春元潜逃，其所派县知事被扣押。聊城八个区的区长及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王慕桥等人遂公推刘克平为县长，刘是一位民选县长，得到全县八区广大民众的拥护。据刘克平之子刘少卿回忆说，他父亲是八个区联合开会推选的。当时姓孔的原县知事已去，上级政府新委派的县长未到，他父亲即到县政府办公，历时一月余，分文未取，待新的县长一到他父亲坚决地交了任。故知刘克平仅于民国十七年5月当了一个月的民选县长。

据《聊城文化志》载及刘克平之子刘少卿的回忆，国民党上层委派来的县长是李云庵。但据档案材料记载，李云庵为聊城县长是民国十七年6月到任，7月卸任，在任只有31天。

从民国十七年6月到民国十九年底，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通过山东省政府，就向聊城市先后派了13位县长。其后有一叫孙桐峰的，从民国十九年底任聊城县长，一直当到民国二十五年底，在任达6年之久。这位孙县长，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7月，根据国民党政府内政部统计司的要求，填报了一份《聊城县政调查表》，这份调查表我们于南京档案馆资料

中查到了。上面提到的那13位县长的名字及任职的时间都写在这一调查表中，省去了我们许多的考查时间。除此之外，我们还从《山东公报》上查到了上述13位县长中几个人的委任状原文，以此可与那位孙桐峰县长所填的调查表互相勘核。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1月，范筑先来聊城，被国民党省政府委任为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据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一文所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范筑先积极与共产党合作，守土抗战。1937年10月，日军攻占德州，按照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南撤的命令，范筑先曾撤出聊城几天。1937年10月16日晚范离聊时委派张维翰（共产党员）代理县长。11月19日范重返聊城通电全国，守土抗战。张维翰代理县长只有月余时间。

同据张维翰上文所载：1938年11月中旬，日军进攻聊城。范筑先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以军法处长刘佩之为城防司令，聊城县长郑佐衡为副司令。当战斗紧急之时，郑佐衡又率手枪连、武术队守北门。又据姜克夫《范筑先将军传》载，这位临时兼城防副司令的郑佐衡县长，在38年11月15日聊城失陷时壮烈殉国了。结合范筑先于37年底、38年初普遍重新任命新县长的情况，估计郑佐衡始任聊城县长应在1938年春。

聊城沦陷后，日军在这里扶持建立了伪政权，国民党的地方政府遂为流亡政府。

据《聊城市党史资料》第四集载：1939年秋末，聊城城南夏庄（现属朱老庄）有个土匪叫夏长发。他说他是国民党聊城县长魏兴武的人，有一挺水连珠大枪，并持有国民党县政府发给的枪证。

据《聊城文史资料》第二辑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县长，1939年是魏兴武，在城西南、城南活动。以后是刘佩芝，长期在城北活动。日本投降后进城的县长是刘子镶。

1947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部，由地方部队配合，解放了聊城，人民政府建立。至此，民国聊城县政府的历史终告结束。

依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民国时期聊城县的历任行政长官，除早期有的年份尚待考外，绝大多数大致弄清楚了。特列一览表如下，恳请知情者予以补正。

民国时期聊城县行政长官更迭一览表

姓 名	长官称谓	在职时间	委任机关	备 注
?	知 县	民国元年(1912)		待 考
王汝汉	知 县	民国二年(1913)	巡按府	
	县知事	民国三年(1914)	巡按府	该年改称县知事
?	县知事	民国四—六年(1915—1917)		待 考
李传煦	县知事	民国七—九年(1918—1920)	巡按府	
韩履祥	县知事	民国十年(1921)	巡按府	
王卓亭	县知事	民国十一、十二年(1922—1923)	巡按府	
劳庆初	县知事	民国十三年(1924)	都督府	
方 舞	县知事	民国十四年(1925)	都督府	
王元礼	县知事	民国十五年(1926)	都督府	道尹兼
孔庆浚	县知事	民国十六年(1927)	都督府	
刘克平	县 长	民国十七年(1928)5月		民选
李云庵	县 长	民国十七年(1928)6—7月任职31天	省政府	该年县知事改称县长
赵震乾	县 长	民国十七年(1928)7—8月任职32天	省政府	
王光鸿	县 长	民国十七年(1928)8—12月任职136天	省政府	
刘学曾	县 长	民国十八年(1929)1—3月任职68天	省政府	

姓 名	长官称谓	在职时间	委任机关	备 注
程福刚	县 长	民国十八年(1929)3—4 月任职 34 天	省政府	
蒋宗坊	县 长	民国十八年(1929)4 月任职 9 天	省政府	
申庆祥	县 长	民国十八年(1929)4—6 月任职 64 天	省政府	
王粹民	县 长	民国十八年(1929)7—10 月任职 123 天	省政府	试署
卢 锐	县 长	民国十八年 11 月—十九年 3 月 (1929. 11—1930. 3)任职 153 天	省政府	试署
李正时	县 长	民国十九年(1930)3—4 月任职 6 天	省政府	
杨玉和	县 长	民国十九年(1930)4—5 月任职 31 天	省政府	
王克昌	县 长	民国十九年(1930)5—9 月任职 135 天	省政府	
胡自昌	县 长	民国十九年(1930)9—11 月任职 71 天	省政府	
孙桐峰	县 长	民国十九年 12 月—二十五年 11 月 (1930. 12—1936. 11)	省政府	
范筑先	县 长	民国二十五年 11 月—二十七年春 (1936. 11—1938 年春)	省政府	专员兼
张维翰	县 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10—11 月任职 月余	范筑先委任	代理
郑佐衡	县 长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11 月	省民政厅	
魏兴武	县 长	民国二十八年(1939)	省民政厅	日本扶持建立伪政府
刘佩芝	县 长	民国二十九年—三十三年(1940—1944)	省民政厅	国民党县政府流亡
刘子镇	县 长	民国三十四—三十五年(1945—1946)	省政府	

旧时聊城司法机关设置情况概略

倪宗周

聊城为古东郡，元时改为东昌路（军事地名）。明、清为东昌府，治聊城。府衙门在今西花园粮食局地址。

辛亥革命推倒满清后，东昌府改为东临道。府有知府，道有道尹，行政机关叫道公署。从袁世凯历北洋军阀时代，司法机关不独立。道公署有司法科，司法科有科长、承审员、录写、法丁等职。没有专门设置监狱，不直接审理民事、刑事案件，有案件交各属县直接办理。

张作霖于1924年在北京称大元帅后，山东由其部下张宗昌督政，时改东临道为东昌镇守府。先还有道尹陆春元，后道尹也不称，叫镇守使。由姜和晴、王冠军等军人专政，更无司法审理之可言。民国八年（1919年）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道尹周树标时期，对司法尚按当时规定转各县办理司法案件。这是府、道司法审理情况。

民国初，清朝的县公署旧址修建为民国的聊城县公署（今楼西老衙门）。公署大门西修一监狱，无论轻重案件都押此一处。酷刑有木笼、绞刑等，木笼中的罪人不能动转，以至于有叫老鼠咬坏肢体致死者。曾有一县知事（后叫县长）王汝汉，广东人，外号王小鬼，因监狱动私刑，勒索犯人而大发其财，还叫老百姓立碑、送匾说是清官，为其歌功颂德，民愤极大。那时，男看守叫

衙役，女看守叫官门婆。凡新县长到任，必带秘书（又称绍兴师爷）和承审员、管狱员等，组织司法科，管理一切民事、刑事案件，没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或县法院。

北洋军阀倒台后，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占聊城，任命李云麾为县长，一切司法工作仍由县政府审理。1929年春，山东省政府主席孙良诚带所有机关回济南，蒋、冯（冯玉祥）又有裂痕，顾不得各县治安。1930年韩复榘倒戈投蒋，这时有山东省高等法院院长吴贞瓚（冯玉祥部下）派了李广生来聊城，正式成立了县法院，李广生任院长。院址在辛巳牌坊口西，白玉堂街路北王宅（旧知府宅），一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未换地址。

1930年冬来了县长胡治昌，不久调走，换了孙桐峰（军长孙桐萱的兄弟），勾结建设局长何铭心和教育局，拆文星当、庙宇，修古楼，立碑传名，从中谋利，光是何铭心就用即得钱盖了楼西路南二、三十间房子。县政府有司法科，又有县法院，只是县法院已成为被县长利用的工具。

1936年冬，省政府发表沂水县县长范筑先与聊城县县长孙桐峰对调。聊城成立六专署，范任专员，并兼任聊城县县长。司法机关稍加强。日伪政权建立后，聊城法院被撤消。

总之，明清时的府衙门有司法科，民国时的县公署有司法处，有承审员、管狱员等，司法机关不独立。1930年以后有了正式法院组织，但实权仍为县长所持，法院不过是县长、司法科的工具。

（裴蓉 整理）

癸丑“东昌独立”始末记

刘 晓 焕

一、“东昌独立”的背景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当上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从此，中国人民又沦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由于窃国大盗袁世凯图谋专制统治，复辟帝制之心也渐渐暴露，并向革命党人施加暴力，所以民国二年（1913年）夏，终于引起革命党人及全国人民的抵制，爆发了“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二次革命”发生后，山东各地革命党人积极谋图响应，也发生了两次谋图武装起义，策动独立的流血事件，其一则发生在东昌，革命党人尤民^①、吴廷勋^②、李应凯^③相继被捕遇害。从山东“二次革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癸丑“东昌独立”事件，在山东“二次革命”中所占的位置之重要。

二、“东昌独立”的萌芽

尤民是“东昌独立”的重要发动者，“东昌独立”的酝酿与发动，与他及其战友吴廷勋来东昌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尤民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在保定陆军中学堂因从事革命运动

被开除后，返回家乡台儿庄，后又会同同志吴廷勋、李应凯等人，在鲁西南一带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尤民等人也积极筹备起义，以迎接南方革命军北伐。后来，山东后路巡防营统领（相当于团长）李德厚率其部数营驻扎东昌，李德厚因闻尤民有过人的军事才能，便托人捎信给尤民，邀请尤民来东昌协助料理军事。尤民认为，这正是策动军队反袁的大好机遇，遂打点行装，拉上吴廷勋一同赶赴东昌。

尤民、廷勋来到东昌后，受到李德厚的热情欢迎。当时，尤民曾与李德厚进行了一番长谈，结果，李德厚深为尤民的军事才干所折服。因此当即授予尤民以总教练的职务，让他负责全军训练事宜。稍后，以尤民练兵出色，更得李德厚器重与信任，而尤民、廷勋则乘机在军队中展开宣传鼓动工作。上至军官，下至士兵，他们一概坦诚相待，循循善诱，设法引导他们走向革命，从而使整个后路巡防营的革命工作大有起色，部分官兵已开始倾向或支持革命。这就为革命党人在东昌继续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李应凯来东昌及“东昌独立”的酝酿筹备

1912年（民国元年7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积极为建立真正民主的共和而努力。1913年3月20日，身为国民党领袖之一的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时称“宋案”），举国沸腾，群情激愤。廷勋更是发出了“愿牺牲此身，以清除共和障碍”的铮铮誓言，积极协助尤民在军队中活动。

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成立讨袁军司令部，宣布江西独立，通电反袁。不久，江苏、上海、安徽、广东、福建、湖南等省市也先后响应，宣布独立，“二次革命”于是爆发。消息传来，尤民及廷勋颇感欣慰，情绪高昂，遂决计在东昌策动独立，举兵响应。为此，他们一面继续在军队中开展活动，一面“暗抬旧部”，邀请

同志李应凯等前往东昌协助举义。

这时，李应凯由于在济南谋图举义被捕后刚出狱不久，他看到袁世凯背信弃义杀宋教仁，又调兵南下，企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罪恶行径，决心“铤而走险”，发誓要推倒袁世凯的专制统治，恢复建立真正民主的共和。正当他着手行动时，适逢尤民从东昌邀他去共商大计，应凯毅然启程，前去东昌与尤民、廷勋相聚。应凯来后，尤、吴大喜，便扼要向他介绍了东昌的局势及工作进展状况。同时，尤民也将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以征求二人的意见。尤民由于精通军事韬略，所谈打算当然切实可行。所以在他谈了自己的打算之后，应凯、廷勋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初步形成了更为切合实际的举事计划：在东昌驻军中加紧策反工作，运动一、二营官兵起义，夺取东昌，宣布独立，响应南方讨袁军，并以此为基础，迎接南军北伐。

计划确定之后，尤民、应凯、廷勋等人分头在驻军中开展活动，加紧筹备工作，以期早日举义，宣布独立；同时，他们还努力设法与南方革命军取得联系。由于尤民、廷勋早就注意在军队中进行启蒙宣传，所以他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成效。他们首先运动驻军营长田汉臣获得成功，使田表示支持革命，答应率全营官兵配合起义。这一成绩，进一步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与斗志。接着，他们又趁热打铁，加紧活动，不久又运动另一营长吴某获得成功，吴营长也表示支持革命，届时参加独立起义。与此同时，他们与上海革命军政府都督陈其美取得了联系，双方约定互通消息，从而又争得了南方革命势力的支持与声援。这样，随着革命党人的积极筹备，“东昌独立”的条件逐渐成熟。

四、“东昌独立”的流产

当时，由于山东省尚完全处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袁世凯

的得力爪牙、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握重兵驻山东，受命阻党，旋代周自齐为（山东）都督”。为报答袁世凯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靳云鹏镇压起革命党人来，也就显得格外卖力。在靳云鹏的淫威之下，东昌反动当局对于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当然十分敏感。尤民、应凯、廷勋等人在积极筹备东昌起义的过程中，虽然行动已极为小心谨慎，但仍难免行事不周，其革命举动也渐为反动派所察觉；加上又有奸人向官兵进行了“暗中指控”，结果，官兵因此争先做好了应变准备。这样一来，尤民等人的起义活动实际上已是险象环生，但却未能引起这些革命党人足够的警惕，继续在忘我地从事着起义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南方各省讨袁斗争进行得也不够顺利，在短短两个月之间就陷入了失败，这也对东昌革命党人的起义活动造成了不利的环境。7月25日，湖口失陷，李烈钧败走；8月18日，南昌陷落，江西讨袁军失败；9月1日，南京又为张勋的“辫子军”攻陷，江苏讨袁军旋即也告失败。可见，正当革命党人在东昌策动独立之际，南方各省讨袁军正在与袁军苦斗，已自顾不暇，无法援助北方党人的起义斗争。这时，活动在济南附近的山东革命党人薄子明、吴大洲、邓天乙等人已转至青岛活动，所派吕子人、于廷粉等人虽然各在鲁西南、鲁西北地区发动了民间武装数万人，但也因为未来得及发动，仍如一盘散沙，更谈不上对活动在东昌的革命党人的起义斗争提供有效的帮助及支持。因此，尤民等人的起义斗争实际上又失去了外援，处于孤军无援的地步，这就决定了“东昌独立”的失败已是无可挽回。

更为重要的是，尤民等人虽然有为民主革命献身的勇气，为“东昌独立”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充分体现在他们身上。那就是只注重在军队中活动，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从而使“东昌独立”实际上脱离了群众。由于失去了劳动大众这一坚强的后盾，单凭运动部分军队的“东昌

独立”也就注定难以摆脱其失败的命运。

1913年8、9月间，正当尤民、应凯、廷勋等人即将发动起义、宣布独立之际，已做好准备的反动当局却抢先下了毒手。李德厚为保住乌纱帽，更是组织反动军队，封锁街巷，对革命党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因尤民事先得到消息，得以及时避至支持革命的田汉臣营长处，旋由田营长代觅一驴，尤民即换上便衣，骑上毛驴，在田营长的掩护之下，总算逃离了虎口，“亡命湖南”（1916年8月17日在徐州被张勋杀害，时年31岁，安葬在济南千佛山革命烈士陵园）。而应凯、廷勋两人却先后被捕。应凯、廷勋被捕后，李德厚仍一度待为上宾，屡劝归降。但应凯、廷勋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严辞拒绝。李德厚恼羞成怒，下令将二人打入死牢，并对他们施以严刑。但应凯、廷勋毫无惧色，反大骂袁世凯、李德厚不道，李终于下令处死二人。应凯（时年26岁）廷勋（时年32岁）从容走向刑场，视死如归，英勇就义。应凯遗体于1914年1月被运回老家安葬。

就这样，由于东昌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革命党人苦心经营的“东昌独立”终于流产，而以失败告终。

“东昌独立”的三位主要领导人，虽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弱点，他们所苦心经营的起义斗争也因遭到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了，但是，他们不愧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坚强的革命者，他们在东昌策划独立及为独立而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行动，在山东尤其是聊城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她们为民主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勇于追求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更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讴歌和纪念。

注 释

①尤民：（1886—1916）字超凡，原名保诚，峰县台儿庄（今枣庄市台儿庄区台儿庄镇）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读书，成绩优良。1901年15岁时被本县保送进入济南

陆军小学堂读书。由于结识了该校的进步青年薄子明等，加入了同盟会。后来考入保定陆军学校，因从事革命运动被校方开除，便回台儿庄，会同同志吴廷勋、李应凯等人在鲁西南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联络清军及绿林豪杰，拉起一支近五千人的武装，参加了陈干领导的“淮泗讨虏军”（陆军39混成旅），任总教练。后又南下谒见南京留守黄兴，深得黄赏识。准备组成陆军第40混成旅，参加北伐，因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计划流产。只得空手又返回山东，后来被山东后路巡防营统领（驻东昌）李德厚邀请到东昌。

“东昌独立”流产后，他逃出流亡到湖南、上海、大连等地。1915年春他自关外率百余人投到革命党人薄子明、吴大洲部下，在胶南指挥过“瞭甲埠之役”，在退回青岛时被日军诬为“土匪”送宪兵司令部，受尽酷刑，终未屈服；后经孙中山出面营救，始保出狱，在上海积极协助南方革命党人从事反袁斗争。1916年4月，率义军与冯国璋、张勋等人的7万大军“喋血力战二十日”，以孤立无援寡不敌众而失败，率部返回上海。5月12日，接薄子明电，到达周村，任山东护国军参谋长。护国军改编后任第一师师长、第二师师长。袁世凯死后，他离开周村，投奔孙中山南下。途经浦口时，被张勋密探认出逮捕押送徐州。张多次劝降，尤民拒绝，于8月17日被张勋杀害，时年31岁。

②吴廷勋（1882—1913年），字竹铭，峰县台儿庄镇人。他任侠好义，性格豪爽，在当地威望较高，被誉为“孟尝君”。1908年夏，他挺身而出，将山东同盟会的重要领袖刘冠三留宿，经刘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反清民主革命运动之中。后来他抱定从戎报国之志，在济南投入了山东中路巡防营，入了军籍。他刻苦演习技艺，攻研军事知识，在军中有所活动。当尤民约他同往东昌时，便一同来东昌参加“东昌独立”，牺牲于东昌。

③李应凯（1888年—1913年），曹县曹巨集（现属单县）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读书，由于“资性聪悟”，刻苦勤奋，逢试，辄冠诸生。后来又进新式学堂，产生了革命思想，寻求救亡途径。1904年，他说服家人，随同彭占元等人“自费赴日留学”，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5年8月，在南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鲁西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与尤民、廷勋等人取得了联系，在清军及下层群众中展开工作。后来组建了近五千人的武装队伍，到徐州加入了陈干领导的“淮泗讨虏军”，旋即赴济南，谋图举义。因计划泄露，与王明方等4人一同被捕，狱中虽受尽苦刑，终不屈服。1912年2月，因南北统一，始得出狱。是时他曾与提法使王鸿一劝说巨匪王虎臣招抚剿匪。1913年，尤民从东昌邀他去共商举义大计，他毅然启程到东昌参加“独立”活动，并遇害。1914年2月，遗体由袁溥起回老家安葬。

（吕国宝整理）

韩七爷抗捐告状与《反堂邑》

朱 成 德

民国初年直至解放后，在聊城以至济南等地上演过一出小戏，剧名为《反堂邑》。这出戏反映了清末吏制黑暗，不顾民命，官逼民反的历史现实。戏中有一位关键人物，名叫韩东林，因有威望于乡里，人们尊称为韩七爷。他见义勇为，冒着生命危险进北京控告地方官府获胜，为万民解险除难。人们思念他的义举，便写入剧中，以扬其德而彰其荣。

韩东林字震生，世居聊城县城南十二里顾庄（今西王乡南顾庄村）。其父韩凤池即以道德名著乡里，东林亦具乃父风范。清光绪十六年黄水泛滥，灾及东昌府所辖聊城、堂邑、博平以及清平四县。水过土地变碱，田禾歉收，百姓存活维艰，不堪其苦。而四县县官逼索钱粮如故，且变本加厉，额外征敛，以至四县中的军卫户无不坑家败产，濒临绝境。当其时，东林目睹心恻，毅然联络各地急公标义之士，不顾一切与地方官府展开了抗捐的斗争。地方官府慌忙镇压，从而激发了人民的反抗暴动。堂邑县的武举人吴树田参与义举，不幸被捕牺牲。在高压的恐怖气氛中，韩东林被迫藏身于县城外僧寺净业禅林，以教书为隐蔽，幸而躲过了官府严密的搜捕。东林见事不可为而斗志不渝，下定决心与地方官周旋到底，奋然有赴京上告之念。为确保安全取得胜诉，他以《大清律》为控诉依据，借冒同宗武秀才韩森林的身份，并化装成

游方道士，只身不远千里赴京师上告。不料到京之后投诉无门，幸遇同乡钱某适为北京某衙门司阍，因而得助上达户部。东林在京焦候日久，因案未下，岁临除夕竟不敢返乡共家人团聚。其时家人惦其久外不归，吉凶莫测，相聚而言：事若不成，吾家不免灭门矣。其风险之大可以想见。

有志者事竟成，天佑义士。东林的上诉竟获得户部尚书的允准，以额外加征乃地方官府的违章乱纪，指令豁免。东林胜诉而归，而聊、堂、博、清四县知县均获罪罢官。抗捐斗争至此而大获全胜。

韩东林抗捐告状这一义举，深深地感动了聊、堂、博、清四县的万民百姓。在宣统三年公议为其树立了德行碑，碑文记述其事：

“东林字震生，性慷慨，急人难，持人危，有古豪士风。往岁有屯田缴价事，聊、堂、博、清四邑中军卫户，无不坑家败产。惟震生公冒险赴京叩阍于吏部呈诉尚书案下，民情上达始能挽回，事竟成焉。公竭为殚心，不避艰险，耗一己之财，免众人之祸。大众感之无以报答，公议勒石以颂其德。”

上述就是《反堂邑》这出戏的背景由来。剧中饰扮韩东林道装羽扇，显示了他在抗捐斗争中的作用及智谋。东林在世曾看过此戏，剧班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东林颌首称是。

民初，聊城西南乡五盛庄（今属郑家乡）又发生了抗捐斗争，为首的李太黑悉韩东林为抗捐先驱，曾问计于东林。东林之影响如此。

（吕国宝 整理）

土匪王金发盘据聊城考略

顾 叶 青

王金发，河北馆陶人，民国时期土匪。乘局势混乱之机，王金发曾两次盘据聊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八月有余。对文化摧残之巨，人民蹂躏之苦，实属聊城历史之罕有。本文仅对有关情况，略述梗概。

民国十二年（1923年），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下田中玉督鲁时，王金发任第四旅学兵连排长，驻县城隍庙。

民国十三年（1924年），直奉大战，吴佩孚战败，张宗昌督鲁。民国十四年（1925年），奉系一二八旅张辉联来聊收编了第四旅，王金发任连长，驻东关江西会馆。同年12月，娄和晴任东昌镇守使兼一二八旅旅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在平赵锡灼来聊与王金发合谋叛变。事败，赵锡灼被捕杀，王金发部哗变逃走。

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取得胜利，张宗昌率领的奉军全部溃败，随之，鲁西北各地张宗昌委派的政府官员也均逃之夭夭。冯玉祥部孙良诚主鲁，省府设在泰安。民国十八年（1929年）夏，冯玉祥反蒋，孙良臣奉命西撤去河南省，聊城城防空虚，王金发乘机纠集其残部，聚众地方匪徒、烟鬼、兵痞等千余人于7月10日进驻聊城。王金发自封司令，司令部即设于光岳楼南杨氏海源阁内。土匪进城，奸淫烧抢，牵牛绑票，胡作非为。海源阁藏书惨遭损毁，千年精典被当作废纸，用来擦枪、擦鞋，包物

等。其中焚烧者犹居多数，甚至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作枕，因旧书不易燃烧，匪徒竟愤言：“谁谓宋版书可贵？”匪部中有一号称九爷者，颇知书本，他乘机择杨氏善本珍籍，囊括而去。并以窝匪名义，穷搜城内外居民，凡私家书贴古玩，均被其网罗而尽。匪部王金发此次陷聊，历时月余，为期较短。但多数商贾居民因不堪忍受匪徒之骚扰纷纷投亲靠友，流离他乡。因匪徒未敢冒犯教会，至使城内双街的基督教堂竟成为居民争相投奔的场所，俨然“保护区。”同年秋，冯蒋战停，蒋介石派陈调元主鲁，陈先收编王金发予以旅长名义，后派在平驻军岳胜轩旅所辖梅团，来聊将王金发部驱赶出城。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初，汪精卫主持“扩大会议，随即战事频起，政局中变，政府处于飘摇转徙之中。聊城城防又空虚，土匪王金发、陈希朋等再次盘据聊城。不久王金发与人合谋将陈希朋在酒宴间杀死，王部扩大，随即横行四乡，百姓又沦水火之中。聊城城内十室九空，海源阁藏书遭受了空前大劫。字画碑贴，仅剩轴木夹板，中心多被撕去，杨至堂图像一轴，被撕裂如麻，投弃于案几之下。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也无处不有，被雨水淋毁之佳本无数。一掠，再劫，劫余再毁，致使价逾连城之古书几乎损毁殆尽，这是杨氏藏书最大的破坏时期，实属我国文化之浩劫。1931年1月16日的《中央日报》在报道中愤言：“……王匪，……实为摧残中国文化之第一大罪人。……。”

匪部王金发此次陷聊竟长达八月之久，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掳掠，为所欲为。他们曾把与各地帮、会作战中俘获的人丁当做活道具，在演出杀人的剧目中，现场真铡活人，一时间，红溅绿裳，戏台成了杀人场。当时之血腥情景，令人掩目，实开世界戏剧历史残忍之先河。

这次陷城较上次情形更加严重，居民的衣物钱财，商店的货品均被抢劫一空。城内娼妓肆行，毒品横流，不少街巷还建起了

公馆、妓院，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同年秋，第三路军韩复榘主鲁，马洪逵部驻泰安。10月马洪逵部十七师来聊围剿王金发，骑兵先至，将王部围困城内，等候炮兵来后攻城。当夜适逢狂风大作，王金发趁机率部坠城逃走去馆陶，至此，踪迹不明。不久，第三路军二十九师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驻聊，治安始恢复平静。

(裴 蓉 整理)

韩复榘来聊城片断

吴 云 涛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省霸县人。生于1890年（清·光绪16年），卒于1938年1月。幼时随其父念书，长大后跟冯玉祥当兵、当官。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当上了山东省政府主席，兼任第三路军总指挥，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中秋节后，他亲赴鲁西几个县城视察。这次由省城济南出发，经齐河、晏城、德州、禹城、而奔聊城，随行人员有秘书长张绍棠、第三路军参谋长李宗弼、交际处长张联生，及医师、厨师、侍卫人员，5部汽车坐满了人，浩浩荡荡于8月20日上午9时抵达聊城。

那天，聊城县长孙桐峰、公安局长林金堂、驻军87旅旅长荣光兴等，早已率领文武百官、各校学生，在车站恭候多时了。韩复榘等人当日下榻于进德会（城内火神庙改建），与地方主要陪侍人员谈话。

21日上午，在县政府礼堂，召开了联席会议。韩复榘坐于首位，听取了与会人员的工作情况汇报，韩也有训话指示等等。在这次会议上，县财政局长武景芬迟到了10分钟，被韩予以警告停职处分。午后，由周荫泉带领民众代表、县商会、省立二师及二中校长、宗教人士等10多人来进德会谒见韩主席，致慰问之意。同时，地方报社《东昌新闻》记者拜访，10多分钟后，一起送出。

接着在进德会大院内，举行了“国术表演”。

聊城城乡中，30多位较为著名的武术家，因在头一天就接到了县长的通知，所以都已做好准备。这天都到了，有邓寰瀛、郭老合、杨金生、赵象坤、王幼宽、邓清元以及门弟子等。个个精神抖擞，束扎爽捷，都想在主席面前一显身手。刀、枪、剑、戟各种武器，也都一一摆列，耀目生光。同时，驻军87旅的国术队也来参加。一时场面热烈，做到了精彩、圆满。韩复榘看后颇为高兴，赏给了城乡国术界大洋500元，以资奖励。

22日上午，在城隍庙内召开了民众大会。通知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参加，老百姓随便进去听韩复榘讲话。男妇老幼，纷纷赶来。一时人群拥挤，都想瞻仰一下这个威名响亮的韩主席是什么尊容。因而，这天城隍庙戏楼前大院子里，黑压压挤满了人，有公安人员维持秩序，人虽多却安排得当，并不紊乱。

7时左右，韩吃罢早点，率领随从人员，从进德会走出，他独个儿在前面走，身后跟着本城县长、公安局长、各机关首脑人员，连同韩的侍从卫士等一大群人。韩的身材魁梧，穿着灰色军服，外披浅灰大衣，昂首挺胸地大踏步走，一路向会场而来。他事先吩咐，不许戒严，街上行人、摊贩一如往昔。

从进德会到城隍庙约一华里，他刚刚走到东口（楼东大街的中间十字路口），赫！整个十字街心跪满了人。男的女的、老太太老头全有，这些人把路口紧紧堵着，一个个手举状纸，高呼：“主席，冤枉啊！”老韩倒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叫“揽舆告状”。这些告状的民众，因打官司淹缠日久、拖延无期解决，听说他判案爽快，可以立时决断输赢。所以头一天就来伺候机会，面递诉呈、跪求伸诉。韩在外出视察时，这种场面是经常遇到的。他当即停步，叫卫士把他们所拿的状纸收过来，大声说：“父老们，都请起来，我开完会一定处理。”路闪开了，随即走过，直向北行，一会儿来到大会会场，主席台就在戏台之上，居高临下，一览无余。

首先，孙县长做了简单介绍。韩复榘当即居中一站，微微点头。他这一亮相，万目共瞩，鸦雀无声。只听韩开口喊：“县长来了吗？”孙桐峰急忙走上一步，躬身答“报告主席，来啦。”韩说：“你唱个为政箴言歌，给大家听。”这一命令，好似给孙县长当头一棒，可真拿了他的马武了。平日，他虽是对这歌子耳熟能详，只是一回也没唱过。今天主席耳提面命，怎敢违抗，一时闹得他晕头转向，便勉强哼出一句，比哭都难听。韩一摆手喝道：“别唱啦，难为你当县长的啦！”接着又喊：“公安局长！”林金堂立即挺身立正“报告主席，到！”韩说：“你唱唱吧！”林金堂会唱，但也不很熟。尤其在这个威势窘迫之下，哪能唱好。唱了两句，又被韩喝止稍停，又招呼台下整齐肃立的保安大队，“大家唱吧”。于是这二百武装士兵，齐声唱起，音调合拍，非常好听。

歌声停止，韩就开始向大会讲话，他十分稳重、从容，先从团结爱国讲到根除毒品，又扯到破除迷信，最后讲到女人缠足的种种害处。这时，会场后面有许多妇女摇摇晃晃，似乎要挪动走离。韩在台上大声喊：“大嫂们，别误会，不是叫你们在这里放脚，以后别给女孩子缠脚就行了。”一时引得全场一阵笑声。

韩复榘讲完了话，又把孙县长教训了一顿，他说：“一个县就等于一个家，一个家庭弄得肮脏不堪，还谈什么政绩。你看，我们开会的这条街，多么不卫生，开完会大伙替你扫扫，马上预备工具！”

会后，遵照韩的指令，立即行动。并面命县长，所有与会有官衔人员，一律参加劳动，民众和士兵站到一边监督参观，不要动手。说干就干，韩复榘立即捞了把铁铤，往每只筐里、篮里锄土，同时也拿起扫帚扫土成堆，忙个不休。孙桐峰和林金堂共抬一支大篮，其余的各局长，科长以及区长、队长之类，都是两人一只抬筐或大篮，砖头瓦块、秽土垃圾、乱七八糟，一筐筐，一篮篮，抬着往河边倾去。只见人群络绎，奔走不遑，个个闹得汗

流浹背，哭笑不得，韩虽没抬大篮，但也把大衣脱去，亲自把铁锄上扫地，一气不歇，也是时时擦汗。这个活，没叫老百姓和士兵动手，居然把这趟长达一华里的城隍庙街，打扫得干干净净，顿改旧观。直到天黑才算完工。

24日上午，韩处理揽舆告状的案件，事完没再滞留，随即离开聊城去阳谷了。

（吕国宝 整理）

建国前的聊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

——孟营完小

周庆月 孙元芳

聊城市蒋官屯镇孟营完小的前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聊城县立第三高小。该校创办于1920年，七十四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前毕业10个高小班，学生350余人。建国后小学毕业54个班，学生2270余人；初中毕业14个班，学生560余人。总计中、小学毕业78个班，学生达3180余人。其中县团级以上干部24名，区级干部60多名。如原北大党委副书记王路宾；革命烈士、一等功臣、原空军三师七团副团长孟璜；原武汉市委书记孟筱澎；原黑龙江建设兵团副军长顾延邦；原河南开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宗谦；原贵州铜仁地委副书记孟景侠；原山东省邮电管理局人事科长张涛；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李风禄；还有建筑工程师张士立；山东省医科大学教授张学德等。此外，也有在台湾、美国等地的就职人员。所以，这所学校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和爱戴。

下面，仅就建国前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依靠群众办学校

1919年秋，“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使人们求知识求进步的智窠开始启动，办学校受教育开始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当时孟营村在聊城山东省第三师范任教的张循卿（字逢举）回乡发动本村小学教师张英忱、孟昭申（字延荣）、张子春和热心办学的张士太、张士修、张学诗、孟昭荣、张逢立等组成学董会。几经商议，决定创办一所高级小学。张循卿陪同县长李传煦亲自察看校址，当即决定在该村南门里原“奶奶庙”的庙址上建立学校。批拨建校费900吊制钱。众学董又发动群众献工献料，刨掉“奶奶庙”、“关爷庙”等5座庙基上的大树，拆掉了部分庙宇。经过一个冬季的筹集，基本备齐了物料。

1920年春，学校开始施工，众学董日夜守在工地。张英忱连同十几岁的儿子张同生（即张谦）一连20多天不回家，守护建校用材。当时该村和邻村施工的瓦工木工都是甘尽义务，不收工钱。同年5月，建校基本结束。共建出厦的教室两座，砖镶门平房两座，后又用剩余物料建西屋两间，作为办公室和储藏室。

是年秋，招收初小班1个，学生近40名；高小班1个，学生40名。聘王东岳（即王路宾之父）为首任校长，张士方为教员，加上原有的张英忱、张子春、孟延荣共4名教师。

在建校落成典礼大会上，县长李传煦到会致贺词，并命名为：聊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

二、驱逐校长之风波

1926年秋，张占鳌于泰安国民党军政人员培训班毕业后来该校任校长。张系该村人，是聊城三师毕业的学生。他与国民党聊城县党部书记（后升为国民党山东省鲁西党务办事处的督导员）的田谊民、书记长刘子善（又名刘延庆）关系甚密，为国民党顽固分子。

张任校长期间，因其高傲自大，目无他人，实行法西斯教育，

残酷体罚学生，且大搞一言堂，严重脱离群众。因此引起学生强烈不满，终于 1927 年夏被学生驱出校门。

1934 年春，丁广恩任校长。因安排课程与本村教师发生分歧，后波及到学董和学生。35 年冬，以伙食不清为导火线，形成了驱丁学潮。国民政府曾派警察、宪兵队三番五次到校威胁引诱，软硬兼施，一再弹压，均无济于事。为此，该校学生罢课两月之久，直到县教科派张介甫来接任校长，学潮才平息下来。

三、积极开展勤工俭学

这所学校十分重视勤工俭学。早在 1936 年至 37 年间，校长张介甫和教师张英忱，就带领学生利用校地种棉花 5 亩。由于师生辛勤劳动，获得丰收。他们用勤工俭学所得购置了单、双杠、压板、网球、羽毛球等体育器材，促进了体育活动的开展。同时还添置了地球仪、三球仪等教学仪器。

1943 年是历史上罕见的灾荒年，为了救灾度荒，张英忱老师提出了拆去村里庙宇筹资打井，种菜自救的设想。他的建议，学校十分重视，一方面由副校长张铁花（中共党员）、教师孟景侠（中共党员、支部书记、后为区委书记）结合村上的“红枪会”（当时在该村为共产党所掌握）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拆庙；另一方面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当时，该村地主恶霸张振文（后为还乡团长）阻止拆庙鸣枪恫吓群众。张铁花等带领 10 多名“红枪会”成员到张家，以“红枪会”的名义没收了他的枪弹，使其威风扫地，所以拆庙得以顺利进行。接着又将原建校地 82 亩卖掉，用其所得率众打井 10 余眼，种瓜菜上百亩。这样，使孟营村在饥饿的灾荒之年没饿死一人，学校无一学生辍学。

四、坚持在斗争中办学

聊城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是在革命斗争中创办发展起来的，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

1938年11月，日寇攻陷聊城，形势恶化，学校被迫暂时停办。39年聊城省立三师毕业的本村学生孟筱澎等组织进步教师，召集50多名学生在该校办起了补习班性质的“抗日救亡宣传大队”，让学生既学习文化知识，又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引导学生走革命道路。

1942年春，在张介甫校长的倡导下，组织本村6名教师办起了抗日小学。为缩小目标，以防发现，便采取分散办学的方法，借用民房分三处上课。当时，学生上学不交学费，教师义务教书不要工资。为适应形势，兼学抗日与日伪两种教材。是年秋，日伪政府成立，督催复学，中共孟营地下党支部副书记张铁花自荐为校长，支部书记孟景侠、党员张逢庆、孟昭喜等，均以教员公开身份，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1944年秋，聊城抗日民主政府在广大农村组织民兵联防队，领导人民坚壁清野、破路挖沟、抗粮抗款（拒交敌人摊派的粮款），与日伪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此时，孟营小学校长张铁花因护送八路军伤员进城就医，被捕入狱。该校老教师张英忱等，协助本村党组织，积极发动民兵联防队，孟营村的青壮年自卫队在党支部领导下，组织了“钢枪班”（又名模范班）进驻孟营小学。民兵们晚上上民校，夜间轮流打更放哨，防备日伪扫荡。张英忱老师出主意，每天带领学生跑操。跑步声、口号声模仿军队操练，使敌人误以为是我地方部队“三团”在孟营驻扎，起到了迷惑敌人的作用，持续一、两个月，日伪不敢来孟营骚扰。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注目，他们认为，孟营学校是他们在聊城东北乡

一带征收粮款的绊脚石。而张英忱老师则是党的“领导人”。1944年古历11月21日夜晚，日伪军以3个团的兵力对孟营村进行突然袭击。孟营村党支部书记先得到消息，指挥自卫队撤出村外。组织老弱群众隐蔽起来。张英忱老师因动员群众外撤，没来得及出村，藏在秫秸堆里。日、伪军在村外用机枪小炮扫了一夜，翌日清晨，闯进村里，进行了大搜查、大抢劫。一伙敌人来到张英忱老师藏身的秫秸堆旁，很快搬开了几个秫秸，搬的只剩下3个秫秸了，就用刺刀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敌人的集合号响了。原来他们捕住了和张英忱年纪、相貌相仿的张守经老人，误认为是捉到了张英忱，吹响了集合号，召回了正在搜查的敌人，张英忱老师幸得脱险。第二天，日、伪军发现错捉了人，恼羞成怒，对孟营村再次清洗，将数百名群众拖到孟营小学校内，拷打逼问，毫无结果，只好败兴而归。是日下午，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吴区长率人来村慰问群众，组织转移，帮助张英忱老师奔赴解放区。孟营小学又暂告停办。

1946年春，已当选为聊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的张英忱，主持办起孟营高小，命名为“筑先县第三抗日高级小学。”该校配合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编写教材，以教育学生，宣传群众。如桑重华编写的《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张英忱编写的《蒋介石观战》等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年秋，蒋介石的新五军过了黄河，人心浮动。孟营高小师生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村演出，自编剧目《打沙锅》、《地主盼蒋记》等，鼓舞了群众，打击了敌人。这些活动，使地主还乡团恨之入骨。其骨干分子张振文、张世旺等多次到校恐吓学生，并于一夜间窜进校园，企图谋杀张英忱。村党组织与学校师生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7年，孟营高小在任庄建分校。1949年建国后，取消“筑先县抗日高级小学”校名，改名为“孟营完小”至今。

忆在武训县抗日工作中的几次险遇

李 寿 澎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一直在冀南区的南宫、四专区从事文教兼通信联络工作。截止1943年8月中旬，共历险34次，那真是绝处逢生险中险，大难不死难中难。9月15日我随赴鲁西北的大队过卫河到达新划分的冀南七专署^①。经专员周持衡同志分配到武训县^②工作。9月2日携全家由临清下堡寺南部开始移往武训县境内，当晚住在卫东县潘彭祖店村，岂知次日凌晨敌人合围该村，听到枪声，我们急急闯出东豁口，向东南方向奔跑，一路枪声断续，经过官庄、塔头，方到武训县之夫人寨、乔二庄，晚上宿住西张庄，从此即在卫河之东工作和生活了。不久，敌人围攻王羨村，七专署财政科长李志华即在此役中失踪，我们跑到柳邵村一带暂避方得以幸免；后又逢吴逆连杰率部进扰乔二庄（时我们已移住该庄）。这是我初到武训县后的1至3次险遇。

1944年1月1日，吴逆又配合日寇“扫荡”，再次出扰乔二庄，我和杏村（夫人名）等跑到东国儿寨方侥幸避开，后敌伪军大举作“三·二九”^③合围扫荡。我们又跑到东国儿寨，当晚在该村住宿，次日在甘官屯又遭敌夜围，一觉惊醒，突闻枪声，手足无措，不能行动。在此危难之际，幸被警卫员张安乐背负逃出，到辛集镇西庄避宿。下半年卫东县北影庄设敌据点后，对武训县中心区威胁极大，我们常在夜间跑到村东头南地洞中睡在牛旁或远奔

“无人区”^④过夜，7月31日我赶到七专署驻村准备奉调赴太行整风。^⑤8月10日晚，在驻村南安头突遭敌军包围，我在《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亦名《滏卫东畔》）二千行长诗中，曾作如下记述：

“……下两点胡同口响机枪，爱人（指我）不能往外冲，大家无处可藏躲，争先往墙头上爬蹬：“快点！快点！拉一把……”墙上人难顾墙下人，二十多人都登上去，爱人病体难攀登。两手用劲掐泥土，总算爬蹬墙头上，钢梁磨针功竟成，枪弹如雨头上飞，墙外跳下去陷沟坑！鬼子狗声又猫叫！“追哟！追哟！……”闹腾腾，追得他钻在豆秧里，隐隐又入青纱帐中，前面横躺着马颊河，水深河宽难趟行；明月弯弯照水面，河里微波翻金星，藏在高粱叶深处，鬼子骑马满地窜蹦，他侥幸没有被趟出，好容易熬到天将明，阵阵枪声不稍停，离村太近不能不动。撅棵高粱杆试河深，深悔没有学会游泳，人急渡河下了水，脚底无根透骨冷，水涌脖颈溅成浪花，幸喜没有险遭灭顶！往西跑开一股劲，庄稼地出没避敌锋；走上路怕碰敌伪军，怕见群众动疑心。瞎子摸黑难上难，跑敌情最怕地皮生，到处群众牵牛跑，到处发现闹敌情。他警惕又象“四·二九”^⑥。跑到下半晌才稍停，再走将临卫河滨，问路北转向王奉。前面有个妇女骑驴，细问是往武城集村，人家骑驴他后跟，黑夜摸瞎到王奉，牵驴的说：“天黄有雨，人黄有病，你满脸惊气主多凶！”一天嚼了半个北瓜，又香又甜又脆生，乌鸦归林投巢宿，他往哪里去投奔？！……”

上山则见狼，下泽则见蛇，难后余生，在大雨黑夜抢过冠堂路后，竟又迷失方向，误走到贾镇敌据点以北之刘家洼里村，又遇一次生死惊险，在上述拙诗中描述如下：

“洞房^⑦鼙鼓日一更，检查行李丢了个净，不能再奔上太行路，上级让休养回家中。骤雨里转向冠堂路，无边荒草难畅行，天黑雨紧迷失方向，错走到刘家洼里村，西南三里贾镇钉^⑧，逃出虎口又陷狼坑！‘看青队’投敬手榴弹，说他口音有毛病，跑到荆楼找

村长，洼里人追来一窝蜂，马上要把他捆回去，说他没带正式证明，山头上的草根子硬，他验看证件亦不放行，关在屋里下了枪，门口站着三个‘民兵’，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白布掉进染色瓮。向村长解释一整夜，舌敝唇焦不中用，仍旧诬他是冒充：‘等天明把你区里送！’，大苇坑蛤蟆干鼓肚，一肚子道理讲不清，心里乱跳强作镇静，呆瞪着眼睛听雨声，好容易捱到屋里发亮，又被押往区里说分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孙助理员见状大吃一惊，批评（刘家洼里）村长太蛮横，令他在区深刻反省。荆楼村长透了实话：‘李秘书今天是死里逃生，他们几次要活埋你，那村长依仗敌势翅膀可硬！’”

“天空下雨地面泥泞，他撞撞跌跌回家中，幸获解救落活命，好象困鸟飞出牢笼，孩子欢迎爹爹归来，杏村惊问：‘你莫非又得病？’他喘喘气来歇歇脚，心口还跳耳朵还嗡嗡，只因日夜‘无人区’里跑，草刺扎满腿肉中，腿肿成疮血淋淋，炕上躺卧不能动。她从肉里挑出刺，一根一点捡细净，再用香油熬黄腊，耐心抹疮消毒肿，他遭遇敌伪四、五十次，次次杏村伺候病，夫妇穷困多艰险，患难与共相依为命”

伤病稍愈，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不日梁向明（县委委员）来看望说：“这可真危险！那里我们没有基础，是忠心事敌的薄弱村，如在那里出了事，咱可一点咒念都没有！幸亏你脱了险啦。”不久，我身体恢复，即到专署参加秋征会议，回县时和地理熟悉的通讯员相伴，行至冠堂路边，正值伪军数十人自西向东窜行，相距甚近，不便遽回，幸未遭敌枪击。后在胡同里庄住时，有一次敌人黎明进村，我和杏村等由赵里庄村东向北奔跑得脱，时赵里庄正遭敌伪围攻。

在这一年中，例如“三·二九”合围、东国儿寨反扫荡、孔里庄突围、胡里庄跑敌情、南安头遭敌合围、刘家洼里被扣押、冠堂路遇伪军及范家寨避敌等，当是我经历的第4至15次险遇。至

于在宁辛庄以东领导整风班人员几度反扫荡，尚未统计在内。

黄谷红梁白白棉花，抗日人也想念自己老家。1945年初，在探望老母的往返途中乃至在家期间，曾遭遇到北影庄北坏人行劫、枣园跑敌情、梁王庄“民兵”欺凌刁难、甘集镇敌“扫荡”、周寻寨避敌情、大名敌伪出扰我村、南巨路遇伪军、黄台村遇敌伪拦路、沧上与伪军狭路相逢、过尖塚渡卫河、果子园访友逢敌等险情，这是我在武训工作时所遭受的第16至23次危险。

骤雨不终朝，飓风不逾夕。抗日八载，犹如顷刻。我在1945年4月中旬，经行署与专署批准调到二地委宣传部工作。由武训县至南宫县沿路，敌伪据点与碉堡陆续被我军拔除，已无大碍，可谓一路顺风。恶狗怕狼揍，日寇惧长斗。不数月，日军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党政军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战，取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注：

(1) 1943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集总的决定，冀鲁豫区第十地委划归冀南区，为第七地委，聊西、冠堂边遂归属冀南区。

(2) 1943年11月16日，冠堂边办事处，奉冀南行署之命，为纪念乞丐兴义学的义人武训，在聊冠路以北地带组建武训县，遂成立中共武训县委（时作者任县委书记），隶属中共鲁西北地委。

(3) 1944年3月，来自临清、馆陶的日伪军对聊堂边办事处、武训、清平、冠县、卫东等县进行了合围、扫荡，约一星期，以29日为最严重。

(4)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底，由于日、伪、顽横征暴敛，无恶不作，渔肉乡民，加之当时的武训、聊堂两县1000多个村庄，约40万余人的区域，旱、虫双灾，酿成“民间三十二年”大灾荒，“人祸天灾”造成这一带历史上罕见的“无人区”和“半无人区”。

(5) 1944年9月底至翌年元月，武训县委为推动全县抗日群众运动的开展，在里庄、纸坊头一带组织全县党政干部进行整风。作者拟奉调赴太行山学习就是为开展这次整风运动作准备。

(6) 1942年4月29日，日寇调集大量兵力，并用飞机轰炸冀南全区，叫做“铁壁合围”，作者时在四专署被合围在临清县以西的企之县。

(7) 洞房，此指地洞中的宿住避敌处。

(8) 贾镇钉指设在贾镇的敌据点。

(9) 1944 年 8 月，武训县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大会在县政府驻地赵里庄召开，主要内容是布置秋季征收任务。

(薛守鼎 整理并附注)

“武光”——武水之光

——记一次中日篮球赛

崔 梦 辰

1943年秋季，日伪在聊城举办了一次运动会，群众中的体育爱好者、日本军人和伪县府职员参加了比赛。当时，聊城篮球爱好者有邱宗成、杨化朋、崔梦辰、黄洪玉、杨化春、梁楚材、张肖农等。为了这次运动会，他们临时组成一个名为“武光”的篮球队（聊城古名武水，（注）武光寓意武水之光）报名参赛。日本宪兵队闻说亦不甘示弱，他们针对“武光”篮球队组成了一个名之为“大雾”的篮球队报名参加比赛，并叫嚣什么“大雾要遮蔽武光”，意想比赛一定取胜。

比赛球场选在楼西旧县府对过观街，由县教育科曹科长担任裁判，“武光”、“大雾”两个球队对垒，当时“武光”队出场的队员有中锋黄洪玉，前锋崔梦辰、杨化春，后卫邱宗成、杨化朋。他们不仅球技精湛，而且配合默契，整体运作非常协调。比赛一开始“武光”队得分一直领先，“武光”队的两名后卫，都是体坛宿将，防守严密，稳扎稳拦。使得“大雾队”难得投篮机会；两名前锋与中锋紧密配合传递快捷，投篮准确，进球率颇高。场内外高潮迭起，观众们掌声不断，喝彩声不绝。两球队角逐激烈，当第二场比赛进行到80分比35分的时候，“大雾”队员见双方比分悬殊，回天乏术，败局已定，不由恼羞成怒，把球一撇，摆开架势竟想动武。周围观众见状，义愤填膺，纷纷谴责他们的这种卑

劣行径。日本宪兵队的“大雾”队员怕引起众怒，更慑于“武光”队员的浩然正气，才未敢撒野，灰溜溜地垂头离去。人们欢声雷动，交口称赞“武光”篮球队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日本的威风。为聊城人赢得了荣誉，在聊城体育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注：

武水即（魏）博州武光县是也（见《寰宇记》）。武水城即今沙（冢）镇。故城内有石柱，后魏孝文帝（见《九域志》）所立，为业东之表，武水从石柱北是也（见《寰宇记》）。从公元596年置武水县至公元955年割属聊城，计三百五十九年。

（薛守鼎 整理并附注）

话说黄沙会

梁 金 中

我的故乡在聊城县东南隅，地处聊阿边。据我所知，聊城东南部与东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武装会道门曾有黄沙会、红沙会、红枪会和蓝枪会等迷信团体。它们虽然名称不同，溯其源是异体同宗，都是由黄沙会演变而来。现略述于下：

黄沙会与红沙会

黄沙会，因会员肩佩黄纱带，带内装有朱砂（同砂）咒符而得名。可是黄沙会员自愿入会时，必须把传道师用朱砂（红色矿物）写在黄表纸上的红字咒符，烧成纸灰后用白水喝下（据说此水喝后，即能避邪，而刀枪不入），才能成为会员。因此群众称黄沙会亦叫红沙会，所以黄沙会、红沙会名称不同，而实为一体。

黄沙会是农民群众的武装自卫团体，据说是义和团的派系，亦说是白莲教的一支。它是社会动乱时期的产物，目的是抗击散兵土匪，武装自卫。1928年（民国十七年）正值军阀混战，聊城驻军有军阀张宗昌属第六军（军长徐源泉）和十四军（军长孙殿英），还有寇英杰属第一军（军长刁锡光）共三万余人。5月北伐军占据济南，张宗昌和寇英杰三个军，闻风而逃。聊城空防，地

方治安无人过问。因之，散兵土匪到处蜂起，牵牛架户，烧杀抢掠，民不聊生。农民为了保护财产都有团结自卫的愿望，今聊城东南于集乡李海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由刘润常等人邀请黄沙会来村设坛传道，青壮年都被吸收入道，建立了黄沙会组织。刘润常是年已五十二岁，被推选为掌坛的领导人。从此，会员每天晚上磕头跪香、接驾^①、练功，遇有匪情，击鼓为令，跑步集合，打击土匪，保家自卫。

刘润常幼年家境贫寒，只念过几天私塾，就失学在家，拾柴割草。及至三十多岁时，出支过继自立门庭。尽管有七亩田地，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全靠做香（迷信品）赚钱补助。他和睦乡里，孝敬父母，礼貌待人，讲求公德，且有热心公益的高尚品质，在乡里农民中，很有威望。又因他性格爽朗，和善易近，加之善于领导，显得他神道妙深，名声外扬。外村群众纷纷来李海村邀请刘润常师傅传道。1929年，聊东南近百余村。都参加了李海黄沙会，刘润常成了黄沙会首领。小股土匪不敢活动，大股土匪不敢入侵，黄沙会地区的农民，暂时尚能安居生活。

1930年9月，一天傍晚土匪王金发部攻入城东南王堂。以刘润常为首集合两千余名黄沙会员，分三路包围了王堂，匪军见势不妙，放火烧房后，逃回城内。

10月间，又有小股土匪，侵入顾官屯西位庄（今东阿村）。刘润常带领李海会员，跑步二十余里，会同附近村庄黄沙会员千余人，把位庄团团围住，将土匪全部刺死，李海会员得步枪两支。

在此期间，聊东南一带农民，自行建立区团组织。刘润常被推选为永清团（当时于集区叫永清区）团长，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农民拥戴的黄沙会首领。黄沙会组织，迅速发展，遍及城东南各村。村村设有神坛（群众叫佛堂），农村青壮年大都参加了黄沙会。会员天天晚上磕头跪香练功，香烟缭绕，轰动一时。

韩复榘叛冯（玉祥）投蒋（介石），1930年（民国十九年），被

蒋委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率军进入山东。派八十七旅旅长荣光兴三千人来聊城进行清乡，土匪绝迹。刘润常因领导黄沙会抗击土匪有功，1930年农历10月，以永清团全体农民的名誉给刘润常送了“义勇仰”的大匾，并在李海村唱了四天大戏，以示庆贺。旅长荣光兴派参谋长，带领部分武装坐汽车参加庆贺，仪式非常隆重。

抗日战争开始后，在抗日民族政府的教育和影响下，刘润常抗日思想坚定，情绪高涨。认为不打日本没法过日子，打日本要当日子过。于是重新组织黄沙会，进行反资敌，抗拒日伪军。1941年腊月26日，他带领几十个村的黄沙会员，在刘池子村和日伪军拼搏，打死日本指挥官一名，伪军数名。在战斗中刘润常不幸壮烈牺牲，时年65岁，其弟刘润笃亦同时牺牲。此次战斗共牺牲六名会员，均被定为抗日烈士。

刘润常领导的黄沙会，虽有迷信色彩，但仍为当地人津津乐道，尤其对那种以长矛大刀和日伪拼搏的保家卫国、勇于牺牲的精神，人们总是充满着无比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红枪会与蓝枪会

红枪会的前身是黄沙会。聊东南的黄沙会是在四十年代初，因他们使用的武器——长枪（即长矛），枪头下佩有红缨，人们称之为红枪会。可现在人们一谈起红枪会，就有反感，认为红枪会是反动的会道门，把红枪会和汉奸相提并论。原因是汉奸陈玉怀、陈万泗、王殿明领导的红枪会杀害抗日干部，破坏抗日，干了不少坏事，所以汉奸红枪会，对人们的影响太坏了。实际上红枪会是农民自卫和武装团体，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也做了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李海村红枪会：正如上文所述，聊城东南李海村的刘润常领

导的红枪会，在二十年代末和土匪王金发拼搏，受到当时政府的表扬，人民的拥护。在四十年代初和日伪战斗中牺牲的红枪会会员，都被政府定为抗日烈士。

邢德安人民自卫团：1938年秋，聊东南人民自卫团团长是邢庄的邢德安，民团团员多数是红枪会会员（因当时农村青壮年大部分都参加了红枪会）。我当时虽未参加红枪会，但在人民自卫团内邢德安叫我当班长，班长成员多数都参加了红枪会。范筑先在东阿（今平阴县东阿镇）和日寇战斗打了胜仗，但我方也有伤亡。伤病员由东阿送到聊城县界王官庙，从王官庙送到王官屯，就是我们这些人抬着伤病员送到王官屯去的。

白凤仪人民自卫团：聊城沦陷后，聊东南土匪猖獗，横行无忌，此间各村红枪会又开始活跃起来，并自行建立人民自卫团，公推白凤仪为团长，团部设在王官庙。1939年农历3月28日，王官庙骡马大会，土匪王明君带领七、八人，公开在大会上抢掠，土匪们明目张胆地吃住在王官庙冷家店里，并悬梁拷打牛贩子。4月1日傍晚，以击鼓吹号为令，顷刻集合了千余名红枪会会员，将冷家店团团包围，战斗近一个小时，土匪全部捕获。除一名红枪会会员陈××受轻伤外，别无伤亡。匪首王明君被枪决，其余释放。是年冬，今朱老庄乡夏庄一带有一伙土匪四处骚扰，一天夜晚他们到聊东南赵寺大围子（这个村是赵寺、任庄、高庄三个自然村形成的）去架户，把任庄郭玉昌梆架带走。白凤仪得知，击鼓为令，顷刻间集合几百名红枪会会员，追赶至夏庄。在夏长法家里逮了两名王匪，经说合民团将土匪释放，土匪将郭玉昌放回。

以上情况说明红枪会并不都是反动，在社会动乱时期，特别是在无政府情况下，红枪会是农民维持社会治安的主要自卫武装。

下面我再谈一下被汉奸所利用的红枪会。

陈玉怀：他是距城三十华里的聊城东南于集乡花牛陈庄人，地主出身。在二十年代末，他拜刘润常为师参加了红枪会，当时叫

黄沙会。他曾带领老鸦陈团的红枪会，在土匪王金发占据聊城期间，抗拒过王部，打过土匪，为农民也办了点好事。因此在其附近村庄农民中，也稍有名气。1938年冬，聊城失守，日寇占领了县城。陈玉怀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联合其附近村庄的红枪会，成立了联庄会，暗中投靠日本，被日军封为联会剿共司令。这样他有了靠山，就着手扩大势力，大造声势，公开打起反共反人民的旗号。陈所成立的“民团”人们称之为汉奸团，他领导的红枪会，人称汉奸红枪会。

1937年秋末，有一辆满载日本鬼子的汽车，从东阿县城（今平阴县东阿镇）沿聊阿公路开往聊城。汽车走到姜楼洼中，被我军在青纱帐中拦截。战斗十分激烈，打死日本鬼子十儿人，汽车也被我军烧掉。其中有一名鬼子，被打得破头破脸跑到花牛陈，被陈玉怀保护起来。当时聊阿边还没有较强的抗日游击队活动，群众传说是范筑先二女儿的队伍打的（据说范二小姐的队伍，路经此地，是一次遭遇战）。这一仗极大地鼓舞了聊阿边人民的抗日热情，对日军是一威慑。从此之后，一直到日本投降，聊阿公路，交通断绝，日军再也没敢通过汽车。聊阿边后来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

当年夏末秋初，聊东南梁庄梁伯河和杜庄何器之，在孙堂周围开始组建八路军先遣纵队第一游击大队，被汉奸陈玉怀探知。一天早晨，陈玉怀带领几百名红枪会员，奔袭梁庄、杜庄，将梁伯河、何器之逮捕，并抄了他二人的家，又把梁、何二人带到花牛陈扣压起来。并严刑拷打，捆绑在猪圈里，后来通过人际关系将他们放回。之后，梁伯河重整旗鼓，急于报仇，于当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由徐翼四大队配合进攻花牛陈，结果战斗失利，梁伯河牺牲，陈玉怀红枪会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树上威吓人民。

当时白凤仪领导的王官庙，倾向抗日。在陈玉怀去抓抄梁、何二人时，白凤仪把全团所属武装，布置在王官庙以西洼涯上，准

备和汉奸团拼斗。结果陈玉怀没敢向东来，在洼西向东北走了。原因是白凤仪倾向抗日，和梁、何私人关系很好，白凤仪总以长者身份称他们器之、伯河。梁、何二人对白也很尊敬，虽不是至交，友谊却很深。梁伯河被陈团红枪会杀害，陈、白矛盾日益加深。

陈玉怀为了威胁白凤仪，显示他的势力，遂勾引据聊日军，向王官庙民团示威。1939年秋末，一天上午我刚走出庙院（团部防地），见十几名群众乱往南跑，并叫喊“鬼子来了”。我向南跑了几步，大声呼“不要跑！不要跑！”回头一看，在王官庙东头离我百米处，有三、四十名日本鬼子，排着队向我走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日本鬼子），我只好故作镇静。他们来到古戏楼大杨树下，搭好枪架，还有两三挺机枪，两门迫击炮，把帆布衣铺在地上都躺下休息了。我趁机溜进团部，报告白凤仪：二大爷（同乡称呼），鬼子来了。他说：敢快把枪藏起来。顷刻，有一名翻译官通知开会。接着翻译官和日本指挥官，站在庙台上给我们讲话。讲的是：大东亚共荣圈，共存共荣。并说“你们不要反对日本，日本是来救你们的，还说了些安民的话（意思是只要不抗日就能过安生日子）。尔后，日本指挥官和翻译骑着大洋马，领着日本鬼子走了。他们驻扎在沙店集，约有月余。陈玉怀趁此仗恃日本的势力，在他家花牛陈庄修筑了据点——这是日伪在聊东南，首次安设的第一个日伪据点，经常有日本鬼子十几人住在里面。

从此之后，陈玉怀势力不断扩大，他自任红枪会总会长。分会长一个是花牛槽村陈万泗，一个是官路村六阎王。他们朋比为奸，肆无忌惮，不断杀害我抗日人员。并责成命令只要在他们势力范围内，不准八路军进驻，不缴柴米；村内有八路或抗日人员不报告者，以通匪论处，致使我抗日政府初建时很难开展工作。为此，1940年麦前，一二九师骑兵来聊东南活动，攻打了红枪会。致使陈的红枪会基本瓦解。陈玉怀住在据点内，没有日本鬼子和汉奸队的保护，他是不敢出门了。后来这个铁杆汉奸和东阿汉奸

刘德超联合扫荡聊阿边，在王官庙汇合把白凤仪的家给烧了（此时，王官庙民团团长白凤仪在八路军的帮助下，建立了运东抗日游击大队，白任队长）。1944年底，陈放弃花牛陈据点，逃往聊城；另一说他逃往泰安，死在那里了。不管如何，他的尸体埋在了花牛陈，并被群众撒骨扬坟了，可见人民对其恨入骨髓。

王殿明：他是今城东许营乡小店子村南王庄人，是聊城东部红枪会总会长。1941年开始活动，并成为城东一霸，人称“东霸天”。凡没有红枪会的村庄，他带领红枪会员，就吃住在该村，一直到该村同意参加红枪会才算完结。他就是这样用强迫入会的办法不断扩展其势力范围，并和日寇勾结，配合日军推行强化治安的“囚笼”政策，公开反对我抗日民主政府。在其控制的红枪会村庄，不准抗日人员活动，不准抗日游击队进驻，拒缴抗日救国公粮，并叫骂什么“几个土八路能成什么气候？！”1944年春，被日军委任为区长兼剿共班长，在城东军王屯修筑据点，大围子内又修筑三个小围子。每天有汉奸红枪会会员轮流站岗放哨护卫着他，给他助威。1944年8月，我抗日政府决定，由公安局副局长张宗谦指挥，挑选英勇机智的公安战士代伯明、杨全玉和武工队长韩学水三人，化装成农民，伪装找区长打官司，冲进军王屯据点，将王处决。至此城东汉奸红枪会基本瓦解，我四区抗日政府的工作，才迅速开展起来。

蓝枪会：1941年，红枪会会首陈殿贞也开始活动。陈、王为扩展各自势力，两派之间矛盾很深。陈殿贞为了区别王殿明的红枪会，就在标枪头系蓝布为枪缨，命名为蓝枪会。陈殿贞是城东许田庄人，因军王屯左右是王殿明红枪会的势力范围，他领导的蓝枪会便向北发展。一、两个月的时间，便很快发展到城北冯庄、周堂等村，向东北发展到茌平县的邱子张、金家楼一带。当时陈还没有与日伪勾结，因之我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侠亲自做陈的工作，并达成口头协议，他们的地盘我们也可常进常出，互不干涉。

但在1942年初冬，日本鬼子到二区（于集区）太平庄一带安设据点时，陈也派出一、二百名蓝枪会员去给日本汉奸助威。到1946年春，孟阎庄蓝枪会分会长高文廷，将我五区区队副的通讯员杀害。陈殿贞也暗中进行反共活动，1947年秘密联络附近村的蓝枪会立皇帝、封大臣，并刻玉皇大印。计划首先杀村干、区干，继而进攻聊城推翻民主政府，暴动时间定于1947年3月28日晚，集合地是蒋官屯小刘庄。适被朱庄农会干部朱正玉发觉，后经政府查实，先后逮捕了陈殿贞等首要分子。1947年5月，在蒋官屯召开公判大会，予以镇压，蓝枪会彻底瓦解。

综上所述，黄沙会、红枪会、蓝枪会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初期社会动乱的产物，是农民自卫武装团体。反动与否主要看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如果领导权掌握在好人手里（如农民刘润常）就能为国为民办些事，如果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里（如地主陈玉怀、王殿明、陈殿贞之流）就会为国为民造下罪孽，成为众矢之的。

现在武装会道门，早已绝迹。我把他们的历史情况予以记录，供人们参阅，不当之处，望指正。

注 释：

①跪香、接驾：黄沙会员每天晚上，必须到佛堂（神坛）去焚香跪拜仙师。有的黄沙会虔诚信徒，双手并拢，闭着眼跪着跪着，便呼哧呼哧大喘气，接着双手拍地而起。扶乩人赶快把他扶起，问哪方打座？哪架仙师？该人如说：北方打座就坐在北边，南方打座就坐在南边，他说是什么仙师，就是什么仙师（这叫神仙附体），多数是关公、周仓、狐仙之类，问他什么，他就嘟噜什么，不问了或者再问不说话了，扶乩人就烧张黄表纸说：望仙师代表回宫，果真这个人睁开眼又明白了。我曾和一个会接驾神仙附体的人谈话，他说：是胡闹着玩，人要装啥像啥。由此可见，接驾神仙附体，纯是欺人之谈。

（裴 蓉 整理）

聊城东部的红枪会

马毓山 周庆月

抗日战争时期，聊城东部发展起来的红枪会，是群众自卫组织。开始以看家护院为宗旨，后来，由于总头目反动本性难移，不接受党的领导，致使背叛了宗旨，扭转了斗争方向，趋向反动。直至投靠日伪，死心塌地充当汉奸走狗，给抗日政府造成了极大危害，终被我人民政府所消灭。

一、红枪会组织梗介

聊城东部的红枪会分红会和蓝会两派。红会王殿明为总头目，以小王庄（现属许营乡）为中心，蓝会陈殿贞为总头目，以徐田庄（现属许营乡）为中心。一个村有几个会员，就设立一个小头目，建一所小佛堂。较大村镇就设立个分会，建所大佛堂，如军王屯、蒋官屯等。几十个村镇，连上边区县，就设立个总会。

开始，红枪会是以落后的宗教封建迷信为形式，以看家护院为内容的乡村群众自卫组织。入会者均是身强体壮的男性小伙，其中良民居多，也杂有地痞、流氓之类。王、陈两派发展会员都是采取强迫的办法。如1942年闹灾荒时，他们各自调动几百名会徒到村里发展会员，不入会，就住在村里不走，强迫群众供给吃的。所以他们很快扩散开来，在一、二个月内就发展到城北冯庄、周

堂，向东发展到茌平县的邱子张、金家楼一带。

红枪会的活动一般是夜聚昼散。聚时升坛拜佛议事，耍枪弄刀。说什么，把符贴在身上，或烧成灰服下，枪刀不入。红会会员用的枪刀均系红缨，每人还佩带一个月白色的兜肚，按他们的说法，能防避枪刀。蓝会会员用的枪刀均系尺余长、寸余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布条，因此，在群众中有“破铺衬会”之称。

王、陈为首的红、蓝两会，即对立又联合，时合时分。合时共同抗击土匪老杂；分时为扩大势力范围都企图吞掉对方。他们以城东小店子（现属许营乡）为界，红会发展南片，蓝会发展北片。各自控制着百十个村庄，会徒均有千余人。

后来王、陈两派红枪会都抛弃了看家护院的宗旨，不接受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后并趋向反动，直至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这是由王、陈反动本质所决定的。王殿明认贼作父，一心投靠伪敌往上爬。他控制的村庄，不准我抗日人员进入，更不给我军缴纳公粮。对我军抗日活动，扩大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为此，我抗日政府配合敌工人员，于1944年8月，计入军王屯（现属柳园办事处）据点，击毙了这个号称“东霸天”，作恶多端的伪区长、红枪会头子。1947年大参军时，陈殿贞妄图组织武装暴动，推翻人民政府，被我人民政府所镇压。

二、履行宗旨 看家护院

红枪会成立初期，按照看家护院的宗旨，为维护农民生命财产，进行了一些活动。

“亮团”活动：那时盘据在聊城的不仅有日、伪、顽，而且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土匪。他们经常出没在农村，对农民进行敲诈勒索，残害百姓。

所谓“亮团”，就是陈殿贞组织会员，经常聚众示威，显示自

己的力量，以向他们发出警告，达到震慑他们的目的。

据说，当时有两次大的“亮团”活动。一次是去城东蒋官屯；一次是去城北郑家坑一带。两次聚众，都在万人之上。

徐田庄自卫战：1941年的一天，三支队头目魏宪梅带领百余名队员来徐田庄进行敲诈。他们来到该村围墙西门外，首先绑架了会员陈守仁，并且封死了西门，堵住了要道。这时陈殿贞正与红枪会头目夏长清商谈护庄的对策，当他们得知会员被绑架后，随即击鼓聚众。会员们群情振奋、斗志昂扬。陈带领会众和村民奋不顾身地提枪背刀登上围墙，指挥战斗。

战斗打响了，围墙外杀声连天，土枪声、火炮声、步枪声、榴弹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一支会员小分队突然从小南角门冲了出去，转到西门外，利用长枪、挠钩、土枪、火炮，对准敌人一阵撕杀，救回了陈守仁。这时，四外八乡的会员闻讯赶来，三支队腹背受击，难以支持。由于来兵地理生疏，加之夜幕已经降临，混杀之中迷失了方向。所以阵势大乱，指挥失灵。他们呼爹唤娘，抱头鼠窜，各自逃命。会员们又是一阵追杀，结果挑死了几十个人。

这次护庄救人的自卫战斗，不仅保住了全村人的生命财产，也鼓起了会员们看家护院的信心和决心。

武堂村红枪会枪挑三支队员：1941年孟冬的一天，三支队头目李汝义、蒋如堂、季怀功等十三人，全副武装，从往平县的王鄂庄来到武堂（现属许营乡）。一进村便扬言道：“李三瞎子家里藏着一支枪，必须交出来。”李本是王殿明的红枪会员，该村红枪会员听说此事，都赶来周旋。一方面笑脸相迎：敬茶、敬烟、摆酒宴，以客相待；另一方面暗暗派人去给王殿明送信。

宴席上，李汝义说道：“请不要误会，小弟是奉命前来起枪的。”说着随掏出信件，两手一摊，放在桌子上，同时显露出高傲气盛、目空一切的神情。“你们不要怕，如果不放心，可把枪交给你们。”

说完，来人全把枪解下来扔到红枪会员面前。这时有人大声喊道：“王老师（殿明）已到！”另一个会员把拳头一挥也高声嚷道：“还不动手等待何时？！”他声音未落，在场的几十名会员不管三七二十一，挺枪舞刀，对准来人，拼命厮杀，血肉横飞。来人枪不在手，无械还击，只有等着挨枪挨刀。当场七、八个人死于枪刀之下，其余人员抱头拼命奔跑，红枪会员紧紧追杀。

据当时群众说，事过两、三天之后，在附近大石槽村的白菜地里还躺着一具尸体。季怀功因伤势过重，逃到家很快死于非命。这次起枪的三支队员，活着回去的了了无几。

点道师顾延仁中计身亡：在平县日伪县长李希山与该县老范庄据点的汉奸中队长何连芝，害怕陈殿贞领导的红枪会闹到他们的头上，决计对其进行瓦解。于是暗暗买通了该会叛徒杭兰亭。

1943年5月25日，杭奉李、何旨意跑到红枪会点道师顾延仁那里诱说：“李、何愿与红枪会和好，已把我们要捉的伪区长刘学忠、副区长迟学盈逮住，并打算交给咱们处治，盼望会里派人去领。”

顾听罢，未加思索，便亲自带领会员张金见、李乐礼、杭宝太来到老范庄伪据点。那时何已设好“鸿门宴”，听说红枪会派人来了，假装出门迎接，进屋后热情让座，酒宴款待。宴席上，没谈几句话，甚至有的端起酒杯还未放下，何便把酒杯一摔，旋即伏兵四起，几支枪口一齐对准顾等人。一阵枪声，除叛徒杭兰亭外全被打死，顾的脑袋还被割下来在老范庄城门上悬挂了好几天。后来，把张、李的尸首运回，唯顾的不让往回拉。一直拖了一年多，才托人把顾的骸骨要回来。

事后，杭兰亭逃之夭夭。陈殿贞为了给被杀的会员报仇，捉住了杭并将其活埋。

夏连台攻打周庄伪据点：聊城东南周庄伪据点的日伪军们，经常出来，四处扫荡，鱼肉百姓。

蓝会头目夏连台决定聚集会员，去攻打这个伪据点。由于会员们纪律松弛，行动不一，早动的已接近据点，晚动的还没走出村庄。更可笑的是，夏连台被迷信冲昏了头脑，满以为有神佛护体，就可以所向无敌，战胜一切。所以他鲁莽行事，草率出击，抢先跑到最前头，单枪匹马奔到据点之下敲门喊话。伪军对准来者，开枪射击，打死了夏连台。待后边的会员赶到，夏躺在地上，尸体已凉了许多时。会员们见头目已死，形势不妙，都四散逃命去了。

三、投靠日伪 走上绝路

日寇攻占聊城以后，为国捐躯的将士达六、七百人之多，还有几百殉难居民。在这民族存亡之际，党领导人民奋起抗日。而王殿明、陈殿贞所把持的红枪会，反而对我抗日民主政府造成很大危害：尽管抗日民主政府耐心教育争取，但终未奏效，直至走上绝路。

“拉陈打王”的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1944年，抗日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但是城东红枪会仍在继续活动，特别是王殿明一派，尤其猖獗。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党的团结抗日的政策，对王、陈两派红枪会进行了具体分析。

陈殿贞十分迷信，听从城北孟闫庄本道内一个“天眼”的话。当时，他还没有与日、伪挂钩，对人民政府也没有真正敌意。

王殿明，投靠日伪甘当汉奸走狗。他控制的村庄一不交公粮，二不准抗日人员去活动。抗日民主政府给他讲团结抗日不做亡国奴的道理，他听不进。他还统一布置所控制村庄：凡抗日工作人员住在村里，就吹号击鼓，使其不得安宁；同时采取强迫入会的办法，向我游击区甚至根据地边缘发展红枪会，和日寇的“封锁”、“囚笼”政策紧密配合。抗日民主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反复进行教育争取，他始终执迷不悟，并扬言说：“八路军那么几个人，

连枪都没有，成不了什么气候。”因此，他拼命地反对我抗日民主政府，亲自带领红枪会和伪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1944年春，王又当上了伪三区（区部设在城东军王屯）区长，更死心塌地投靠了日伪，给抗日活动设置了极大的障碍。

针对以上情况，县抗日民主政府作出了对陈采取教育争取，对王非打不可的决定，当时提的口号就是“拉陈打王”。

根据这个口号，县长张侠亲自前去做陈的工作，向他宣传党中央抗日政策及抗日形势，揭露日寇残害人民和汉奸走狗卖国求荣的罪恶。通过耐心艰苦地谈判，达成了口头协议。从此，陈所控制的地盘，我抗日工作者可以常出常进，从而扩大了抗日活动范围，粉碎了日伪对我们的封锁。对王殿明，抗日政府配合敌工人员，计入虎穴，除掉了这个作恶多端的民族败类。

“拉陈打王”这个口号，在当时大大促进了抗日形势的发展。一方面分化瓦解了反动势力；另一方面落实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力量，粉碎了日伪的封锁进攻；第三方面，为民除了害，振奋了人民抗日斗争的精神。

红枪会头子毛怀荣被击毙：抗日战争后期，大李官屯村的红枪会头子毛怀荣，派人四处奔走，到处侦察附近地下共产党员的活动情况，一心杀害王成英同志。

王成英同志与毛怀荣同村。那时王的公开身份是土山寺乡伪乡长，实则是地下共产党员，是我党派进去的地下工作者。他认为毛怀荣这只恶虎不除，党的工作就无法开展，甚至连党员的生命都无法保证。所以党组织决定，坚决把他除掉。

这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王成英早就派人侦察到毛带着护兵孙成林骑着马去了绣衣集（现属许营乡）。所以他组织人员预先埋伏在冯庄（现属蒋官屯镇）村东石庙北青纱帐里。

日头刚刚偏西，毛怀荣骑着高头大马和护兵从东南方向飞奔而来。他一进入射击圈，伏兵早已瞄准了这只恶虎。只听一声枪

响，毛便一头栽到了马下。护兵孙成林见势不妙，手使双枪，边打边跑。毛怀荣被除，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陈殿贞组织暴动未遂被镇压：日寇投降后，陈殿贞带领部分会员，死心塌地充当了盘据聊城的汉奸头子王金祥、赵振华、郭培德的走狗。他整天耀武扬威，欺压百姓，专门与共产党、八路军作对。

1947年，我党领导的大参军刚刚开始，陈殿贞便与其子陈守印伙同刘殿银等部分会员，破坏大参军运动。他们利用宗教迷信，结党营私，妄图颠覆共产党，推翻人民政权。一方面扩充人马、组织力量，私蓄军火；一方面伪造皇帝玉印，赶制龙衣蟒袍，伪设三宫，竟封麻庄（现属蒋官屯镇）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为皇帝，同时还封了大臣等。

一天夜里，陈组织会员在一个苇坑里宣布了当夜的武装暴动计划：首先炸毁八路军驻大李官屯（现属蒋官屯镇）的兵工厂，紧接着袭击共产党的王家行（现属蒋官屯镇）区部。宣布计划时，被过路的农民朱正玉听到。陈发觉后，派人追赶。朱一口气跑到大李官屯，报告给了驻该村的工作组长郝霞同志。郝采取紧急措施，做好了反暴动的充分准备。正因为如此，陈的武装暴动计划未能得逞。

后来，我人民政府设计对陈等一网打尽。同年，在蒋官屯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布了他们的罪恶。对陈殿贞父子等十七名分子，实行了镇压。

聊城宗教史略

傅 延 海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是较早传入聊城的三大宗教教派。下面从各教传入时间、发展及现状作以简略介绍。

一、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回族等十个少数民族群众信仰的宗教，自元代回民开始在聊城定居后传入。清真寺是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做礼拜的场所，也是从事宗教教育和办理宗教事务的地方。聊城在建国前有 8 座清真寺，即聊城西寺、东寺，蒋庄南寺、北寺，张炉集东寺、西寺，白庄清真寺，齐楼清真寺。每寺都有阿訇主持宗教活动，料理婚丧嫁娶事务。1958 年进行宗教改革，将 8 座清真寺保留 5 座，即聊城一座，张炉集、蒋庄、白庄、齐楼各一座。“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宗教被视为迷信活动加以废除。聊城所有清真寺均被关闭，有的被拆除，有的被街办工厂、生产队占用。匾额、碑碣、经卷均被毁坏，阿訇被安排当售货员或回家务农。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的错误，恢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清真寺重新开放，请回了阿訇，宗教活动得以恢复。

1985年以来，聊城市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分别给城镇、白庄、齐楼、蒋庄、张炉集五座清真寺拨款8万余元进行修缮，以保证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及宗教活动的顺利进行。

二、天主教

天主教于1699年由北京教区主教（意大利人）来临清传教，逐渐传入聊城县。1928年由济南教区分出山东省第一个华籍教区——西北教区，后改为临清教区，1933年经罗马教廷批准成立阳谷教区。两个教区的形成，对于在聊城县境内迅速扩大天主教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鲁西北大旱，因生活困难信徒骤增，天主教发展至鼎盛时期。

1903年德籍孔神甫来到聊城南关，在教友家中居住，领导过宗教活动。后在古楼东北白衣堂街买了万姓大户的房产一处和其他近邻几家的住房作为天主教堂，由德籍费神甫接任管理。经逐年修建，发展至后来的圣堂、楼房、教堂、医院、传达室，计房屋124间，聊城解放初期，1948年5月为哈利生第二分院医院（地区人民医院前身）建院使用。1958年迁出后，又为聊城地委印刷所使用。

南关街天主教堂于1906年由荷兰人马利诺神甫建成，有教堂一座，房屋几十间，并管理教区教务。1912年后，由意大利人葛神甫及七任德籍华人神甫管理教堂及教务至解放。

在城东小店子村，有教堂一座，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立四新时，被“红卫兵”拆除。城东北任白村建有教堂一座，规模较小，在聊城解放初期，被群众扒掉。

建国后，宗教界积极响应全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把敌视中国人民、坚持反动立场的外国传教士驱赶走。1957年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教徒的宗教活动逐步恢复，南关教堂及部分房产还给

教会；地区人民医院（哈利生医院）占用的白衣堂天主教堂的房产，由人民医院付出租费。1958年大跃进时，人民医院租款停付。“文革”期间，教堂被扒。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信仰自由的政策进一步落实，恢复了城内的南关教堂和许营乡的小店子村教堂，经常入教堂的信徒达270多人。

三、基督教

基督教在聊城称耶酥教。解放前，聊城亦有通圣会、圣公会两个教派。通圣会是势力较强的一个派别。1908年美国传教士陶纯谷德维复由河北大名县经冠县、堂邑来聊，选择地势高，东靠运河、西沿丁家坑、南邻山陕会馆的双街作为传教基地。购土地20余亩，经10年修建，建成了能容千余人的双层礼堂及西式洋楼两座，中式楼一座，附属房屋160余间。为发展教务，并办起了培德小学，兼设中学班附设圣经班。历经数年，教务有了很大发展，成立了聊城通圣会总会。为扩大其影响，春、秋农闲季节都举行“奋兴会”，由牧师主讲基督道理，以激励人心而信圣道。1926年春季召开大会，由陶纯谷主讲，参加者不下千人。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很多避难的劳苦百姓加入教会，每逢礼拜，教堂内座无空席，信徒多达千人，此时为通圣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圣公会为英国教派，1874年后由英国斐教士首来聊城传播圣公道理。斐来后暂住闸口南赵兴店，后在此西购置宅基一处，建4间北屋，3间南屋，外加一教堂，竖挂“中华圣公会”的牌子。1915年设总堂于聊城，教务开始发展。圣公会教堂建于闸口南太平街西段，1921年以后开设教徒学习班。1918年创办文德小学，1922年扩充。隔路与教堂相对，占地十余亩。校院内有教室、宿舍、伙房、操场，入学者为教徒子弟，必修宗教功课，参加宗教活动。1932年文德小学在县教育行政机构备案，改名聊城私立文

德小学，教务由教育局适当调整，并招收非教徒子弟入学，逐步废除宗教课目。1940年由于当时的政府干涉和英教会资金断源而停办。

三十至四十年代，由于战争频繁及土改运动的开展，大部分基督教房子被没收占用、拆除，宗教活动转移到个别信徒家中。1957年统战部及民政部门根据有关政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发还了部分宗教房产，受到教徒的欢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落实中央宗教政策，基督教活动逐步纳入正常轨道，发还了宗教房产，暂时不能发还的建立了租赁关系。近几年，聊城市基督教有11个宗教点，教徒千余人，分布14个乡镇办事处，几十个村庄、街道。1989年8月14日，在双街教会点召开了基督教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自养、自传”领导小组及负责人。

（莫玉山 整理）

浅谈聊城穆斯林的三大节日

沙德昭 薛守鼎

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有三个：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伊斯兰教什叶派还有自己的节日，阿舒拉日是为纪念阿里次子侯赛因殉难，在伊斯兰教历一月十日；法蒂玛节（也称“姑太节”），是穆罕默德之女、阿里之妻法蒂玛纪念日，在伊斯兰教历六月十五日。我们聊城穆斯林一年一度的主要是前三个节日，现略述如下：

1 开斋节 “斋”，亦称“闭斋”、“把斋”（注），即每年在伊教历九月斋戒一月，斋月内每日从黎明到日落禁止饮食和房事等。定九月为斋月，是纪念《古兰经》首次在此日“降示”，以及穆罕默德在此日受真主之命为“使者”。开斋前，要先在日落后“望月”，看到月牙，次日即为节日，一般在伊教历十月初二前后。

开斋节这天，饮食等一切恢复正常，各家都用上“巴兰香”。穆民们刷完牙，洗净全身，换上新鲜衣服，手持“巴兰香”，拿出“菲特尔”——或一升枣、或一升葡萄、或半升小麦、或一升大麦，结帐亦可。教规要求，每个闭斋、有条件的穆斯林，必须拿出以上东西送到寺内，寺内负责人再将其分送给贫穷的老弱孤寡或南来北往的穷苦穆民。上殿时，要“赞主”三次方可入内，面西听阿訇开经；毕后，做“堵洼夷”。接着阿訇宣讲教义，做礼拜：让七人或九人站立，七人时要各念九遍“赞圣”，九人时要各念七遍

“赞圣”，总计六十三遍（因穆罕默德享年六十三岁）。毕后，统一起立，听阿訇“传说”：一拜四“抬手”，二拜三“抬手”。阿訇上“敏白播”念“呼图白”（意为宣讲）。毕后，再做四拜，接做“堵洼夷”，互道“安宁”，下殿。回家后做“油香”，送与近亲或贫穷人，以庆节日。

近年来，伊协要邀请上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人，各级宗教事务部门负责人和其他民族中信仰伊教的穆斯林，共贺“开斋节”。先由领导人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阿訇宣讲教义；管委会主任致词答谢。毕后，大家济济一堂进行会餐，欢渡节日，非常热闹。

2 古尔邦节 古尔邦节亦称宰牲节，伊斯兰教规定，凡身体健康，旅途方便，并且有经济能力的男女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应去麦加朝觐克尔白一次。朝觐活动在每年伊教历十二月上旬举行，最后一天（十二月十日）即为宰牲节。当日要先闭斋，然后再往清真寺做完礼拜（仪式同“开斋节”差不多），方能吃饮、宰牲。有条件的，每人一羊，七人一牛，九人一驼；使其头朝南，人面西（麦加方向），颂赞主的尊名，然后开宰。宰后分三份，自留一份，送近亲一份，给贫困无奈的一份。

3 圣纪节 圣纪节是纪念穆罕默德诞辰（伊教历三月十二日）的节日。是日，全体穆斯林齐集到寺内，先宰牲（牛、羊、鸡等），阿訇开经。下午一至二点上殿做礼拜。毕后，圆经，做“堵洼夷”，下殿集体会餐。饭后，大家再做“堵洼夷”，互报“安宁”。至此节日结束。

注：

“闭斋”有个例外：凡家中贫困无法过活的；有事外出的；怀有身孕的；老迈病弱的可不“把斋”。除难以维持生计这种情况外，生活上有条件的，每个人要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用，散给贫穷人，让他人代替“把斋”。

（根据沙教长口述整理）

聊城回教中饮食婚姻丧葬考略

沙德昭 薛守鼎

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我国旧称伊斯兰教为回教、天主教、清真教。她以其伊斯兰两目精深博大的教义而在中国拥有众多的信徒，根基非常之深。单说生活方面，就有一些具体的规定，如饮食、婚姻、丧葬等，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社会和宗教根源，成为传统的风俗习惯。

1 饮食 伊斯兰教以洁净为相宜，污浊的受禁止。饮食上，不吃死物、血液、猪肉、未诵安拉之名而宰杀的牲畜等。还有禁酒，这在《古兰经》中都有明文规定。在当时，这不仅是对古代回族人饮食习俗的承袭，而且还有所改革。在同是回族人的犹太教中，就禁食猪肉，《旧约》中说：“猪因蹄分两瓣，却不倒嚼（亦即反刍），就与你们不洁净”（见利未记八章7节），规定只有蹄分两瓣，且倒嚼的走兽之肉才是洁净的，一般指牛、羊、鹿、驼等。从客观事实上看，阿拉伯半岛大部地区的干旱酷热气候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适于养猪，因其极易发生瘟疫传染病之故。再者是鸟禽，必须是带脸的，如鸡、鸭、鹅、鸽等；水生物必须是带鳞有腮的。由此看出，广大穆斯林在饮食上颇多讲究。伊斯兰教的禁食制度千年来已为穆斯林所遵循，成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应受到尊重。但是，《古兰经》中还提到，如“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份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

过”(二章173节),这是一种遇特殊情况,势迫而不得已下的变通办法。

2

婚姻 伊斯兰教教徒相信“前定”,即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都说成是由真主预先安排好的,离不开真主意志的决定,婚姻自不例外。从其成婚到结婚,大体经过是:1、凭双方父母同意婚姻之事。媒人说合时,双方父母如若同意就点头或微笑,反之,就离身不言而出。2、凭男女情愿。旧时男女不能晤面,但必须以双方同意为前提,不能强制。3、凭言定的聘礼。旧时只送二个或四个银钱(银元)做聘礼。4、凭两个作证人的作证(证婚)。5、结婚。庆贺典礼,大家凭好与吉庆的言语祝贺新人。填写结婚文卷,要依次写明双方父母名字、新人名字、聘礼的多少、两个阿訇和两庆贺人(代表)的名字。请寺内阿訇念说贺词(首段),毕后让女方父亲或近亲念说“达旦”(意谓我将女儿嫁给了他——女婿),阿訇再念说中段,叫男方新人(女婿)念说“亥必劳图”(意谓我诚领你的女儿了)。接着,阿訇把枣、栗子、花生撒在男方新人的头上,继之念说末段赞词。全体在场的“捧手”(双手做捧状至胸前),做“堵洼夷”(意谓赞美真主),随后入席。饭毕女方(包括女新人)回到“送娶”时的落脚点(停歇的地方)。翌日,再送女新人至男家,稍事招待后,送亲人就回去了。

3

丧葬 一俟人咽气后,立即将亡人尸体放在“水饭”(特制的木板,上有一枕头)上,趁机将亡人手脚捋直,在其脖下放一毛巾使嘴闭住,捏闭眼睛。用7—8尺白布盖住尸身不让人看到身体,点上“安定香”(禁止吸烟喝酒人靠近),男女孝子跪哭。亡人一般放置1—2天即行安葬。殡葬这天,请阿訇和净洗人到家中,对亡人进行“净身”。阿訇在门外诵经,2—3个净洗人在屋内用肥皂、碱面、温水将尸身洗上三遍,身上每个汗孔都要洗净,并用棉团蘸水将鼻孔、嘴擦净,上下擦干。接着,放置好“旱托”(同“水板”类似),把大开幡(8—9尺白布)、小开

幡（5—6尺白布）、皮拉罕（7—8尺白布——根据亡人身高上留一洞，以套过头为宜，前盖住脚，后遮住臀）和3个兜袋（宽6—7寸）放在“旱托”上铺好，用冰片、潮脑、麝香撒在上面，枕内填入花椒（以避臭虫）。将尸体放在上面，戴上白帽，把亡人上下用布裹缠好，再用兜袋扎住，把护心堵洼夷（写有经文的白布）放在亡人胸部，用“塔卜”（特制的木匣）罩住，南北放置。请阿訇、寺内人员入内，立于东侧面西诵经，毕后即行出殡。将“塔卜”放在“架子”（为抬“塔卜”而特制）上，亲朋街坊每人手持一支“巴兰香”（以避烟、酒气、秽气等）在前送殡。男孝子、亲戚“上坟”，街坊适时而回。到坟地，抬下“塔卜”，将亡人平放进坟穴（注）里面。阿訇手拿三个土坷垃念说苦碌海堵洼夷，依次放在亡人的右肩头、右手下、右脚下，随后盖板〔用土坯（今用水泥板）挡住洞口〕埋葬。阿訇接着念说《古兰经》，毕后，众人做节堵洼夷，大家念说阿米乃（意谓应答求祈的主）。至此，殡葬结束。

注：

事先掘—2米×1米×2.5米的方坑，然后根据亡人身高在底部水平掘挖而成的洞穴。若坟地所处地势低洼，则在坑底用砖石砌一方槽即成。

（本文是在沙教长口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

聊城县乡土民情录

聊城县殷微子国，周为齐聊摄地，汉置聊城县，明清皆为山东东昌府治，民国废府留县，为东临道治。

治地 大县。

县境 东至茌平界绣衣集二十五里，南至阳谷界徐集十八里，西至堂邑界十八里堡十八里，北至博平界三官庙二十五里，东北至茌平界王店堡二十五里，东南至东阿界界牌庄四十里，西南至莘县界吴楼六十里，西北至堂邑界田家园三十五里。

面积 三千四百二十方里弱。

地势 全境尽属平原。

村庄 八百零九。

重镇 沙镇、周家店、李海务、顾官屯、蒋官屯。

官署 道署县署，均称整齐。管狱署系租民房，警察署系借庙宇，规模狭隘，不壮观瞻。

人口 统计十八万二千四百七十七人（据知事王汝汉调查）。

男丁 十万三千五百九十九丁。

女口 七万八千八百七十八口。

田亩 实在征粮田亩九千五百六十八顷六十六亩六厘六毫。

赋税

地丁 六万零三百五十二元。

田赋附税 六千零三十五元。

漕折 四万二千九百九十二元。

租课 一百八十八元。

地方附捐 一万六千四百五十九元。

酒税 四千二百二十七元。

烟税 三百四十七元。

课程 四百二十七两五钱九分六厘。

五香咸菜捐 二百元。

牛皮捐 三百元。

黑枣捐 六百零八元。

民情

善良 服习俭朴，不染奢华。

恶劣 个人权利思想较重。

贫富 富者无多，但贫者也能自给。

婚嫁年龄 在十八、九岁左右。

特性 民性迟缓，处世和顺。

警察

警区 城区一，东关一。

名数 警佐三员，警察六十名。

警款 每年四千三百四十一元。

教育

学区 八。

学校 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一，省立第二中学校一，道立模范两等学校一，女子学校一，县立师范讲习所一，高等小学校一，乙种蚕业学校一，两等小学校一，国民学校一百二十五，女子学校二，道立通俗教育图书馆一，讲演会一，露天学校一，县立通俗图书馆一。

学款 年约一万二千元左右，以附捐收入为大宗（省立道立学款不在此内）。

私塾 二百五十余处。

毕业人数 留学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一人，法政大学速成科一人，东京农业大学一人，北京大学一人，山东法政专校十人，农业专校二人，高等师范六人，初级师范十五人，单级总所六人，单级分所一百四十五人，小学教员讲习所四十五人，师范讲习所三十三人，高等学校五人，中学十六人。

学龄儿童 一万三千四百八十一，已入国民学校人数二千七百三十，已入代用国民学校人数一千八百零一，未入学校人数八千九百五十。

农业

农会 县农会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成立。

农产 五谷、花生、山芋。

林业 旧有树二十余万株，以枣柳为多，杨榆槐椿次之，近又栽四万九千九百六十株，此外尚有官种树九千四百二十五株，簸箕柳一千一百墩。

棉 间有种者。

蚕桑 乡民饲养家蚕，仍用土法，已设桑园二处，共植桑一千三百株，每年出丝约七十余斤。

牧畜 牛（约三万四千头）、羊（约一万三千只）、猪（约一万口）、驴（约七千头）、马（约一千二百匹）、骡（约一千匹）。

特别出产 柏、菘（白菜）、萝卜。

工业 贫民工厂一处（专制布疋衣履及纸张等），每年所售之货约值万元。

普通工业品 笔、罗绢、鞭炮。

特别工业 印刷书籍、染色纸、熏枣（销路甚广）。

新发明物品 南乡木工，新制大珠算盘，颇为学校乐购。

商业

商会 县商会于清宣统元年七月成立。

商号 公司七（大小），商铺共一百二十。

商业状况 自运河不通舟楫，商业日见萧疎。

出入货品 输出品，黑枣、槐花菜、五谷；输入品，京货、红白糖、糯米、铁货、绸缎、玫瑰烟叶及外国之煤油、火柴、洋布洋货等类。

金融 不甚流通。

会所 孔教会（在文庙内）劝学所。

交通 交通不甚便利，城内设有邮局，沙镇、周家店均有邮政代办处。

山川 境内无山，运河、徒骇河均已干涸。

古迹 聊城县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春秋齐邑汉置县），武水县故城（在县西南四十里，隋开皇十六年置），博固城（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晋石勒所筑），畔城（在县西晋义熙十三年魏兵为刻裕将朱超石所败退走畔城），鲁连台（旧在县西北十五里故城中，今在县东门外），绿云楼（在县城西北隅本宋自公亭故址，元九年总管徐世隆改建），公惠堂（在府治内宋熙宁初建），灵芝亭（在县西南四十五里，本宋武水镇巡检讲武亭大观初芝生于梁因名），高阳氏陵（在县西北二十里），巢父墓（在县东十五里），聂政墓（在县境），刘实墓（在县东二十五里实晋太尉）。

金石 博州重修庙学碑（王去非撰党怀英篆额碑阴王遵古撰李谷篆额并王庭筠行书大定辛丑二十一年在府学内）。

宗教 佛寺二十八，道院三十，天主教堂，在城内及南关信徒约百余人，耶稣教会在运河涯信徒最少。

（莫玉山 摘自《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题目编者加。）

聊城古城墙

吴云涛

当今，“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已成为聊城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漫步环城湖畔，远眺参差林立的楼群，不禁令人想起湖中环抱的古城，想起古城的城墙。

聊城古城墙始建于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规模不大，由土堆砌而成，象现在农村中的土圩子。到了三百年后的明朝，太祖朱元璋认为“做皇帝非深沟、高垒、内储外备，不能为安”（洪武实录卷四六），遂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的政策，在全国各重镇要隘，大筑其城。当时聊城是南北通衢要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朱元璋采纳丞相刘伯温的建议，在洪武五年，特发国币，令东昌守御指挥陈镛负责策划，对聊城城墙进行全面改建，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延伸。先用土高筑，外用三合土厚厚地培砌结实，凝固后再用青色巨砖和石头镶砌的紧密合缝。所用青砖，由专门聘请的临清州技师督工烧制，质地坚厚细致，一块重达四十八斤。用料相土尝水，就地取材。为了统一模式，在附近筑洞建窑，以至如今的环城小村还有“朱家窑”、“孙家窑”、“彭家窑”之称。这次修缮经过精心勘探，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施工技术，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快完工。一座砖石结构、端直漫长的苍色巨壁耸立在古城外围，远远望去，象一座巨大的方形碉堡。后又经过不断扩修、增补，逐渐形成了可

与西安城墙媲美的巍峨城宇。

据《聊城县志》载，城墙“周七里一百九步，高三丈五尺，厚两丈。地阔三丈，深二丈。”顶部可容五马横骑，十人并行，两辆大车同驰无碍。顶面用三至四层方砖铺筑，十分结实平坦。其厚度更是超过高度，故而城墙厚足稳固。

墙之四面，建有四座城门。东曰“寅宾”，南曰“南薰”，西曰“纳日”，北曰“锁钥”。这是正门，平时为出入城的通道，战时为御敌要隘。另外，东、西、南三面还建有瓮城和“拗头门”。因为拗头，东西两面的瓮城城门均朝南，南面的朝东。瓮城是城门重要的御敌工程，又称“翼城”、“月城”、或“郭”。外敌进攻城门，必先进入瓮城，而在瓮城恰似入瓮里，四面受敌，无处藏身。郭外各有水门，“钓桥”横跨水上，池深二十尺，广加十尺，阔倍之三。可谓池深城厚，易守难攻。城门的建筑形式皆为拱券式，仿京都天安门而建。门洞高而深，宽约七、八米，其上建有楼阁，飞檐挑角，气势峻严。四个城门中，从明清至民初，最具气魄，保存最完整的是东门，双重城楼，歇山重檐，雕梁画栋，结构精巧，巍然可观。在其二层楼棧上，悬挂着白底黑字的巨幅匾额，镌刻四个行楷大字：“晖挹岱岳”，出自明万历年间礼部尚书朱延禧之手笔，遒劲有力，浑然天成。在其城门南北，各有楼宇遥相对峙，南为“魁星楼”，北为“望岳楼”。翠柏环护，景物秀丽，登高远眺，风铃叮咚，气概万千。

城墙的外沿建有带垛口的垛墙，又称“雉堞”或“女墙”，是窥探敌人的掩体。它筑在墙顶外侧的迎敌方向，高约两米，呈锯齿状。垛墙上有洞，下有方形射口，作战时用以瞭望和射击。射口稍向下倾，使敌箭无法穿过。从垛口往外射箭，其距离、射程、射中限度都有科学规定，控制得法，百发百中。如来敌越过了射中下限，贴近城壁，就抛扔滚石、火球等，居高临下，威力无比，可造成惨重杀伤。明万历七年（1579年），知府莫与齐重修垛口两

千七百有奇。城墙顶部每隔五十米左右留有砖砌流水槽，为墙顶排水装置。内侧有登城马道，是守城将士和车马登城墙的通道。城门也有马道，均设在城楼左侧。城墙的四角筑有“角台”，上建有“角楼”，是镇守城角的重要据点。周围建有凸出的“墩台”，又叫“敌楼”或“炮台”，战时从各方射击，使敌人三面受敌；平时驻扎军队，储备各种枪弹、器械等。其上均架有铁炮，称“大千斤”、“二千斤”，据险扼要，威势俨然。

城墙修筑，从四面挖土，形成了宽阔的环城沟壑，从运河引水入内，并经逐年拓展挖掘，就形成了如今依城绕楼的护城河。其水面辽阔，俨然湖沼，故而又称环城湖。城湖相映，不但增强了御敌能力，而且为小城平添了一道奇丽风景。

解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城墙逐渐被拆除平修，变成了如今宽直平坦的环城路。但它作为旧时一封闭的军事防御工程，其质量之坚固、构造之精妙，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聪慧睿智。

城墙不存，但华夏永志。

（裴蓉 整理）

邓状元奇闻轶事

邓 愧 余

邓钟岳，字东长，号悔庐，1674年出生在聊城城内。幼聪慧好学，熟读经书。康熙六十年（1712年），邓钟岳登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入翰林院。雍正元年（1713年），充任江南副考官，江苏学政，广东学政，雍正十一年迁礼部侍郎，总编《一统志》。乾隆元年（1736年），出任浙江学政，江南正考官。邓公为官清正廉洁，政绩卓著，并著有《知非录》、《寒香阁诗词》及《寒香阁文集》等。其书法墨迹遍及海内，皇帝御批：“字压天下”。状元之名闻名遐迩，备受推崇，其出生时所在街道也因之而命名为“状元街”，沿用至今。

聊城名胜古迹多有邓状元书写之楹联和匾额。城内万寿观楼阁两壁所书之“龙”、“虎”两字，字高丈许，笔走龙蛇，气势磅礴，与高大雄伟之楼阁相映生辉，令人叹为观止。现存者除聊城城内“光岳楼”匾额外，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保护历史文物，曾将聊城南大堤状元手书之“重修护城堤碑”移至城内公园小桥东侧，供人观瞻。

邓状元的传说轶事很多，代代相延，脍炙人口。正如我国古代圣贤名臣，后人常常加以“神化”，这不单纯出自人民群众的迷信思想，而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尊敬和崇拜。状元的轶闻也是如此。

状元出世

当时城南姜堤，有一对卖豆腐的老夫妇，膝下无子，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了两个大元宝。他们象爱护孩子一样，给每个元宝穿上了“红兜兜”（在元宝中间扎了一道红布），每到晚上拿出把玩观赏，睡觉时便小心翼翼地锁在床头柜子里。有一天夜晚，老汉做了一梦，梦见两个穿红兜兜的小孩，跪在他的面前，谢他养育之恩。临走时说：“我们上城里邓状元家去了！”醒来觉得稀奇，便告诉老伴，谁知老伴也得此梦。老两口感到有些蹊跷，左思右想，猛然悟道：“莫非是这两个元宝？”老两口急忙打开柜子一看，果然元宝不见了。夫妻俩自叹命薄，但他们并不甘心，一定要弄个明白。因为当时邓府很有名气，心想那一定是邓状元家。老汉经常进城卖豆腐，知道邓府地址，便慌忙吃过早饭，挑着豆腐担子径奔邓府而去。

说来也巧，豆腐老汉丢失元宝的这天晚上，恰逢状元降生。在家人掘地埋胎衣时，正好掘出这两个扎红布的大元宝。老太爷非常高兴，认为孩子将来定能大福大贵。第二天上午，卖豆腐的老汉求见。在说明事情原委后，老太爷没说什么，一面留下老汉吃饭，一面吩咐厨房做了两个大馒头，每个馒头沉甸甸的。当老汉吃罢要走时，老太爷将这两个大馒头给了他，并一再嘱咐：“这馒头是特意做的，千万不要送人！”老汉很扫兴，道谢后，把馒头放在豆腐筐里，也无心再卖豆腐，无精打采地回家去了。走到南门瓮圈，碰见一个卖小鸡的。老汉喜欢养鸡，便用这两个馒头换了两个小母鸡，挑起担子走了。

这个卖鸡的走到邓府门口，刚好老太爷出门送客，一眼看见担子上的馒头，便用二两银子将馒头买了回来，卖鸡的欢天喜地而去。原来这两个大馒头每个里面包着一个元宝，结果这两个大

元宝仍落在邓状元家。老太爷念及卖豆腐的老人无儿无女，便收养在家终养天年。

状元夜读

状元读书至深夜三更，忽听“哗啦”一声，一个青面獠牙、面目狰狞的大头小鬼破壁而入。状元毫无畏惧，随手将压书的镇尺放在鬼的头上。小鬼见吓不倒状元，厉声大叫：“状元，状元，你好大的胆！”状元微微一笑，随口应道：“小鬼，小鬼，你好大的头！”当状元将镇尺取下后，小鬼急忙逃逸隐失。

状元赶考

状元赴京会试，乘运粮河（今运河）南来之船北上。同船有一南方举子，非常傲慢，摇头晃脑，自诩学识渊博，骄傲地说：“四书五经算什么！我能从头背到底，保证一字不差。”说着便径自背诵起来。见状元不予理睬，遂用蔑视的眼光追问状元：“你敢和我比试吗？”状元说：“你书读的不错，四书五经能整本背诵实属不易……”说着拿起一本《论语》问道：“你能从后往前倒着背吗？”此举子不信，状元说：“你看着，我背！”一部《论语》真的倒背如流。此举子仍不认输，看到状元拿着一把扇子，身上披着棉袄，便出了一个对联让状元来对。此举子用嘲弄的语气说出了上联：“穿冬衣，拿夏扇，糊涂春秋”。内含“春、夏、秋、冬”四字，并各有所指，对之确不容易。状元见此举子正喝着烧酒，洋洋得意，便稍加思索，对出下联：“坐南船，喝北酒，什么东西。”内含“东西南北”四字，同样亦有所指。不但对工精巧，而且表达了状元的愤懑之情。

“高夏蔡田”

状元赴江南主考，南方举子看不起北方人，状元从他们的眼神和表现中有所觉察。临考前，吩咐从人在考场院内菜畦里立了一个杉篙，便端坐在太师椅上不声不响。众举子看主考官这么长时间不出题目，便知道得罪了主考大人，于是，一齐跪下请主考官出题。状元说：“你们徒自作聪明，题目早已出来，为什么不作呢？”众举子目瞪口呆。只见状元指着菜畦里的杉篙说：“这就是题目！”众举子仍不明白，再次跪倒在地请主考大人明示。状元说：“难道你们连《百家姓》都没念过？……这不是‘高夏蔡田’吗？”“高夏蔡田”是《百家姓》中的一句，是“篙下菜田”的谐音。从此，这些南方举子再也不敢那么傲慢了。

聊城，这一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和驰名四海的名胜古迹，而且孕育了不少象邓状元这样的杰出人物，为故乡增光添彩。相信有着辉煌历史的聊城人民，定能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再造辉煌！

（朱淑惠 整理）

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

沈 宝 章

“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这句俗谚，在东昌府家喻户晓。但知道此说法缘由的人却很少，在此不妨作一介绍。

东昌府在清朝乾嘉之时，漕运畅通，工商业特别繁荣，为鲁西北经济文化中心。运河中粮船货船往来不绝，南自杭州，北抵通州，南北货物大宗在东昌装卸，因此东昌一度成为我省经济文化枢纽。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是三条街名，都濒临运河及闸口桥南“越河”之间。在闸口桥南不远处，往东有一条小河，名叫越河。半里左右，逶迤往东北，经柳园，又折往西北，在赤帝当阳（今闸北煤场附近）入河，众多的商船即可由此小河分散绕道而行，以使此处船只畅通无阻。

金太平位于闸口南越河之南岸，银双街位于大码头南运河之西岸，小东关位于北越河之东岸，为东西街道。这三条街都濒临运河，为装卸、储存及发往各地货物之集中地。尤其是金太平，全街除货栈及仓库外，没有住家，多储存汾酒及瓷器一类货物。全街路北均为一式之青砖灰瓦之瓦房，整齐坚固，建筑一律，真可谓“固若金汤”。样式都是坐北向南，每座连大门三间（大门在东边），进大门为一院落，院中北屋三间，西局子一间（也称帐屋）。北屋中间有门通后院，后院东屋两间（作厨房），东屋北为厕所，有后门西向，开后门即为临越河之石阶，可泊船装卸货物及上下

客商，有如江南水乡。至于路南房屋，大致和路北相同，间或有几座楼房。

该街东路北有旷地一处，约半亩，树木扶疏，边有一古井，此地曰“马园子”，斜对过路南又有“小马园子”一处，略小。马园子昔时为供客商或东翁、经理拴马及饲养之用，小马园子多停放驴骡，作为伙计出门或归来饲养牲畜之地。

金太平东西两头，各有阁门高耸，夜间有专人打更巡逻，真连鸡犬也难于进内，因此形成了“金太平”这样一个高贵的称号。

至于“银双街”及“铁打的小东关”，街上也是货栈及仓库林立，建筑坚固，货藏殷富。双街建有巍峨壮观之“山峡会馆”、“苏州会馆”、“武林（杭州）会馆”等。这两条街，两头都有青砖灰瓦、飞檐翘角、砖木结构之阁门。双街西下坡小桥东，还有一座西阁门，（现一中大门西），有一座古棚，飞檐翘角之灰瓦屋顶下，为朱红之木栅栏。木栅栏下，有台基高约三尺，大方砖铺地，东西两面有石阶，可供行人上下。古棚南砖墙上方，有横列四个砖刻大字，曰：“气接泰岱”，笔力苍劲古朴，不知何人手笔。

（吕国宝 整理）

杨大安殡葬纪实

王九恒 崔梦辰

聊城的群众经常说的一句口头语：“杨大安出殡大发啦！”这句话的意思是指1910年杨大安出殡时的声势浩大，气概雄伟的盛况。

聊城海源阁第三世主人杨大安，名保彝，字风阿，清同治庚午年举人。历任山东优级师范教务长、山东通志局会纂等职。1910年病故聊城，享年58岁。

筹备丧事请的聊城五大绅士为总理，五大绅士有靳曰斋、孙达臣、马殿仁、孙兰溪、胡甫田。

请的点主管是北京的一位部长，部长因故未到，派一代表来聊点主。杨家不同意，最后由孝子刺指血点主。

杨大安的原配王太夫人，有才有识，多谋善断，丧事的重要事宜全由她亲自主持料理。

具体办理丧事的人员有田聘之、王安臣、邓树森及梁敬轩四位管家和郭东臣、赵景云两位家人。他们挖空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为筹办殡葬日夜操劳。

为了将丧事举办得阔绰，事先，将全县所有扎彩匠人都集合在火神庙内，由诸城县请来的艺人指导工作。扎彩用料全是绫罗绸绢，大门外的牌坊前扎有高4米的两红、两白四个大汉，扎制的阴宅楼阁、日用家俱、童男童女等一应俱全，形态维妙维肖，宛

若真品。

为了办好丧事中的酒席，杨家将全城所有饮食业厨师等人员都集中做炊事工作。每天入席就餐者，不计其数，有些过路行人也能入席就餐。

杨大安装殓的棺木是用极贵重的阴沈木制作的。所用抬舆杠夫全是王太夫人从娘家诸城县雇来的人。杠夫衣帽服装，一色打扮，出殡时都穿孝服。

杨大安之丧事，轰动了全县人民，进城观看的男女老幼，拥挤不堪，街道交通为之断绝。自杨宅至西门沿途设数处路祭。

出殡之日举行祭奠点主等仪式后，上午有县公安局及警备队人员先行到墓地，放哨警戒。午后开始起灵，由诸城来的杠夫将棺木抬出杨宅，安置在灵舆，覆以华罩。灵舆是龙头凤尾四牵引，华丽壮观无比。

灵舆未起行前，有开路鬼头前开道，后跟硕大的红白四大汉。扎制阴宅，素车白马，家俱器皿遮天盖地络绎随行。起灵时鼓乐齐鸣，由32名杠夫抬起灵舆，前行快慢，升降转停，全由杠夫头手敲铜锣指挥。杠夫步调一致，灵舆四平八稳。由杨宅东行至朱府口，因路窄舆大，转弯困难，当时王太夫人赐赏杠夫每人钱五串，鼓励杠夫出力。由朱府口北行至东口转弯又困难，当时大姨太、二姨太赐赏。西行出西城门直至田庄墓地，到达已黄昏，第二日始入葬。当日随行观看的群众、小孩等，至墓地都入席就餐。

杨大安之丧事用费，据说耗银十八万两，王太夫人也有点疼钱，但听说诸城亲家还嫌办的小气哩。这种穷奢极侈，铺张豪华的殡葬也说明那时的豪门富户之生活面貌。无怪聊城群众都说：“杨大安出殡大发啦！”

（裴 蓉 整理）

高佛堂寺膏药琐谈

叶簪传 高文广

在聊城西南约 30 华里处，有个“高佛堂寺村”，村的西南原有一座寺院，名叫“高佛堂寺”。该寺院规模宏伟，占地面积约有二、三十亩。院内苍松参天，阴翳蔽日，有直径三、四尺的粗松，足以证明寺院的历史悠久。正殿中塑有如来佛和十八罗汉的坐像，偏殿中供奉关公。“高佛堂寺”远近闻名，原因并不在于寺庙有什么独特之处，而是因为它出产一种疗效极高的膏药——“高佛堂寺膏药”。该膏药的起源已无从考证，但它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在鲁西北一带享有盛名却是事实，勿庸置疑。

高佛堂寺膏药按功效有两种，一种主治风寒麻木、腰酸腿疼、四肢不利；另一种主治痞块肿胀或妇女调经等病症。这两种膏药在形状上又都分为“大号膏药”和“小号膏药”。大号膏药用一尺见方的双层布（白表红里），中间膏药直径约在 4 寸左右，厚约 2 分多，用时烘烤摊开，面积可增大至直径 8 寸左右。“小号膏药”比“大号膏药”约小三分之一。

高佛堂寺膏药在制作过程中，选料严格，用量准确，历代方丈都检验认真，绝不容许有偷工减料、掺杂次品药物的现象发生。因此，疗效也就十分可靠，名声越传越远，成为东昌府的一大名产。

三十年代中期，最后一代老方丈去世，其大徒弟传道主持庙

内事务。此人私心很重，唯利是图，制造膏药草率行事，用料以次充好，损坏了“高佛堂寺膏药”的声誉，也引起了四乡村民的不满，土改时被群众逐出寺院。传道在解放后曾“娶”了一个年轻女子，在万寿观附近租赁房屋住；公私合营时，传道夫妇加入药材公司。不久传道去世，他夫人脱离公家自己熬药出售，但质量效果与原来的“高佛堂寺膏药”已大相径庭。由于膏药不好出手，她就干起了别的小买卖。至此“高佛堂寺膏药”也就枝断根绝了。对此，吴云涛先生曾吟诗一首：

城西古刹高佛堂，膏丹修合有秘方。
崇阁巍阁梵宇静，松林深幽炼药香。
地方名产传统久，医界驰誉历史长。
而今一切成陈迹，惟见荒墟映夕阳。

东昌鸟类两绝

裴 蓉

古老的东昌，文明而神奇。在它广袤的大地上，生活着两种美丽而稀有的鸟类——白雀鸟与铁燕子，实属罕见，堪称两绝。

白雀鸟 白雀鸟唯堂邑独有。相传在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黄河决口，堂邑故城湮毁，遂迁至东昌府西18公里处的今址（现聊城市堂邑镇）。新城完工之际，忽有数千只白色的小鸟翔其上空，“众雀嗷嗷，雌雄相告”。霎时，天空与城郭之间形成了一幅美丽绝妙的白色景观，后人因称堂邑为“白雀城”。

白雀以其色、形而得名。它身长14厘米左右，形状与普通麻雀酷似，只是白雀全身羽毛雪白，没有一丝杂色。它的腿和爪也呈嫩白色，两只眼睛圆圆的，很明亮。白雀多生活在庙宇、古井和树洞中，主食谷类，冬季兼食杂草虫子。生殖季节常捕食昆虫，并以之哺喂雏雀。白雀并不十分惧怕人，有时候站在树枝或墙壁上，发现人后并不即刻躲开，它会拿小眼睛瞪着你，偶尔也会转几个身，蹦跳几下，然后才展开洁白的小翅膀唧唧叫着飞向天空，好象在故意向你展示它的风度一样。白雀成为堂邑乃至鲁西大地上的一道奇丽风景，人们珍爱它，并视之为美好吉利的象征。

不知过了多少年，不知什么原因，小白雀渐渐少了，甚至现在已经很难看到。后人忆念白雀，就用土泥捏成它的模样，晒干后涂上白粉，供奉在房中，驱邪避疫，尊若神灵，东昌则有了以此命名的“白雀书院”。1964年底，曾在聊城工作过的赵国璧、许

继善等老同志，在原堂邑公社院内，又欣喜地看到两只小白雀落在南面的墙壁上，久久始去。八十年代末，堂邑镇有人也发现了两只，它们不知从何处飞来，在镇北面的一棵大树上伫望了片刻，西飞而去。此后，很少再有人看到。

铁燕子

铁燕子是东昌人对栖居在光岳楼上燕子的昵称。座落在古城中央的光岳楼全木结构，气势雄伟。每每春去夏来，一群群周身乌黑的小燕子便飞来楼上安家。这种燕子翼尖长，尾呈叉状，喙扁而平短，口裂很深，比普通燕子身体稍大，声音稍尖细，样子也憨厚些。小燕子的头、颈、背、腹、翼、尾均呈黑色，跗跖部也呈深黑色。远远望去，就象铁铸成的一样，故而人们习惯称之为“铁燕子”。

铁燕子自己不筑巢，总是栖息在梁间椽隙，飞行时捕食昆虫，属益鸟类。它们每年在光岳楼上生殖繁衍，嬉戏而居。出生不久的小燕子有的羽毛未丰，就急于出巢飞行，结果常常坠地而死，因而人们在光岳楼周围有时会发现一些小燕子的尸体。铁燕子一般在傍晚时节飞出椽巢，每当夕阳西下，晚霞满天，桔红色的暮霭中，成群结队的黑燕子身披霞光，密密麻麻翱翔在巍峨的楼宇上空。它们绕楼或疾或缓地飞旋，有的还会悠闲地叫几声，然后直飞西天，在湖光霞影中消失在天水相连的远方。“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其情其景，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铁燕子还是捕食蚊蝇的能手。夏季来临，光岳楼周围凉风习习，人们在其纳凉，却不会遭受蚊叮之苦，甚至整个古城中的蚊虫都比别的地方少得多。此中，铁燕子功不可没。

处暑时节，铁燕子群体南飞，第二年初夏又会回到生于斯的东昌光岳楼。日转星移，岁岁如此，至今依旧。东昌人习惯了、接纳了这些憨憨的可爱的小生灵。

天地之间，万物都循着自己的规则繁衍生息。东昌之大，铁燕子唯栖光岳，白雀独钟堂邑而后离，令人释然，也给人启示。它

们作为一种独特的自然景象，让我们欣赏，让我们流传，更需要我们的珍视和保护。

北 坝 豆 腐

高 文 广

北坝豆腐早在漕运畅通的明清之际，就与旧州洼白菜、西关井水齐名，被誉为“东昌府三宗美”。

北坝村位于聊城古城北，距光岳楼3华里。村东北是运河故道，村西部原有一条连接北护城堤与运河岸的防水堤坝，村因坝名，故称北坝。由于该村正处在古运河与防水堤坝所形成的V形地带内，耕地少，生计难以维持，早期的居民便选择了豆腐制作这一副业。北坝豆腐制作始于何朝何代已无法考证，一说是明初从山西洪桐县来此立村时就从事豆腐经营；另说北坝村自古就是古城郊的豆腐制作副业村。由此推之，时间当在明朝之前。据调查，清末、民国至解放初期，该村经营豆腐的占十之八九，陈、刘、胥、张、董、路、牧、任、孟、邓、范、祝、王等十几姓，近百户人家，不做豆腐而从事其它副业的仅有少数几户。如“董家园子”种菜、卖菜等。尽管这几户不事豆腐经营，但同样精通豆腐制作，逢年过节，喜庆寿宴，他们便借用一下邻居的工具，自己动手做豆腐。北坝村可说是名副其实的“豆腐村”。

古时北坝豆腐全用运河水制作，其优点就在于豆腐出得多，且质地柔嫩。清末运河淤塞缺水，方始用井水。井水出豆腐数量上低于河水，但是井与井又有所不同。出豆腐量多质嫩的井水要首推村南的一口老井（址在地区饮食服务公司院落的东南角处，已

毁废)之水,该井水苦、咸,村民不食用,专用做豆腐。其次是村西南的一口老井(址在凤凰台东北约50米处,已毁废),该井水微咸,能食用。民国二十四年运河浚通后(直至六十年代),河水、井水并用,临河用河水,近井用井水,或凭豆腐师们的喜好而随意选用。用河水和苦井水制作豆腐会不会有损人体健康呢?不会!因为豆腐制作过程中有将豆浆煮沸的工序,在这个工序中,水中杂质沉淀,水质得到净化,出的豆腐不但卫生,而且色泽洁白、口味清淡。现在一些北坝的豆腐专业户,用水已改用自来水,也有个别的用环城湖水。水的选择是北坝豆腐制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世代相沿的制作精技是北坝豆腐成名的关键。北坝豆腐在制作过程中,每一个工序都认真细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如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一样,老豆腐师说,豆腐业所崇拜的祖师爷叫做“豆腐神”。笔者查阅资料得知,“豆腐神”系西汉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豆腐业公认的祖师爷。

北坝豆腐色白味鲜、质地细嫩,煮之呈蜂窝状,食之爽口,东昌府人人爱吃。旧饭馆非北坝豆腐不用,传统名肴“锅塌豆腐”用北坝豆腐制作最佳。“白菜炖豆腐”、“杂烩菜”选用旧州洼白菜和北坝豆腐制作出来特别好吃,非尝者所能名状。北坝豆腐饮誉数百年,至今盛名不衰。

(薛守鼎 整理)

五十年代以来聊城的民居变化

高 金 福

我从少年时期就从事建筑工作，对民居的变革很感兴趣。现将我们聊城五十年来的民居变化，根据记忆所及、访问所得整理出来，算作抛砖引玉吧。

（一）五十年代的聊城民居

五十年代初，历经战乱、匪患、灾荒破坏，多年的聊城民用房屋，几乎没有一座是新建的。90%以上都是破旧不堪、东倒西歪，依靠修修补补，勉强居住。那时候的瓦匠们多数都会拆墙、换墙、挖补墙和抽梁换柱等零星修理工作。

这个时候的民居有如下几种：

（1）“里生外熟”：这种形式的房屋从外面看是扁砖到顶、白灰线缝，非常“打眼”的瓦房或平房。事实上则是用四寸青砖直砌到顶（每隔十几皮砖用六寸头往里勾上一皮）的骗人把戏！里边衬的是用条坯（顺砌的土坯）培砌到顶的夹生墙。强度低，支撑力极微。乃资金短缺的买卖铺户和中等以下的人家，为了维持脸面，无奈而建成自欺欺人的非常危险的建筑物。五十年代后期，已基本拆除。

（2）土坯房：即用土坯（未经烧制过的土砖）砌成墙体的民

房。土坯尺寸约为36厘米×18厘米×8厘米左右。就地取土，加水和成泥，以木制的模子脱制成型，晒干用以砌墙。

建房时在自然地墙下埋砌三、五层破旧青砖，再砌以9层或11层（一定砌成单数）的青砖基础，铺上厚约5—6厘米的木板或高粱（玉米）秸杆以便隔潮气，以上再以土泥粘结，砌土坯至顶。屋面是杂木梁檩，上压30厘米厚的高粱秸杆或苇子，再抹上厚厚的麦草泥。墙体干透后，里外抹上草泥即可居住。

土坯房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技术要求不高。而且墙厚顶厚，风吹不入，寒气难侵，冬暖夏凉。最适宜广大城乡低收入阶层居住。

（3）青砖房：五十年代聊城城内和东关大街至闸口东迎春桥，还存留着青砖瓦平房。墙体使用老式青砖一顺一顶砌筑（即现在说的37厘米厚砖墙）。建房时先由木匠立柱上梁，然后，瓦匠再砌墙填充（房顶重量全由柱子承担，墙体不承受房顶压力），房顶使用小青瓦或巴砖漫顶。室内抹白灰蔴刀墙或3：7灰泥加麦草糟制熟化的“麦秸糟”，地面大都使用24厘米×24厘米的大方砖漫铺，门窗也比较讲究。是中等以上人家的住宅。

（4）小板打：亦是多年来流行的建房方式。其作业方法是将土加水，和成半干不湿的粒状，加入麦草，用铤状的杈子铲起扔与师傅，师傅用双手接过后再摔按于墙基上。每次作业按20厘米左右为一皮，宽度约为37—40厘米。挺身后用铤将里外两立面铲齐，最后用枣木板拍打实在即成。除墙体外其它均与土坯房作业方式一样。

（二）六十——七十年代的聊城民居

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后期，由于“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文革”的干扰破坏，聊城除人口

成倍增长外，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广大城乡居民，都以大部分的精力为吃饱肚子而努力奋斗，衣、行、住便注意不多。但是解放前和五十年代的陈旧房屋，大都已超过了它们寿命的极限，再也撑持不下去了。非更新换代不可！勉强盖房的多了起来。

为了省钱，土坯和小板打做为广大城乡建房的主体材料仍在 使用，红色机砖和手工砖也替代了老式青砖。

但从六十年代起，民房建筑出现了下列几种新样子：即“金镶玉”、“四角清”、“金香炉”和“前面硬”等名称。实际上是在砌墙时或者光砌前立面一面砖墙，或是四大角及木梁下砌砖柱。也有的三面砌砖墙，其余部分则使用土坯或小板打，从外面给人以新砖房的感觉，与过去的“里生外熟”有异曲同工之妙。粘接材料仍沿用白灰条或土泥砌墙而外面用砂浆勾缝（分白灰砂浆和水泥砂浆），同时，比木檩省钱的水泥檩也进入了建材市场而被广泛使用。值得一提的是：七十年代以前，聊城民居主体墙仍以一顶一顺的 37 厘米墙为主，对在逐渐兴起的一砖墙（24 厘米）持怀疑态度。认为太薄，不耐碱，冬冷夏热。

进入七十年代后，由于公家盖房广泛使用 24 厘米墙做承重墙，甚至二、三十层的楼房也是单砖到顶（按照设计要求：24 厘米砖墙用混合砂浆砌筑，允许建五层住宅楼）。城乡居民也慢慢地改变了看法，渐渐地以 24 厘米单砖墙取代了 37 厘米墙。少数人也开始采用砂浆来做粘接材料，不过多数使用白灰砂浆，用水泥砂浆的仍是极少数。内外墙装饰则是抹灰勾缝，间也有抹水泥地面及踢角线者。

（三）八十年代至今的民居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工作重点放在了抓经济上，城乡建设日新月异，变化很大。随着人们口袋里

钱的增多，对住房的投入迅猛增加。建房一改过去“能住人就行”，而着眼于坚固、好看、防震、高大明亮。再就是往高处发展——要住楼了，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首先是普遍用砂浆取代了使用多年的土泥、灰泥、白灰条（仿古建筑除外）来做砖墙的粘接材料，地梁、圈梁、挑梁也普遍采用。混凝土楼板、预压力楼板取代了当年的木梁木檩、水泥檩、红瓦屋面草泥顶。清水墙勾缝已不再兴时，代之而起的是砂浆抹面、马赛克、磁砖贴面，仿古饰面。使用铝合金板材装饰墙面的也多了起来。

室内墙面，中、高档抹灰、灯盘、吊顶、做灰线、刷涂料、贴壁纸也应有尽有了。

地面也往地板漆、地板革、地毯发展。进屋要换拖鞋了。

玻璃门窗也在朝着通风采光和冬暖夏凉发展，钱多的则抓紧安装防盗门、防盗锁。往后再怎么发展？很难预料。

（四）民用建筑的得失

综述四十年来聊城民用建筑的变化，我提出个人的见解，与大家商榷。

解放初期至七十年代后期的民居大都因陋就简，应付凑合，一切从省钱出发，以能住人为主。其间使用的如“里生外熟”、“一面硬”、“金镶玉”、“四角清”等等建筑方式已被证明不合设计原理，至八十年代初即淘汰净尽。

土坯房在一些农村仍时有所见。土坯房的好处除前文提到的取材易、工期短和冬暖夏凉外，拆除后的落房土仍可重新合泥脱制成坯多次使用，施在田间还是极好的土杂肥料。

再如过去人们挖取环城湖（旧称护城河）底的淤泥脱模制成的“河土坯”，其耐酸碱、风化、雨水浸泡的性能尚优于如今烧制

的红砖。笔者亲见“小石码头”附近一堵高约2米、长约6米的河土坯墙，解放前砌筑的，并未抹过墙皮保护，任其裸露数十年，历经风雨而不倒不坏。

24厘米砖墙如今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和使用，比之37厘米墙造价低，占地面积少，使用面积相对增加，轻巧而不笨重。但存在着墙体太薄、隔音条件差、冬冷夏热、不耐酸碱等特点，仍需改进。但愿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康目标的实现，人们的住房会更加理想更加合适。

（吕国宝 整理）

后 记

《聊城文史资料》第七辑经过两年多的孕育终于面世。该辑共收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各方面的文章 50 篇，分为人物春秋、文化苑林等五大部分，计 18 万余字。

本辑是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在史料征编过程中，文史委员会在政协常委会的指导下，针对当时史料匮乏的状况，制定计划，妥善布署，由文史科具体实施。我们本着“存真、求实”的原则，采取广征博采、重点组稿、抓紧“抢救”三者相结合的方法，边征集、边筛选、边整理多管齐下，在近百篇史料的基础上，精选出 50 篇。俟初稿形成后，经文史委员会成员把关、编审，确保了成书质量。

尽管如此，由于水平所限，加之付印仓促，疏漏讹舛之处在所难免，谨请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五年十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聊城文史资料 · · 第七辑

作者 =

页数 = 2 2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